目录

[题史林有声 3](#_Toc29201724)

[序　为什么书写历史 4](#_Toc29201725)

[第一部分 5](#_Toc29201726)

[项羽和刘邦——泾渭分明的双雄 5](#_Toc29201727)

[诸葛亮的秘密 6](#_Toc29201728)

[不苟言笑的名审判长 7](#_Toc29201729)

[伟大的蒙古 8](#_Toc29201730)

[写耶律楚材 9](#_Toc29201731)

[郑成功诞辰370周年寄语 9](#_Toc29201732)

[《天球飞翔》中的琵琶山 10](#_Toc29201733)

[第二部分 12](#_Toc29201734)

[交流的成果 12](#_Toc29201735)

[破除20世纪的禁忌之时 12](#_Toc29201736)

[想象力的翅膀 13](#_Toc29201737)

[永远繁荣之路 14](#_Toc29201738)

[对大众无限亲切 14](#_Toc29201739)

[晚节 15](#_Toc29201740)

[紫禁城逸事 15](#_Toc29201741)

[景观杂感 16](#_Toc29201742)

[虎门之池 17](#_Toc29201743)

[向草原和海洋的人民学习 17](#_Toc29201744)

[中日两国的任务 18](#_Toc29201745)

[香港回归 20](#_Toc29201746)

[第三部分 23](#_Toc29201747)

[三星堆文物 23](#_Toc29201748)

[作为艺术的文字 23](#_Toc29201749)

[汉诗和书法 23](#_Toc29201750)

[来自时间和距离上的浪漫主义 ——参观正仓院展品 24](#_Toc29201751)

[芭蕉[11]和杜甫 25](#_Toc29201752)

[广大的空间 26](#_Toc29201753)

[油滴天目茶碗 ——由安宅收藏东洋陶瓷展所看到的 27](#_Toc29201754)

[景德镇和宜兴 27](#_Toc29201755)

[超越真伪 28](#_Toc29201756)

[胸中逸气 29](#_Toc29201757)

[翡翠 29](#_Toc29201758)

[第四部分 32](#_Toc29201759)

[食物和历史 32](#_Toc29201760)

[甘薯 33](#_Toc29201761)

[琉球的食物 33](#_Toc29201762)

[美丽的梅 34](#_Toc29201763)

[端午 34](#_Toc29201764)

[野生 35](#_Toc29201765)

[医食同源 35](#_Toc29201766)

[八珍主人 36](#_Toc29201767)

[树的果实及腊八粥 37](#_Toc29201768)

[熊掌、驼峰 38](#_Toc29201769)

[第五部分 41](#_Toc29201770)

[与殷墟相匹敌的夏墟 41](#_Toc29201771)

[未被写进历史的海边风景 41](#_Toc29201772)

[南之路 44](#_Toc29201773)

[古代的中日交往 46](#_Toc29201774)

[丝绸之路，海上之路 48](#_Toc29201775)

[中国的历史和信息 48](#_Toc29201776)

[后记 56](#_Toc29201777)

# 题史林有声

戊戌群拳搭一舟，

重阳辛亥问无由，

百年遗事难搜尽，

行过卢沟岁月流。

戊戌变法的发动者和义和团运动的组织者本来就坐在一条船上，无论是广州起义（1895）还是辛亥革命（1911）都是以孙中山为首发动的革命，这一点毫无疑义。要探寻这百年的历史往事，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据说金代诗人元好问（1190—1127）曾在刚建成的卢沟石桥上反复徘徊，几度回望。800年之后的我，回想起发生在这里的百年往事，对岁月的流逝又有了更深的感触。

2003年5月

# 序　为什么书写历史

我来谈谈“为什么书写历史”。这就好比我们遇到困惑，要把过去的判例拿来研究一番，身体感到不适要把专职医生所写的病历找来看看一样，历史大概就相当于那个判例或病历吧。

正因为如此，人们要求正确的历史。然而，正确的历史没有被记录下来却是有例可循的。

中国有个被称为“商”的王朝，在公元前1028年灭亡。在一般的历史书籍中，商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纣王（？—前1027前后）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他不祭祖灵，专听宠妃妲己之言，人民痛苦不堪，以致产生了“酒池肉林”这样的成语。因此，商王朝属下的一个大诸侯——周文王和他的儿子就把“商”灭掉了。

然而，3000年之后的1899年，人们发现了大量用于占卜的甲骨文，上面记载着许多商王朝的史实。实际上，纣王在祭祀祖先、神灵等方面，反倒比自己的祖父、父亲更虔诚，在对待人民方面也并不残酷，有时甚至还很人道。

因为周是推翻自己的主君——“商”而建立起来的王朝，所以，也许他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编造了纣王可恶的谎言，这些内容反倒成了正史。所以，如果我们原封不动地相信史书上的内容，那就危险了。我们要思考历史是谁书写的，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书写的。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从隋朝过渡到唐朝的那段历史。李渊（565—635）作为隋朝的八柱国之一，同时又是太原侯，他对主君——“隋”举起反旗，建立了唐朝。然而，据《唐书》记载，这个大功却是李渊的次子、后来做了第二代皇帝的李世民（598—649）建立的，是李世民利用李渊的丑闻唆使自己的父亲反隋的。

但是，有个叫温大雅的记录者却留下了一部李渊的《大唐创业起居注》，上面记载着李渊自太原起兵到登基称帝的那段经历。据起居注所载，李渊不仅不是受李世民的鼓动，反倒是他向李世民们阐述了起兵的必要性。我认为这个记录是正确的。

李世民杀死自己的哥哥做了唐朝第二代皇帝。因此，他为了显示自己对建立唐朝立有大功，就不惜让史官歪曲事实编造历史。

后世之人在书写历史时，可能会把每天发行的报纸等当作所谓的“实录”。但是，这种实录有时也会有假。因为既然有唐朝的许敬宗等为了金钱而篡改事实、编造历史的先例，当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人以他们各自的立场为自己涂脂抹粉了。

因此，要收集大量的记录，对它们进行比较，对它们的异同进行检查，对它们是否正确、为何人所写等进行详细的勘校核对。这样所写出来的东西才是历史。

仔细阅读《史记》中的徐福、蒙恬及著名的荆轲等人的传记，我们就会清楚地了解作者司马迁（前145或135—？）的写作手法和记述方式。即使对陈年旧事，司马迁也要调查取证。应该调查的事必须通过亲临现场来调查。这是需要我们效仿和学习的。

春秋时代的齐国有个叫崔抒的人。有个史官记下了“崔抒杀了主君”这件事，结果，那个史官被杀掉了。后来，那个史官的弟弟又那样写，同样也被杀掉了。当听到京城里的史官都被杀掉的消息，一个住在京城之外的史家，就背上竹简来到京城，目的是写上“他（崔抒）杀了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史家要有“绝不作假”的气概。

我认为书写历史就是书写病历，所以我们必须留下正确的历史，而且还要具备鉴别各种记录的眼力。

# 第一部分

## 项羽和刘邦——泾渭分明的双雄

人们常用这样的描述来谈论项羽（前232—前202）和刘邦（前256或前247前后—前195）之间的争斗，即性格迥异的两位英雄，最终形成势均力敌的两大集团，进而逐鹿中原，争霸天下。但是，如果我们对二人进行对等的比较，实际上对项羽来说有失公平。这与二人的年龄和出身都有很大关系。

二人都是趁秦末动乱而起兵造反的。当时项羽满22岁，据说刘邦已经三十五六岁或超过40岁了。22岁的项羽还是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拿他与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且拥有丰富经历的中年人刘邦相比，其差距简直就像小孩与大人一般。

另外，项羽出生在一个世代为楚国将军的家庭。楚国是战国七雄之一，虽被同样是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所灭，但它却是长期在大陆上争霸的强国。项羽拥有楚国将军的家世，相当于贵族。而刘邦，虽说是出身于中等农民家庭，但家境贫寒，其父母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这种不同的出身条件给二人的性格带来什么影响呢？

一方面，据说项羽年幼时，有人曾让他读书，他把书掷于地上，说：“书，足以记名姓而已矣。”（文字之类的东西，只要能记录名姓就足够了。）于是，有人又让他学剑，结果他学剑也没坚持多久。最后有人叫他学兵法，这回他高兴地学了起来。

当时的将军通常把文书方面的事情交由秘书来做，将军本人只负责盖印。所以项羽轻视读书这件事充分说明他是武将名门之后的特点。

另一方面，从项羽接受的那种全面教育来看，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即他是生长在一个纯净而又优越的环境中。

说到刘邦，最初他对家业也不尽心，到了30岁，总算当上了亭长这样的小官。亭长相当于日本村公所里的主任。也就是说，那是一个为当地百姓帮忙跑腿的差事。任务还包括监督那些征集而来的劳工，并负责把他们送到首都咸阳或骊山陵去，等等。通过亭长这一工作，刘邦应该在人际交往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

一个是22岁名门出身的公子哥，一个是40岁左右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的中年人。项羽与刘邦在起兵时，就在经历上有着如此大的差别。

另外，二人的命运也与出生地的不同不无关系。

项羽的出生地会稽附近，有一个以绍兴酒和作家鲁迅而闻名于世的城市——绍兴。这里似乎从项羽时代开始，就很富裕，直到今天绍兴仍然是个富饶的地方。与此相比，刘邦的出生地沛县可谓是土地贫瘠，条件艰苦。

然而，在地理上沛县却比会稽离咸阳更近。并且，如前所述，就亭长的工作内容而言，刘邦应是多次带领民工往返于咸阳、骊山秦始皇陵与沛县之间。他在那一带所获得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知识，在后来与项羽的作战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每当刘邦与项羽交战失败，刘邦大多是从那附近逃走的。可见熟悉周围的地理环境在当时是具有很大作用的。

再者，喜欢交际的刘邦与那些被驱使而来的土木工匠们应该也有相当多的接触。秦朝的土木工程汇聚了大量从全国各地征集而来的民工。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刘邦应该获取了大量的信息。刘邦虽然没有学问，可能连汉字也认识不了几个，但他所拥有的信息量却是非常大的。

项羽一直生活在会稽这种良好的环境中，恐怕直到起兵都不曾离开过故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与刘邦相比也处在不利的条件下。

但是，项羽也有出身于将军世家的优势。项家虽属名门，但项家所服务的楚国却在十几年前被灭掉了，所以实际生活到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项家似乎依然拥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养活少量军队的实力。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对二人起兵时的情景做了清楚的记述。项羽与其叔父项梁起兵时，《史记》上的记载是“得精兵八千”。而对于刘邦的情况，则记载为“收子弟三千人”。“子弟”的含义是指起兵时被临时召集起来的亲戚朋友、乡党故旧等。与此相反，“精兵”的含义则是指训练有素的军队。因此，最初刘邦难以战胜项羽也就可以理解了。

这些年龄、出身、出生地等方面的因素，自始至终都影响着二人的性格和生活方式，更使二人的个性泾渭分明。

项羽对外面的世界所知甚少，名门出身的公子哥派头十足。他对自己的能力充满绝对自信，打了胜仗，他也认为那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而不是部下努力的结果。另外，项羽也许意识到自己的贵族身份与众不同，所以，他从不与部下亲切互动；在军队的编制上，他也一直固守着当初的“精兵八千”，没有像刘邦那样，把远处的南方少数民族部队收在自己的麾下。

刘邦作为村里大事小情的张罗人，具有丰富的人生经验，终成为一个符合其个性特点的英雄。刘邦与他的部下，虽说是上下级关系，但他们原本是一样的身份，所以他能够倾听部下的意见，并积极地在自己的周围寻求合作者。刘邦所考虑的是如何让部下发挥才干，而不是单纯依靠自己的才能。

项羽最后陷到“四面楚歌”的境地，他在垓下吟唱了一首著名的诗：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我力可拔山，气可盖世，但却被时运所抛弃，连爱马乌骓都不向前，乌骓不向前，我毫无办法，虞姬虞姬，你可怎么办！

诗的第一句唱出了项羽本人所具有的英雄气概，可紧接着却是对时运不济、乌骓不前的抱怨。从这首诗里，我们丝毫也看不出项羽的悔恨和反思，表达的是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迷信自己力量的强烈自负。对于一个出身于名门之后的勇将项羽来说，承认自己因能力不足而失败，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与此相反，刘邦在统一天下回到故乡时也吟唱了一首著名的诗。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狂风吹，云飞舞，我的威力压倒天下，让我回到故乡，我更希望能得到勇士去守卫国家的四方。

第一句中的“云”是刘邦本人的自喻，意思是说“我（刘邦）在狂风中飞舞”。“大风”既指时代这场大风，也指那些帮助他打天下的部下们所掀起的大风。接着他说希望得到猛士，让他们守卫天下，而不是说依靠自己治理天下。

归根到底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依靠部下的努力，依靠诸侯和民众的支持来守卫天下。这种想法与始终固守自己力量的项羽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两个人的诗，一首是面临人生最大挫折时所作，一首是面临人生最大成功时所作。两首诗各自鲜明地表现了二人的不同个性。

项羽在吟完生命的绝唱后，猛然向刘邦军队的包围圈冲去。当他来到长江北岸的乌江渡口时，乌江的亭长正备船等候着他。如果从那里渡江过去，故乡会稽就近在咫尺了。然而，项羽却笑道：“天之亡我，我何渡为！”说完，他将乌骓马交给亭长，再次去迎击汉军，最后自刎而死。

项羽为什么没有像唐朝杜牧所说的那样，再稍微坚持一下，回到故乡以期卷土重来呢？我觉得那是因为项羽的精英意识太强的缘故。他作为一个名门出身且具有将军特质的优秀青年，自起兵以来连战连胜，却因唯一一次大败而选择了死亡。他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贯彻自己的人生观。当时，项羽才30岁。

固然项羽是因为自己的傲慢而失去了部下和民众的信任，但是，毕竟他是在没有充分展现人性的魅力之前死去的。而人性的魅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在一个人的身上逐渐显现出来的。如果把项羽和老奸巨猾的中年人刘邦放在同一个维度上进行比较、评论的话，我们只能叹息项羽死得太早了。所以当我们评判二人的得失时，恐怕也应该关注一下两位英雄的个性是如何形成的。

再补充一点，那就是项羽的不幸还在于他没有遇到一位以项羽的立场来记录事实的史家。

项羽作为英雄人物也应该具有十足的才气。但是，即便是详细记载项羽事迹的《史记》等著作，也几乎没有留下表现其统帅才能的实例。当然《史记》是作者司马迁参考了汉朝史官留在木简、竹简上的记录后整理出来的著作，所以，那些记录对汉高祖刘邦必然是宽容有加的。这就是不管项羽如何强大，但记载他领兵才能的资料所见甚少的原因。

中国自周将商的史料销毁以来，历代王朝为了使自己的政权合法化，都是在对前朝进行否定性评价之后，反复地编纂史书。历史对于失败者往往是苛刻的。

当我们计算总分的时候，或许应该给项羽加上很多分数吧。

## 诸葛亮的秘密

历史故事所描绘的人物形象，往往比人物的实际形象高大许多。尤其是在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故事中，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三国志》（在这里指的是三国故事）也是如此。平常我们所熟悉的故事情节，是以罗贯中所写的《三国演义》为基础形成的。实际上，那些内容并不是正史，而是罗贯中在14世纪后半叶对说书艺人讲了近千年的故事整理加工的结果。因此，可以说，那种故事远远超越了实际形象而带有虚构成分。

诸葛亮（181—234）被描述成一个天才型的智谋人物，同时又是一个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情将帅。这位《三国演义》里的最大明星也有很多地方被虚构了。那么，尽可能剔除其虚构成分的诸葛亮，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

我认为，孔明不是一个天才型将帅，他不是靠所谓直觉、灵光一现而采取行动，反而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孔明在其本人所写的《出师表》里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我被皇帝（刘备）信任是因为我非常谨慎］。”

他在谈到自己时用了“谨慎”这个词。谨慎就是小心严谨。凡事深思熟虑，这是他采取行动前的基本态度。

进一步分析“谨慎”，我们就会知道“谨慎”是指处理事务时的态度，比如先准备很多备选方案，然后从各个角度反复分析，最后做出决断等。为此，一个“谨慎”的人首先要有收集各种信息的能力，同时也要具备最终选出一个最优方案的决断力。

但是，“谨慎”的缺点是不能迅速做出决断。陈寿是正史《三国志》的作者。他在《诸葛亮传》中提到孔明的临机应变，即应变之才时，写道“非其所长”。也就是说，诸葛亮虽在政治上、行政上拥有才干，但指导战争的才能并不突出。实际上，他在大型战役中并未取得胜利。他在把握机会、迅速采取行动方面好像不太擅长。

因此，当我们把孔明身上的虚饰部分逐渐剔除之后，孔明的形象就会发生较大变化。但是，我也丝毫不认为孔明的魅力会因此减少。就算孔明那仙风道骨般的形象减少许多，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人格魅力才会突显出来。

前面说过，“谨慎”要求一个人具有收集信息的才能。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孔明的确很优秀。在那个时代，作为牵制别国的一个条件，收集信息的能力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曹操（155—220）还是司马懿（179—251）都具有非凡的信息收集能力。

提到诸葛亮，我们会问他年轻时为什么就具有这方面的才能呢？首先要说他是一个社交家。他在荆州襄阳这个地方结交了很多像徐庶、庞统之类的人物。原来襄阳在很长时间里没有遭遇过战祸，所以有很多人才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襄阳城本身变成了一个人才沙龙。自然全国各地的信息也汇集到这里。一个人能否收集到信息与他的素质关系很大。人们喜欢孔明那种严谨诚实的性格而信任他。我认为孔明具有亲和力。正因为如此，他的周围才聚集着很多人才，也使他得到了很多信息。

其次，孔明年轻时去过很多地方。他父亲去世后，一家人分散，他跟随叔叔游历了许多地方。因此，他积累了广博的知识，锻炼了自己对信息的敏感度。在艰苦的生活中，他的品格也自然得到了完善。

在孔明的诸多魅力中，要问哪种魅力最为突出，我觉得还是他的谨慎以及证明其谨慎的人品。

有个著名的故事是“挥泪斩马谡”。孔明在第一次北伐时，因对马氏家族中的马谡过分看重，所以让马谡打头阵。上阵前孔明给马谡做了详细的指示，但马谡一到阵前，却不听忠告，结果大败而归。孔明虽然像喜爱自己弟弟一样喜爱马谡，但他还是根据信赏必罚的原则，追究了马谡的责任，将其处决了。

“斩马谡”的这种行为，彰显了孔明遵守法律的法家形象。本来孔明本质上就是法家，他信奉法治主义。但在“斩马谡”之前加上“挥泪”二字，又体现了孔明的“仁”。“仁”是儒家教义。由此可以看出，孔明虽是法家但同时兼具儒家思想。

另外，孔明把自己的人生押在了刘备（161—223）身上。我想，当初过着书生生活的孔明，对自己的将来肯定有过各种各样的人生规划，但他最终选择了当时实力最弱的刘备。可以说，孔明的这一行动体现了“侠”的精神。

“侠”就是扶危济困、帮助弱者的义气，这是墨家思想。所谓墨家思想，就是先找出一个处于劣势的国家，然后去帮助它。儒家教导人们对父母尽孝的道理，但并没有要求人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人。但墨子却主张“兼爱”，要求人们爱所有人，要求人们不管是对待父母还是他人都一视同仁。另外，他们（墨家）在帮助弱国时，会构筑巧妙的工事以加强对城墙的保护。因此，墨家也是个工程技术集团。可以说孔明也有墨家思想，因为他也发明了很多精巧的工具。

另外，孔明直到27岁都在隆中这个地方过着隐居生活，从外部观察着社会动向。这是老庄思想。因此，观察孔明的生活方式，我们发现他集法、儒、墨、老庄等多种思想于一身，是个多面人物。无论切开他的哪一面都能找到引起我们共鸣的地方。这不正是他能久居明星之列的主要原因吗？

刘备临终前，想到儿子刘禅的平庸，曾给孔明留下遗言，希望他根据情况即位当皇帝。但孔明至死都坚守着自己作为蜀国丞相的身份。毕竟孔明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自己不是皇帝类型，而是宰相类型的人。

宰相的“宰”字，按白川静[[1]](#_1_13)先生的解释，“宀”下面的“辛”字意思是“刀”。因此，在家里操刀的人就是厨师。厨师是将捕获的猎物用刀切开，并把它公平地分配给别人的人，即食物分配者。宰相是关注分配之人，具有裁量权。一国之中，宰相的职责是协助国王，主管分配及在分配财物时保持公正。

孔明之所以被誉为名宰相，是因为他巧妙地建立了多种多样的人际关系。我认为蜀国在运行中，存在着很多困难。当时，朝堂上人员复杂，派系众多。既有从刘璋时代就曾统治过蜀国的人，也有刘备从荆州等地带过来的人，还有一些像法正一样，是在刘备入城前背叛刘璋而投到刘备麾下的人。因此，孔明以一己之力来应付这些人，我想他是非常辛苦的。但是，孔明在那种情况下，却跟他们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反过来又使孔明获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关羽在荆州时，刘备重用了马超。关羽听说后，心里很不舒服。孔明知道这一情况后，马上给关羽写了一封信。信上写道，马超这个人虽然很有才能，但他哪能赶上美髯公你呢。关羽看了信后很高兴，就对人说还是孔明了解自己。我觉得，孔明非常了解别人心理的细微变化。孔明年纪轻轻就到处游历，和别人生活在一起，也许这些经历使得他在把握人的心理方面超凡入圣吧。

说起孔明的魅力，还有许多许多，比如无私、充满活力等。但我依然认为孔明自我评价的“谨慎”一词最为恰当。他的其他魅力不正是依托在“谨慎”之下吗？

我写过孔明的小说。但是，如果剔除虚构形象，实际上他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个非常难写的人物。他严谨诚实，清正廉洁，没有花边故事，是个完美度很高的人物。与孔明相比，曹操就有趣得多。尽管如此，我却无意把孔明写坏，对他的缺点也常常进行善意的解释。因为孔明有德，令人不能不那样做。

## 不苟言笑的名审判长

包拯是中国的大冈忠相[[2]](#_2_5)。更准确地说，大冈忠相应是日本的包拯。包拯出生于北宋咸平三年（1000），是比大岗忠相早近700年的真实人物。包拯因为担任待制这一职务，所以又被称为包待制，这一点与大冈忠相被称为越前守相似。包拯后来由开封府（当时的首都）知事升为副宰相。

世上流传着许多判案故事，大都托名于包拯，这一点也与大冈忠相相似。比如“两母争儿”，在中国被当成是包拯判决的案子，而在日本它又成了大冈忠相所做出的裁决。根据有关研究人员的说法，“两母争儿”的故事好像起源于印度。但是，好的判案在中国都被说成是包拯做的，在日本又都被说成是大冈做的。

有许多作家写包拯的故事，这些故事统称为“包公案”。公案在中国是指审判。这也跟《大冈政谈》有相似之处。也许是很多作家都写包拯的故事，所以他的性格就不太鲜明。这一点也与大冈越前守相同，大冈越前守绝对没有“远山的金先生”[[3]](#_3_3)那样性格突出。

在诸多包公案的故事中，石玉昆在19世纪中期所写的《三侠五义》最受大众欢迎。由于包待制的地位高，所以他本人不能随意到处走动。于是，那些在包待制的感召下洗心革面的坏蛋，就秉承包待制的旨意闪亮登场了。有意思的是，那些坏蛋虽说改邪归正了，但也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好人，所以他们常会暴露出本来的面目。鲁迅（1881—1936）在评论《三侠五义》时说，故事中的那些不法之徒，表现得尤为精彩。意思是说，包待制的人物塑造呆板乏味。

那么，包拯的真实形象到底如何呢？据《宋史·包拯传》记载，他虽被宫廷里的贵戚和宦官忌惮，但却受到儿童和妇女的喜爱，大概是因为他全心全意秉公办事的缘故吧。包拯绝对不做沽名钓誉之事。首先，他以不笑而闻名于世。在《宋史》中还有这样的记载，人们把包拯的笑比作黄河水清（一样极难发生的事情）。黄河每千年才有一次河水清澈的时候。虽说包拯不笑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但他确实很少笑。

包拯虽然不苟言笑，但他应该是通情达理的，否则他当不了著名的判官。他能控制住自己不笑，才会睿智迸发，难道不是如此吗？胡适（1891—1962）曾将包拯称为“中国的福尔摩斯”，虽然包拯在日本不被人们所熟悉，但实际上他却活跃在《大冈政谈》这本故事书中。

## 伟大的蒙古

有两个国家建立了世界性的帝国政权：一个是自诩为日不落的海洋帝国——大英帝国；另一个是坚信从日出到日落的所有领土都是神赐予的草原帝国——蒙古帝国。二者的共同点是有庞大的统治面积。特别是蒙古帝国，因为成吉思汗（1162—1227）所倡导的超越民族宗教的精神为历代大汗所继承，所以才形成了历史上最大的国家版图。不过，地球从此也必将超越国家的界限。难道我们不能在蒙古帝国的成功和失败中，得到一些启示吗？

蒙古帝国突然出现在世界历史上。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是从1219年成吉思汗进攻花剌子模[[4]](#_4_1)王国开始建立的。

十万人的骑兵军团，以2500千米之遥的远方为目标，一步一步向西进军。据推算，随从者有20万人，是骑兵的两倍，所带的羊只竟达300万头。这是一次非常壮观的远征。

这次大战以蒙古军的轻松取胜而结束。出人意料的是花剌子模不堪一击。本来成吉思汗对世界所知不多，但这场胜利，无疑坚定了他称霸世界的雄心。但仅凭武力是不能称霸世界的，促进世界帝国形成的最大原动力是游牧民族所拥有的“宽容精神”。

苍狼铁木真是在平定各个割据诸侯之间的武力争斗中壮大起来的。他于1206年在“成吉思汗”的称号下统一了蒙古草原。如果从这个骑兵军团的强大来考虑，或许有人会认为，即便不是铁木真也会出现一位领导者统一蒙古，震惊世界。但是，我认为能够建成那样强大的帝国，除了成吉思汗之外，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够做到。这是因为成吉思汗具备了卓越的领袖素质和建立帝国所必需的条件。

在统一草原各部落的过程中，铁木真掌握了足以获得游牧民信任的丰富知识。看到云彩，他能预测哪个方位下雨，下多少雨；他还能预测草场的位置；他说哪里有水，哪里就确实有水。因此，只要牧民们听从铁木真的话，人和羊就能免于死亡，平安无事。

为人公正也是铁木真的力量。铁木真与一个强大部落的首领扎木哈曾经是盟友，但他们之间爆发了战争。《元朝秘史》[[5]](#_5_1)是蒙文的汉译名称。据这部蒙古史书记载，那次战争中扎木哈赢得了胜利。而根据伊尔汗国编纂的《史集》记载，胜利一方却是铁木真。《元朝秘史》的记载是，战争结束后，许多部众从扎木哈阵营转到了铁木真阵营。部众从胜者阵营转向败者阵营，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这种结果的出现，可能要拜传言所赐。扎木哈阵营里的部众对战利品的分配心怀不满，当他们听到“如果到铁木真那里，会受到公平对待”的传言后，就纷纷倒戈了。当时蒙古没有文字，所有事情都靠口头传达。况且，那种传言一旦被证明不是谎言，就再也没有比它更强大的力量了。当初势力很小的铁木真，之所以能逐渐扩大势力，最后一举统一蒙古各个部落，很多地方靠的是智慧和公正。

在打败花剌子模之后，仅仅过去七年，成吉思汗于1227年在远征中国西北部的西夏途中，带着遗憾病死了。征服世界的梦想由第二代大汗窝阔台继承下来。从此，对欧洲的大远征开始了。蒙古人攻陷基辅，侵入匈牙利，以欧亚大陆为舞台，建立了东起中国，北至俄罗斯，西起西南亚，直到东欧一带的庞大帝国。

在帝国内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蒙古军队对宗教是宽容的。窝阔台汗的妃子就是基督徒，还有很多异教徒也被录用为高官。另外，蒙古人虽然入侵，但对被征服地区的社会体系，如民族习惯等却没有改变。蒙古人在没有出现大的混乱状况下建立起世界帝国，原因在于他们对多民族多宗教的包容。这正是成吉思汗的理念。

帝国主要委托色目人搞经济，对日本的进攻也是让高丽和南宋的水军来负责。自己不擅长的事就委托擅长的人来做。可以说，这种合理主义也是蒙古帝国的特长。

然而，不久帝国崩溃的时刻就来临了。元朝是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立起来的王朝。在其末期，蒙古人开始歧视南宋居民，称南宋人为“南人”或“蛮子”。或许是长年的统治使得蒙古人逐渐变成了农耕民族的缘故，他们不像以前那样包容游牧民族的宗教信仰。基本上是靠“宽容”而建立起来的帝国，由于抛弃了成吉思汗的统治理念，不得不过早地走向瓦解。

1991年7月底，我获得了到蒙古访问的机会。过去听说那里夏天炎热，但是在盛夏时节，我却遇到了冰雹。我亲眼目睹了大自然的严酷，草原看起来平缓而美丽，就像铺上了绿色的绒毯。但坐上吉普车开起来，我却意料地发现草原有那么多凹凸不平的地方。这让我吃惊不小。

我也体验了蒙古包里的生活，感到非常舒服。我还坐直升机飞到了鄂嫩河，访问了正在那里搜寻成吉思汗墓的日本考察队。据说墓地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这么说来，蒙古帝国好像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哈拉和林”，曾是以驿站（站赤）这种“驿传”方式把欧洲和西南亚连在一起的草原壮丽之都，现在仍然找不到它的踪迹。忽必烈花费约20年建成的大元首都“大都”也长眠在北京城的地下。虽然旭烈兀所建立的伊尔汗国延续了大约80年，但在其消亡的遗迹中，仍然找寻不到当年留下的任何痕迹。

蒙古只是坐在那里岿然不动，好像不想让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征服地中去。它在大约200年间，在整个欧亚大陆刮起了怒涛般的狂风，然后又像完成了任务似的回到草原。这就是蒙古！我们只能说它潇洒至极。

窝阔台汗不住在“哈拉和林”，他绝不会放弃草原的蒙古包生活。忽必烈在大都也有蒙古包，因为蒙古人对游牧民的生活充满自豪。另外，属于北方民族系统的“金”“辽”“清”等中国王朝，都以采用汉字为开端，逐步接受汉族文化，最后被同化了。而与此相反，只有“元”没有被同化。

这个伟大的游牧民族勇猛地开辟出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并给后来的世界造成了巨大影响。开辟东西商业通道的是成吉思汗，答复罗马教皇亲笔信的是第三代大汗贵由。贵由的回信让欧洲第一次看到了“纸”这种新文化符号。马可·波罗到过大都，他的《东方见闻录》[[6]](#_6_1)激发了哥伦布寻找海上“黄金之国——日本”的梦想。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

蒙古帝国虽然没留下什么痕迹，但现代世界确实是在它之后形成的。因此，当我们进一步展望未来的地球时，就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那个曾经宽容、公正、自豪、潇洒的世界帝国“蒙古”吧。

## 写耶律楚材

后世史家在总结20世纪时，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概括它呢？

面对这一提问，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回答：

——（20世纪）是个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世纪。

我认为这个回答太好了，令人敬佩。

的确，这个时代，一面开展着用普通显微镜所看不到的基本粒子研究，一面又将其成果应用到宇宙开发之中。

一面推进全球化，比如欧共体等；一面又开始民族的具体分化，比如像在南斯拉夫所看到的那样。另外，捷克与斯洛伐克将要分离的传言也在世间传播着。那么，民族到底是什么呢？

我在一段时间内，对民族问题也进行了思考。当时，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耶律楚材（1190—1244）的故事。

契丹曾是生活在蒙古东部地区的游牧民族，后来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个规模很大的“辽”王朝。契丹王族的姓是耶律。耶律楚材虽是辽国王族的后裔，但他所拥有的汉文化修养远远高于当时的一般汉族人。后来，辽国被过着狩猎生活的女真族“金”所消灭，耶律一族开始臣服金王朝，并在金王朝中占据重要职位。最后，金又受到游牧民族——蒙古的进攻。

于是，耶律楚材投降了蒙古政权，并担任了宰相。对于耶律楚材，我真想走进他的内心一探究竟。耶律楚材的一个同父异母哥哥为金国捐躯，另一个哥哥发誓不为蒙古人的元朝服务，终身隐居。他们虽然是亲兄弟，但每个人的想法却不一样。或许耶律楚材认为，蒙古人对农耕民族的情况一无所知，如果不向蒙古人提出自己的建议，人民可能会遭受不幸，所以他才投降的吧。然而，事情可能并不那么简单。

尽管如此，我并不打算写一部复杂的小说。时间跨度上，相当于日本鸭长明[[7]](#_7_1)写作《方丈记》的时代。当时亚洲大陆有那么多特殊情况，有那么多人生活在那里。我只是想以这些内容为素材，向读者讲述一些有趣的故事。

中岛敦[[8]](#_8_1)始终对人的命运抱有深切的关怀，他曾对朋友说将来要写耶律楚材。中岛家里存放着14卷《湛然居士文集》[[9]](#_9_1)（耶律楚材的文集），其中中岛的红色批注直到第三卷，但他最终没有能够写出作品来。

## 郑成功诞辰370周年寄语

郑成功（1624—1662）出生的1624年，是日本关原之战[[10]](#_10_1)结束后的第24年，德川幕府体制终于渐趋稳固。而大明帝国却在郑成功出生20年之后失去首都北京而灭亡。

最终郑成功离开了战火平息的母亲之国，在风起云涌的父亲之国里，大显身手。

他最后占据的台湾，是大航海时代日本与中国、东南亚进行贸易往来的中转站。

郑成功不仅是反清复明的斗士，也是南海首屈一指的贸易集团领袖。

亚洲的近代史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是定论。对此，也有的说法认为，亚洲的近代史早在17世纪的明末清初就已经开始了。郑成功就处在这样一个重要时期。

虽是我个人的私事，但我还是要在这里提一下。我是在郑成功诞辰300年的1924年出生的，干支也同样是“甲子”。如今我迎来了古稀之年，也就是郑成功诞辰370年，所以，我感到特别亲切。

## 《天球飞翔》中的琵琶山

30年前，我一个人到美国旅行。那一年正是举办横跨美国大陆的铁道开通100周年（1969）纪念活动的第二年。我到达旧金山的华人协会时，听说他们收到了一封美国总统的书信。原来从萨克拉门托到中央太平洋铁路的那段铁路，从路基整修到铁轨铺设是由数万名中国劳工承建的。

然而，在纪念铁路开通的庆典上，中国劳工却没有一人受邀参加。100年过去了，美国总统对那件事表示遗憾和道歉。我认为这是美国的可贵之处，尽管事情已过去了100年，但该道歉就老老实实地道歉。

那时，我对铁路施工的情况做了一些采访，采访是问答式的。当时从事铁路施工的中国劳工被称为“苦力”，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是通过奴隶贩子之手被召集而来的。另外也有一些人是受到通缉而逃到美国来的反叛者。这些反叛者几乎都与太平天国有关，但也有一些人是“捻军”“小刀会”“天地会”等反政府的逃犯，结伙进入美国的也不在少数。

我曾对美国华裔公民的系谱很关心，因为我本人也是出身于被称为华侨的小团体，所以对此不能置身事外。我想将来写一写美国华人的故事。30年转瞬即逝，我不能永远悠闲自得地处于构思阶段，于是，我毅然地拿起了笔。

故事是从华南的某个海盗岛开始的。因为我对法纪缺失的世界感兴趣，所以36年前就写了《桃源遥远》这样一部中篇小说。没想到那篇小说受到吉田健一先生的赞赏，我作为一个新人获得到了极大荣誉。获得的破格待遇是一份报纸文化版面的整个时评栏都归我使用。《桃源遥远》中的岛名叫“琵琶山”，而我在新长篇小说《天球飞翔》中，也用了这一地名。小说讲的是“多民族国家形成”初期的故事，而多民族国家是以拯救21世纪的人类集团形态出现的。

注解：

[[1]](#_1_12)　白川静是日本著名的汉字学家。他的研究立足汉字学，横跨考古学与民俗学，旁及神话和文学。他透过卜辞金文的庞大研究业绩，对汉字的体系与文化源流系统性、独创性地提出丰富又生动的见解，在日本汉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本土的文字学研究也有着独特的借鉴作用。——译者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2]](#_2_4)　大冈忠相（1677—1752），原名为忠义，后改为忠相，原是江户时代中期的幕臣、大名。通称求马、市十郎、忠右卫门。官职为能登守，后转任越前守。其实大冈忠相最为人所熟知的，还是那些经典的判决。世人称他“法眼如炬”。元文元年（1736）成为寺社奉行，宽延四年（1751）因病去世，享年75岁。

[[3]](#_3_2)　远山的金先生是日本历史连续剧《远山的金先生》中的主人公，该剧讲述的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北町奉行（北町地区的处理政务的官员）远山金四郎的判案故事。远山金四郎幼名通之进，名景元，通称金四郎。年轻时好酒色，后悔悟。承继家督，提拔为目付（监察官）。天保六年（1835）任小普请奉行，主管小工程。后任作事奉行、勘定奉行、北町奉行等职。时因与德川幕府首席老中水野忠邦亲信南町奉行鸟居忠耀意见不合，被贬职。1845年复职。任内能通达下情，被称赞为“天下三奉行之一”。

[[4]](#_4)　花剌子模（乌兹别克语：Xorazm；俄语：Хорезм；阿拉伯语：00005.jpeg‎，Khwārizm；波斯语：00006.jpeg‎，Khwārazm；英语：Khwarezmia或Chorasmia。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及土库曼斯坦两国的土地上），1037年到1194年受塞尔柱帝国统治。在苏丹桑贾尔时闹独立，苏丹出兵捕阿即斯之子，迫使其臣服。

[[5]](#_5)　《元朝秘史》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之历程的历史典籍，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原书用畏吾体蒙古文，即古蒙古文写成，成书地点在蒙古高原的克鲁伦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流域，年代大约是13世纪，作者佚名。

[[6]](#_6)　《东方见闻录》是13世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记述他经行地中海、欧亚大陆和游历中国的长篇游记。马可·波罗是第一个游历中国及亚洲各国的意大利旅行家。他依据在中国17年的见闻，讲述了令西方世界震惊的一个美丽的神话。这部游记有“世界一大奇书”之称，是人类史上西方人感知东方的第一部著作，它向整个欧洲打开了神秘的东方之门。

[[7]](#_7)　鸭长明（1155—1216），日本平安末期歌人。他的一生正值源平动乱的时代，经历了平氏一族的灭亡和古代天皇制的衰落。因此他在随笔集《方丈记》中流露出对时代变幻无常的感慨。《方丈记》成书于1212年，被誉为日本隐士文学之“白眉”（最高峰）。全书共13节，以简洁严整的和汉混合文体写成，笔意生动而富有感情。

[[8]](#_8)　中岛敦（1909—1942），日本小说家。1909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市四谷区箪笥町，祖父及父亲都是汉儒学者，自幼即受熏陶的中岛，被称誉是消化吸收了伦理思想的“诗人、哲学家和道德家”，同时也摄取西欧文学。他的主要作品有《虎狩》《环礁》《斗南先生》《狼疾记》《盈虚》《牛人》等；取材自中国古典文学的有《李陵》《弟子》《悟净出世》《名人传》《山月记》；也留有汉诗。

[[9]](#_9)　《湛然居士文集》（14卷），耶律楚材撰。最早编成于1233年，共9卷，系当时中书省都事宗仲亨辑录，这9卷就是现在14卷的前9卷。后来又有人补辑了耶律楚材1233—1236年的作品，是为后5卷。全书以诗为主，也有一些序、疏等文章，反映了作者的部分经历，个人的真实思想和当时的社会状况。

[[10]](#_10)　关原之战是日本的安土桃山时代及战国时代发生于美浓国关原地区的一场战役。时间是庆长五年九月十五日（1600年10月21日）。广义而言，其战事蔓延至日本全境，双方均动员了超过十万兵力投入战斗，多数大名各自表述自己的立场，从出兵到撤退维持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可谓自应仁之乱以来全日本的最大规模的内战。狭义而言，是指在关原的战斗，是统治关东地方江户的德川家大名东军主将德川家康与另一方丰臣秀赖的家臣西军灵魂人物石田三成之间的战斗。大战的结果是德川家康真正成为了霸主。1603年，德川家康创立德川幕府，就任征夷大将军。

# 第二部分

## 交流的成果

最近以玛拉沁夫先生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要来日本访问，我表示由衷的欢迎。

文化交流不是一次性的，持之以恒，坚持下去才最为重要。中日两国文学家之间有着长久的交流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此我感到很高兴。关于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以前我有过很多难以忘怀的记忆。

1985年的那次代表团，张光年先生是团长。记得当时听说他做了胃肠手术，访日前才刚刚出院，所以我还特别担心他的身体。

那次来日访问，一如既往是在4月份。那一年的10月，我在北京拜望张先生时，见他脸色很好，这才放下心来。当时，他刚从湖北旅行归来，还把旅途中所作的九首绝句抄录给我。

由于这些交往的缘故，张先生的身体让我产生了多余的担心。此后，每当我遇到中国作家协会的人，就像平时打招呼一样，总是要询问张光年先生身体如何。1992年10月，我拜访冯牧先生时也同样向他这样询问，他告诉我说：“张先生非常好。”

那一年（1985）是乙丑年，牛年。张光年先生那个访问团的成员中有位从维熙先生。同年10月，我拜会他时，说起我们同一年见了两次面，于是他就送我这样一首绝句：

牛年再逢孺子牛，

文苑耕耘到白头，

碧血丹心化翰墨，

心香一气人间留。

“孺子牛”，当然让我想起了铭记于心的鲁迅先生名句：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我在文坛上拼命工作，现在已是满头白发，这一点的确属实。但是，距离把碧血丹心化作笔墨，在世间留下了伟大业绩的那种境界，我还差得很远。对于从先生的过分夸奖，我深感愧不敢当。于是，和其韵，写了下面的绝句作答。

徘徊践历似蜗牛，

顽石依然未点头，

碧血淡浓深几许，

丹心一片白云留。

我像蜗牛一样爬行着。据说梁（南北朝刘宋王朝时期）生公说法，连无心的石头都点头。作家正应该追求那样的目标，但距离那样的目标我还差得很远很远。

从先生的作品也被翻译成了日文，虽然我读着很费劲，但可以感受到先生的气息，它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时先生的音容笑貌。这些大概就是交流的成果吧。我要珍视中日两国文化人之间的交流机会，衷心祝愿这次代表团的诸位先生身体健康，取得更大收获。

## 破除20世纪的禁忌之时

1992年10月，我参加了“三峡研讨会”。从湖北省沙市乘坐“峨眉号”客轮，沿长江三峡溯流而上至重庆，历时五天四晚。在船上，与会者对每个主题都进行了探讨，会议共召开了五次。会议概要曾在《朝日新闻》的报纸上介绍过。实际上，这次系列研讨会的名称叫“展望21世纪的亚洲国际研讨会”。我记得在1992年，我所见过的另外几个研讨会、演讲会，标题或副标题也都带有“展望21世纪”之类的字样。

距离21世纪在年份上已逼近个位数，所以世界上随处都可以看到人们面向新世纪展望未来的身影。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为了使21世纪成为更加美好的时代，人们都想做一些切实可行的努力。这些研讨会也可以看作这种努力的体现之一。

21世纪向我们走来，意味着20世纪即将结束。在“峨眉号”客轮上，当人们对未来做着各种各样的畅想时，我却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沉浸在对20世纪的回顾中了。未来当然处在从过去奔流而来的洪流中，在展望未来时回顾过去，又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态度。

“三峡研讨会”给我带来了巨大希望。这次研讨会虽是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而举办的一项活动，但不只在中日之间，也是东亚规模的研讨会。

柏林墙拆除、苏联解体等事件，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次三峡研讨会的规模，几年前也是无法想象的。

我有一种预感，那就是在不远的将来，现在不可预料的事情将会一个接一个地实现。想到那种情景，我的内心特别高兴，这肯定是一种“展望”。

在“峨眉号”客轮上，我想如果召开的不是关于未来的研讨会，干脆就是关于过去的研讨会，展望将会更清晰地呈现出来。

1991年是辛亥革命80周年，各地好像都举行了历史研讨会。其中一场研讨会是在夏威夷的檀香山召开的。我听说发生了这样一段插曲。日本学者在会上发言说，孙中山（1866—1925）曾对日本人说过，如果成功推翻清王朝，作为援助革命的回报，可以割让东北。中国学者听了这些话，勃然大怒，会场气氛一时非常紧张。

如果是学术研讨会，参会者应该就某个事实是否存在进行辩论，论辩双方要各自找出证据，证明其真伪，这才是正确的做法。不能给讨论设置禁忌。

历史越近，禁忌越多。人们对1840年鸦片战争的讨论，已经几乎不存在禁忌了。香港回归是20世纪的大事，我们期待以此为契机举办鸦片战争研讨会。

鸦片战争百年之后所发生的抗日战争也即将迎来逐渐消除禁忌，进行严谨的学术讨论时期。通过学术探讨，既可以跟英国、美国、俄国等进行比较，也一定会使20世纪的面貌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说得明确一点，20世纪的面貌令人恐怖。我们要了解它，学会以怎样的面貌进入21世纪。

人们都说，对近代史认识不足是日本人的致命弱点。日本人只有克服这一弱点，才会在21世纪的世界受到尊敬。

## 想象力的翅膀

人们经常提到动物性本能，但动物的本能，要比人敏锐。以前经常报道这样的事情，比如某种生物预感将要发生地震、台风之类的灾害而提前集体出逃等。

但是，人没有那样的预感，代之而来的是想象力。人是靠想象力来提升本能的。我们靠近深不可测的沼泽或站在陡峭的悬崖边时，往往会恐惧得全身发抖。

而动物之所以会感到某处危险，是因为动物有一种我们无法解释又感到有些不吉利的、类似于幽灵一样的东西附着在它们的皮肤上，而这种东西向动物传递信息。我们只能说那是本能。

只要是人，如果他确实看到或听到有人掉入深渊而死，或者有人从峭壁跌落而死，他就会因此而恐惧。哪怕看到有人掉到小河，他也会设想这个人没被淹死是因小河的水浅，要是掉到水深的河里将会如何等。也就是说，他会对那种后果感到害怕。

前几天，发生了一起中学生杀人事件，引起了世人极大的震惊。据说是一个中学生被一个5岁小孩挡住了去路，他一气之下用刀把小孩刺死了。发生这种事情，有识之士肯定会重复一样的陈词滥调：“他是哪儿不正常吧。”

到底是哪儿不正常呢？对这种情况，可以明确告诉大家的是，那个中学生根本就没有想象力。

“杀死5岁的孩子，将会怎样？”正常人依靠非常简单的想象力就足以解决。比如我们会想：发现小孩死尸的人会惊恐地通知警察，警察会全力搜捕。日本警察很优秀，所以犯人肯定会被很快抓住。犯人被抓住之后，等待他的将是什么结局，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使用“想象力”这个词，都会令人感到勉强，倒不如把它归入到动物本能这个类别更合适。

“代沟的时代”是一个特别吸引眼球的语句，现在很流行。人们也在激烈地议论着怎样消除代沟的问题。实际上回答很简单，那就是依靠想象力，除此之外再无更好的办法。

父母不懂子女，子女不理解父母。因为双方都不属于对方的年龄段，所以彼此才会互不理解。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代沟就必然发生。

“我不太了解情况，事情是不是这样的呢？”

双方都要发挥想象力的作用，以上述心态来接近对方。如果不做这种努力，代沟将会越来越大。

我衡量一个人的格局大小，通常是看他的想象力是丰富还是贫乏。如果我们没有“那个人会是这样吧”之类的想象，就不可能同情他，不能和他产生共鸣，更不能包容他。另外，我认为古往今来的大事业、大发明大都是想象力的作用。朝气蓬勃的伟大时代，人们的想象力极其丰富。相反，萎靡不振的时代，人们的想象力又极度贫乏。也许是人们的想象力贫乏，才导致那个时代索然无味吧。

中国古代文化极其繁荣，曾出现过灿烂的百家争鸣时代。但自汉代至近代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却在所有领域都陷入了停滞状态。为了摆脱这种状况，中国人必须进行艰苦的奋斗。如果有人要问个中缘由，我会毫不犹豫地大声回答，是因为人们的想象力被封杀了。

自汉代，儒家文化便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其根本态度是“述而不作”。也就是说，只叙述、传达事实，不许加入创作。这是事实至上主义，引导人们不要接受那些看不见的、虚构夸张的事物。在此情况下，人们的想象力只能受到压抑。

中国自《史记》以来，叙述史实方面的文学举世无双。在抒情文学的诗歌领域，也拥有许多优秀作品。但是，直到最近小说都萎靡不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小说不仅要叙述事实，还必须进行创作。

张继的《枫桥夜泊》收录在《唐诗选》里，日本人也很熟悉。这是一首以“月落乌啼霜满天”开头的诗。但宋代有个叫欧阳修的学者，却说它违反事实。他说问题出在第四句“夜半钟声到客船”上。我感觉欧阳修考虑的是钟声会妨碍居民睡眠的问题。不过，据说在中国，日落后撞击寺院的钟是被禁止的。因此，欧阳修说，夜半的客船上根本不会听到姑苏城外寒山寺的钟声。

这是在写诗！哪怕诗人是为了丰富自己的诗情，也仍然不允许他加入虚构成分。想象力是飞跃的原动力。如果想象力被压抑，呈现出来的当然是停滞不前的状态了。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飞速发展曾震惊世界。我想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我要举出一个原因，即日本人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还没出现类似小说这种作品的年代，正是想象力催生了《源氏物语》[[1]](#_1_15)这样的长篇小说。也就是说，想象力产生飞跃，飞跃创作出韵律，韵律再诱发下一个飞跃。

日本在战争期间所唱的“爱国进行曲”中有一句歌词“旭日高高辉映”。如果是在中国，可能会有人对这种说法感到奇怪。因为旭日是指早晨的太阳，而早晨的太阳是低低地贴着地平线或山谷上升的，“高高辉映”指的不是中午的太阳吗？

“高”是表现威武雄壮的一个词，如果这个词表达的效果好，多少脱离一点事实也无所谓。想象力丰富的人脑海中浮现出“高高辉映”的旭日也是可能的。

这种想象力正是小说家的武器，作家让各式人物在小说中一一登场，但他当然只能体验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体验别人的人生。他只能丰富自己的体验和见闻来捕捉别人的人生。这种写作活动是靠想象力来完成的。另外，作家也必须依赖读者的想象力，但读者的想象力到底是什么程度，也只能依靠想象力才能感知到。

## 永远繁荣之路

《源义经》[[2]](#_2_7)在NHK大河电视剧频道放映时，神户市民的反应比较冷淡。

这或许要怪神户市民更关心在神户建造了福原京的平家吧。清盛塚、敦盛塚、经俊塚、知盛碑、忠度腕塚等，凡是跟源平有渊源的史迹均出自平家之手。

向失败者掬一把同情泪乃是人之常情，但除了这个原因，神户恐怕还是亲近平家的感情更深入人心。在一之谷或鹎越附近，本可以为源义经立个纪念石碑，但那里却空无一物。

作为一名神户市民，我也是平家，特别是清盛[[3]](#_3_5)的粉丝。NHK电视台拍摄的《新·平家》，似乎更让我们神户市民感到兴奋。

但是，我虽是清盛的粉丝，却有一件事情不能原谅清盛：清盛将大约300名称为“童”[[4]](#_4_3)的十四五岁的少年派到京都，同时把反对平家的人全部逮捕并没收家产。

手握权力的人想永远把持权力是人之常情，但是对说自己坏话的人采用这种手段予以惩罚，只能说这是政权末期症状的体现。

平家的天下是瞬间崩溃的。可以说，是那些遭受“童”摧残的人们所淤积起来的怨恨消灭了平家。

中国明末有个叫魏忠贤的宦官。他在权势达到为所欲为的地步时，为了抓获对自己不满的人，动用了被称为“东厂”的秘密警察。魏忠贤抓到那些人后，对他们施以如生剥人皮等酷刑。这种刑罚又叫“人蝙蝠”。人如果仅是前面的皮被剥后，皮与手脚连在一起，其形状完全跟蝙蝠一样。他们竟想出这么严酷的刑罚！

然而，执行这种刑罚的人也得做好被处死的心理准备。“人蝙蝠”没被做成之前，如果受刑者因心脏停跳而死亡，作为惩罚，行刑者本人也会被做成“人蝙蝠”。

残忍即是愚蠢。不能不说这种酷刑残忍至极。

这种人世罕见、地狱才有的刑罚也没能抑制住人民的批评。

明熹宗死后，如此嚣张的魏忠贤也被抓了起来，最后落得个自缢身亡的下场。但新皇帝还是把魏忠贤的死尸处以喋刑，将其枭首示众。不那么做，人民的不满就得不到平息。

害怕批判是临死前的症状。

被魏忠贤弄得奄奄一息的大明帝国，再也不能起死回生了。他死后17年，如此强大的帝国轰然倒塌。

一味压制反对之声并非明智的施政之道。政府一旦开始压制批评，便不会坚持太长时间。

民主主义国家是在人民监督政府的基础上施政的，所以，如果坚持这种原则，国家就不会灭亡。

我认为，这才是永保繁荣之路。

## 对大众无限亲切

有人认为，要读懂一名艺术家只需阅读其全部作品就足够了，不需要对其日常生活及环境进行了解。但是，对于鲁迅却不能如此。

鲁迅生长在不断走向衰亡的清王朝末期，那是一个不思进取的封建社会。后来，他到了异国他乡的日本求学，时刻关心着中国革命。回国后，鲁迅生活在反动派对他到处张网搜捕的环境当中。在自己喜爱的学生被白色恐怖夺去生命的严酷形势下，鲁迅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写作。

我们必须要说，了解鲁迅的阅历和生活是理解鲁迅作品的基础，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中国旅行时我也访问过上海的鲁迅故居。通过参观和访问，我感觉自己跟鲁迅的内心贴得更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展”的意义极大。

我忘不了鲁迅的墓前摆放着上海小学生敬献的花环，上面写着“献给鲁迅伯伯”。鲁迅对敌人来说，是令人可怕的存在，但对人民大众来说，他是和蔼可亲的人。参观“鲁迅展”，我们可能对此会有更深的体会。

## 晚节

所谓“节”是指竹节。它支撑着笔直的竹子，并将竹子区分出节点。立春、惊蛰等二十四节气就来自于节的这种含义。“节”又指节操、节度。古代中国天子曾让使者持符节出使别的国家，由此产生节操、节度的含义。它的意思是要完成任务。使节、使节团等都是基于同样的用法。

晚节是指人临终前的一段时期。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如果一个人能够对其一生所积累下来的东西保持不变，那么他的晚节就是幸福的。但是，当社会发生重大变故时，一个人的节操会受到人们的追问。一个人的节操受到严厉追究的时候，恐怕是在他面临是否投降的紧要关头。

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00年左右），李陵在与匈奴作战时，因“刀折矢尽”而投降了匈奴。而苏武作为出使匈奴的使者，虽被匈奴扣留19年却对各种诱降毫不动摇。李陵没能做到战死不降，也就是说他屈节了。但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称在那种情况下李凌是迫不得已的。后来，李陵和苏武相逢，出现了二人相拥而泣的场面。后世之人读到这段历史时，无不为两个人的气节感动流泪。

玷污晚节是道德犯罪和刑事犯罪。拒绝诱惑依靠的是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从小接受的道德教育及性格、意志力等，还需要有某种程度的经济力，即能使自己生活下去的经济实力。常言道：“无恒产者无恒心。”如果一个人没有“不再奢望”的内心满足，是很难战胜诱惑的。

我们一般人的“节”是遵守一定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快步前行，在每个节点上都会考虑这样做是否可行。

有的人以前没有信仰，到了晚年可能因内心不安而开始信佛。但这种行为不是屈节。正如学者发现自己的错误而改变自己的学说一样，这样的改变还是越多越好。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能认识到自己一直坚持做的事情是正确的，那就是幸福。

## 紫禁城逸事

现在被我们称为“故宫”的北京紫禁城，原本是明朝在元代的皇宫遗址上建造起来的宫殿。明末战乱中有很多建筑物被毁，紫禁城又在清初重建了。因为紫禁城是根据明代的结构加以复原的，所以我们能在这里回想起明代的宫殿样式来。

由于这个缘故，人们大多把紫禁城称为明清两代的皇宫。但是，在明清两代，紫禁城里的氛围却大相径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两个王朝的宦官势力不同。

明清两代紫禁城里都有很多宦官。宦官就是被阉割了的男人。以前，宫廷里使用的都是一些受过“宫刑”的人。后来，有的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宦官，就让其接受阉割手术，甚至还出现过自愿接受这种手术的人。

明末有个叫魏忠贤的男人，因赌博失败而走投无路，于是就接受了阉割手术成为宦官。据说，魏忠贤权势熏天，堪比宰相，谁反对他，谁就会受到残酷的刑罚，一时冤死者无数。另外，明代的治安警察权掌握在宦官的手里，大臣们看到宦官也是战战兢兢，恐惧不安的。

清代虽然也有宦官，但他们只是做杂役。唯一一个乱用权势的人就是清末的李莲英。李莲英是个梳头的，深受西太后慈禧的喜爱。但他只是热衷于敛财，并没有介入政治的企图。他为了回报给自己行贿的大臣，也只会对西太后说“某某最近干得不错”等。

人们把西太后慈禧摄政时期称为“垂帘听政”。当时，大臣们只能隔着帘子报告情况或领受旨意，但是因为宦官不是男人，所以，他们可以直接面对西太后而不用垂帘。李莲英是为西太后梳头的太监，如果有个帘子他也就无法工作了。据说李莲英虽然容貌丑陋，但机智聪敏，彬彬有礼。

李鸿章（1823—1901）、曾国藩（1811—1872）等汉族大臣面见皇帝时自称“臣”；满族人面见皇帝时自称“奴才”。奴才就是奴隶。而宦官面见皇帝时自称“家奴”，即家里的奴隶。在皇帝近前服侍的正是宦官。

据说，李莲英甚至对皇位的继承问题都参与过意见，但那可能是西太后主动找他商量的。决定谁当皇帝是国家大事，也同时是皇室，即爱新觉罗家的大事。家中的寡妇向最熟悉家里情况的管家询问“某某怎样”，这也在情理之中。

但在清代末期，之所以皇位继承会成为问题是因为同治帝（1856—1875），即西太后儿子的嗣子死去的缘故。在此之前，清王朝曾有过较为完备的惯例。清朝的传统是皇帝在位期间不指定继承人，也就是不立皇太子。皇帝在人数众多的皇子当中，选择一位他认为最优秀的皇子，在诏书上写上其名字，并将它密封好后放到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皇帝去世后封条才会被开启。清朝就是以这种办法来决定谁继位当皇帝。

根据这种方法皇子们为了得到提名，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竞相努力，奋发向上。如果皇帝贸然决定皇太子，朝廷上必会出现阿谀奉承、结党营私的现象。

也许是由于这一惯例的实施，清朝260多年没有出过被称为“昏君”的坏皇帝。这一点跟明朝相比就大不一样，明朝竟是昏君迭出。在宦官势力强大的明朝，恐怕在皇位的继承问题上宦官也参与意见。对宦官来说，他们希望立一个容易操纵的皇帝，其结果必然是挑选一个“昏君”。

因为西太后所生的同治帝是先帝（咸丰）唯一的儿子，所以自然不会求助于乾清宫内的匾额。同治帝5岁继位，19岁死于天花，在位期间几乎全是由西太后摄政。所以，同治帝是不是明君我们无法判断。

关于同治帝的死因，在民间有传言说他不是死于天花而是死于恶性性病。另外也有人说，他是拒绝母亲所推荐的候选皇后而被西太后毒杀的。同治帝不顾母亲反对而娶的皇后，在同治帝死后不久就自杀了。据说，她还在孕中，但也惨遭西太后毒手。从西太后后来所使用的毒辣手段来看，这种说法具有很大的可信性。

西太后出身于满族的叶赫那拉氏。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满洲的少数民族部落时，做过最激烈抵抗的正是叶赫那拉氏。当时，喜欢说长道短的百姓争相议论道——西太后出身于爱新觉罗氏的仇敌之家，她就是为消灭清朝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 景观杂感

有人说在世界的都市风景中，位居第一位的是东京的护城河畔。说这种话的人，我虽然没有记住他的名字，但确实是个外国人。大概在日本人中说这种话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如果日本人那样说，肯定会被人们认为是王婆卖瓜，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让外国人这么一说我们才点头称是，这种情况绝不只是这一件。

东京的护城河畔的确很美，有绿色，有水，有妙不可言的风情。可能有的日本人想当然地以为外国人不懂那恬静的妙趣，但我要说没有那回事。本来美的标准就没有普遍性，我们不能把一种美说成是第一级别，而把另一种美说成是另一个级别。然而，护城河畔的景观确实属于第一级别。

东京的城市中心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绿色，那是因为皇居建在那里。从功能至上主义的角度来看，或许有人会认为，如果没有皇宫，交通就会更加便利。地产商人肯定会对此垂涎三尺，感慨这里的土地太浪费了。

与城市中心的绿色宝藏带给人们的满足相比，哪种选择更好呢？恐怕我们在突然之间难以做出判断。我感觉功能至上主义的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为了使更多的人享受到绿色带来的恩惠，我们该怎么办？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探讨其方法的时代了，难道不是吗？

大阪也正是由于大阪城[[5]](#_5_3)的存在，尽管大阪城的规模赶不上皇居，但却在城市中心保留下来许多绿色。不仅护城河被部分地保留下来，而且河水不足的部分也由流经附近的寝屋川[[6]](#_6_3)代为补充。整个布局真是妙不可言！

前几天，我有事要到大阪城附近去，就在神户叫了一辆出租车。司机说他对大阪的地理情况不熟，我满不在乎地说：“反正路上能看到大阪城，就以它为路标向前开吧。”然而，我的想法大大地落伍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在大阪上学时，无论从大阪的哪个方向看，四天王寺[[7]](#_7_3)的五重塔和大阪城都看得清清楚楚。但现在塔和城都淹没在高大的楼群中。因为怎么也看不到作为路标的大阪城，我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当出租车来到离大阪市很近的地方，总算看到那个带有青绿色屋顶的大阪城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大阪城附近有个摩天大楼，我们的会议是在这座大楼靠近最顶层的一个房间内举行的。我坐在窗边不时地看着外面。

所谓景观，以前我一直以为那是漫步中眺望某处，比如仰望寺院和城池时看到的一种风景。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高楼大厦到处林立的时代也有一些景观是被俯视的，制作景观的人已经开始考虑到这一点了。

大阪城屋顶的颜色很美，大阪城HALL[[8]](#_8_3)的巨大圆顶也由舒缓的线条构成。我们暂且不谈大阪城HALL，单说大阪城，它绝对不是考虑到某一天被人们俯瞰而建造的。以太阁[[9]](#_9_3)（丰臣秀吉）为首的历代修复者从天守阁[[10]](#_10_3)睥睨四方的想法是有的，但他们恐怕连做梦都不会想到，有一天人们会从上方窥视大阪城。

无论怎么被视为“家乡自夸”（准确地说是邻居自夸，我是神户的居民），我还是不得不说东京护城河畔的景色更胜一筹。但大阪有一点要胜过东京，那就是从大厦的高层向远方望去，可以看到对面的生驹山[[11]](#_11_1)山峦起伏的风貌。但是在东京，哪怕是在特别晴朗的天气下，人们能看到富士山，却看不到山峦起伏的景致。

在中国人们把风景画叫作“山水”。东京护城河畔的水的确令人感叹，但那里似乎缺山。大阪虽然山小但有山峦的起伏。可以说，山是大阪最大的财富。

北京的紫禁城从正面来看极其缺水。过去曾有所谓的“护城河”，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它被填平了。另外，北京的整个街区都被城墙所包围，在城墙的外围还有一条护城河，所以，可能是两条护城河之一被废弃不用了。但是，环绕街道的所谓外城护城河也被填平，只留下天桥等地名还保留着曾经有过的痕迹。紫禁城由处理政务的外朝和作为皇帝住处的内廷两部分构成。外朝的确非同一般，在相当宽广的空间内，建有像奈良大佛殿[[12]](#_12_1)一样级别的三大宫殿。但是，那里的地面上没有“土”，密密麻麻地铺设着石板，长着很少树木。

然而，那些树木并不是从地面上长出来的，而是被人栽在填满土的大桶里，是一些石榴之类的树木。如果既没有土也没有水的话，生命不是没有救了吗？

外朝这个地方，好像一开始就是为了“没救”而设立的。政治这种东西必须是非人性的，这种思想大概早就存在于设计者的大脑中了。

从天安门进入的参观者走到内廷后面的庭院时，一定会放松下来。因为那里有土，有从地面上长出来的树木。

作为“景观”，我对紫禁城的天安门附近不太喜欢。因为那里缺水，但并不是没有水。在近旁的中南海及面向一般公众开放的北海公园等地都有丰沛的水源。紫禁城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转到它的后面一看，也有类似护城河一样的水域，这时我们的内心会一下子平静下来。

将来紫禁城也一定摆脱不了从林立的高楼大厦上被人俯看的命运。虽然那金黄色的琉璃瓦的确很美，但趁着现在，恐怕我们必须要为水和绿色做点什么了。

## 虎门之池

1997年3月至4月，我按着北京、杭州、东阳、广州、香港的路线进行了一次旅行。之所以有东阳这个不太熟悉的地方，是因为谢晋（电影《鸦片战争》的导演）的推荐。他说，东阳还保留着电影《鸦片战争》的拍摄场景，现在对一般公众开放，劝我过去看一看。听说从杭州到东阳才3个多小时，又加之机会难得，于是我就有点勉强地答应了。实际上，那是单程5个半小时，往返11个小时的紧张旅程。

拍摄场景说是再现19世纪中期的广州，但场景毕竟是场景，在远处看冠冕堂皇，走近一瞧才知道是道具。大烟馆等处的败落景象，制作得倒是惟妙惟肖，但到了十三行夷人馆，就真容毕现了，只要轻轻一碰马上就知道是匆忙搭建出来的道具。

在北京，我向谢晋借阅了处在编辑之中的《鸦片战争》片段。那正是夷人馆的故事场面，好像英国商务总监查理·义律正在和英国商人们争论着什么。

因是处在编辑之中的胶片，上面也没加字幕，所以当时我对剧情了解得不太详细。后来看了正式版后才知道，那是清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1785—1850）命令外商交出违禁品鸦片，而商人们对此申辩各种理由的片段。

仔细想想，无论哪个国家没收违禁品都是天经地义的事。作为英国官员的查理·义律没有理由反对没收违禁品，就算英国要向清朝挑事，也得需要另外的借口。就连英国国内，当时反对鸦片贸易的舆论也很强烈。

为了给出兵寻找另外的借口，也为了转移反对鸦片贸易的舆论，英国的鸦片商陆续回国对议员们进行游说。结果，游说活动大获成功，议会以微弱的优势批准出兵。关于这段历史的说明，我希望再深入发掘一下为好。

这个电影最精彩的地方是如何处理那两万多箱鸦片。开始，林则徐要把没收的鸦片送至北京。但是，如果这么多的违禁品被押送到京，沿途的警备负担会相当繁重。所以，命令改为在当地销毁。

在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场景中，虎门销烟这一幕是不可缺少的。在虎门海边的一个高处，林则徐让人挖了两个长宽各50米的大型人工池。

人们常说林则徐烧毁了鸦片，但这种说法不准确。即使将鸦片焚烧，从其残膏余渣中仍可提取二成左右的鸦片。他采用的是更彻底的方法。先将盐水倒入水池，接着将大量的球形鸦片分别割成四瓣投入其中，最后再投放石灰。因为在这个时候会有白烟冒出，所以人们认为鸦片是被烧毁的。

他们通过实验得知鸦片可以溶解。人们打开人工池的水门，鸦片溶液会流入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人工池的四面及底部，全部镶上木板以防止鸦片渗入土内。处理结束后，彻底清洗木板。之所以人工池有两个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当一个池子被清洗时，就用另一个池子处理鸦片。处理鸦片的人工池至今还保留着，池子就在广州虎门鸦片战争纪念馆的旁边。

人工池历经160年，木板部分已经彻底腐烂，现在它与普通的水池相比，没有任何不同。附近的孩子在水池里捉鱼玩耍。

两个人工池上蕴含着誓将鸦片从这个国家中彻底清除的坚强意志。我们时刻都不要忘记那些用盐水掺加石灰溶解鸦片，并使之流入大海的人们及他们的骨气。我认为，在中国人所建造的宏伟建筑中，位于虎门的这两个人工池与万里长城相比，毫不逊色。

我问谢晋在拍摄电影《鸦片战争》的过程中，对哪个场面用力最多，谢晋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是在虎门处理鸦片的那个场面。”这两万多箱鸦片原本是违法的，但在《南京条约》中，英方却得到了货物赔偿。

鸦片战争是造成中国长期贫困的原因之一，但是，人们对那个让鸦片进入水池的林则徐却没有任何怨恨。

## 向草原和海洋的人民学习

1993年6月，我在苏联中亚地区旅行时，就预感到下个世纪的亚洲会壮大起来。在此之前，生活在中亚地区的民众是把目光投向西方的。尽管带有半强制的色彩，但我感觉那时他们的亚洲意识还是很淡薄的。

由于苏联解体，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自由的方向。特别是日本这一经济大国的存在，成为他们把目光转向东方的主要原因。

中亚各国至今连亚运会都没有参加过。我在乌兹别克斯坦听说，乌兹别克斯坦将参加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我想他们的亚洲意识会逐渐增强吧。

随着苏联时期的宗教限制被解除，民众的宗教意识也会增强。同时，随着偏重工业的政策调整，他们的草原之民意识也会越来越强。

在这个20世纪，我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次的地区纷争，由此也得到了许多教训。所以，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来迎接21世纪的挑战。我特别希望即将重新出现的中亚各国，在认真汲取教训和充分对比的基础上建设国家。

我坐着乌兹别克斯坦的豪华大巴到哈萨克斯坦时，在宾馆门口遇到了一群小流氓。他们叫嚣着要砸毁这辆大巴，像这种恶劣的对立情绪，必须尽早消灭在萌芽状态。

草原之民原本一直拥有这样的传统，那就是不论是成吉思汗，还是帖木儿[[13]](#_13_1)（1336—1405），也不论那个人是什么种族，只要谁能保护他们的生命，谁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富足，他们就服从谁。同样，统治者在录用人才时也一直也不分种族。

耶律楚材是契丹人，同时也深知汉文化，因此蒙古政权让他担任宰相，处理国政。西域的色目人天生赚钱有道，蒙古政权就让色目人担任财政长官。这也正是草原人的生存方式。

草原的环境异常严酷，如果家畜因异常气候而大量死亡，那么紧接着就会出现一大群人死亡的现象。当大草原上沙尘弥漫狂风肆虐的时候，人们龟缩在小小的蒙古包里，屏住呼吸相互依偎。此时此刻，他们会切身地体会到休戚与共的含义。

在这一点上，海洋之民也同样如此。当小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行驶时，船里的人是不会问掌舵者来自哪个民族的。只要他能掌好舵，能保护好乘船人的生命，无论他是谁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技术。

在阅读冲绳的历史时，我们了解到冲绳人引进了“闽人三十六姓”这一来自中国的技术团队。技术团队的成员有的是驾船能手，有的是经贸专家。例如，在18世纪久米村出身的蔡温（1682—1761）就被任命为宰相，他的儿子还娶了琉球王的长女。人们都说蔡温是琉球史上最高明的政治家，但是如果他没被录用，他的才能也就没有施展的机会。

草原人好客是举世闻名的。我们经常会听到某个人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走进蒙古包而受到热烈欢迎的故事。因为客人能够提供外面的信息，所以客人的到来会开阔主人的视野。

做海洋贸易的人也重视客人。琉球受萨摩的统治，当然也是处在幕府的锁国体制之下，但琉球王府却偷偷地发布过这样的命令：“即便南蛮船（西班牙或葡萄牙船）漂过来也不要报告萨摩，如果萨摩的船在那里，不要跟萨摩船长说。”

1816年，英舰“阿陆赛斯特号”和“拉伊拉号”来到琉球停留了40天。船长和船医分别写下了航海记。在二人的航海记中，他们不约而同地写下了对琉球的赞美之词。1832年的“阿美士德号”也同样受到琉球人的关照。

草原之民一直进攻到地中海，在那里建立了奥斯曼帝国。皇帝苏丹被推举为伊斯兰教的领袖。尽管如此，在君士坦丁堡，非穆斯林的人数经常占到人口中的一半以上。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犹太人在被称为密勒特（Millet）的自治组织当中，甚至还享有一种特权。

大量的犹太人被天主教势力所驱逐，从利比里亚半岛来到土耳其。正是这个伊斯兰帝国欣然地接收了他们。

然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土耳其却对几百年来一直相邻而居的亚美尼亚人实行了大屠杀。原因在于国家主义的背后隐藏着民族自私的心理及一个荒唐苏丹的出现。

草原之民和海洋之民的生存方式之所以会成为未来的参考，恐怕是因为他们都曾处在恶劣的环境之下。21世纪的人类也必须要在充满危机的严酷环境中生存下去。

过去的病历越详细越好。我愿意同大家一道，尤其是与壮大起来的亚洲人一道，共同吸取从历史中发掘出来的教训。

## 中日两国的任务

最近，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把“亚洲的定位”作为研讨会的讨论题目。我今天要说的内容也与此有关。1990年，北京举办了亚洲运动会，我想对亚洲运动会的历史作一点回顾。1913年在马尼拉召开了通称为“远东奥林匹克”的运动会。这个运动会，在日本称为“远东锦标竞技大会”；在中国称为“远东运动大会”。远东运动大会共举办了10届，持续到1934年。举办地分别为马尼拉、上海、东京、大阪。

为什么远东运动大会举办到第十届就停办了呢？原因是日本想让“满洲国”参加。对此，中国理所当然地表示反对。“满洲国”在国际上除日本以外，没有任何国家承认。这次纠纷发生之后，接着就是战争的爆发，远东运动大会也就停办了。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结束后中断了12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94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伦敦再次召开。日本由于处在美军的占领之下没能参加。日本是从下一届的赫尔辛基奥运会开始参会的。

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亚洲除了远东奥运会之外，还有西亚运动会。在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期间，远东和西亚这两个区域运动会合并在一起，成立了全亚洲的竞技比赛组织。这就是亚洲运动会的前身。为亚运会的诞生而积极奔走的是印度和菲律宾。

人们常说日本是在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上回归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其实，日本在赫尔辛基奥运会召开的前一年（1951）就参加了在印度举行的第一届亚运会。因为亚运会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公认的区域竞技大会，所以日本回归国际体育界是从印度亚运会开始的。亚洲各国的友谊使日本回归国际体育界的愿望得以实现，这是值得永远铭记的事情。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亚运会的发起国是印度和菲律宾。我们必须说这件事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是印度和菲律宾把东亚和西亚连在了一起。在我们东亚人看来，亚洲不过是中国、日本、朝鲜半岛、蒙古等地区。一部分具有超前意识的人也不过是把菲律宾和东南亚勉强算进亚洲的范围内。直到最近我们才意识到，亚洲的范围扩大了，甚至连西亚也纳入到了亚洲。我认为这种意识的形成是由于印度和东南亚的帮助，正如我们在体育上得到过他们的帮助一样。

换句话说，我们意识中的“亚洲圈”扩大了。而且，今后的形势是“亚洲圈”会越来越大。以体育为例，1994年亚运会将在广岛举行。听说以前没有参加过亚运会的许多国家都表示要来参加。不用说，那些国家曾经是苏联解体前的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各加盟共和国。

乌拉尔以东，或者被称为中亚的这一区域，虽然它在亚洲的范围内，但在我们的眼里这一区域却好像不属于亚洲。而居住在这一区域里的民众，他们的亚洲意识也很淡薄。在他们看来，以前这一地区处在苏联的高压统治之下，而苏联则属于欧洲一侧。

由于苏联解体，他们头上的紧箍咒消失了，因此曾经淡薄的亚洲意识也理所当然地增强了。他们表示参加亚运会就是这种意识的体现。

乌拉尔以东的各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广袤的土地，但由于苏联解体，它们无论如何都需要向东方寻求支持。从东亚来看，乌拉尔以东地区加入亚洲意味着亚洲圈扩大了，意味着中日两国所肩负的责任增大了。因为中国与乌拉尔以东地区的许多国家接壤，与它们拥有很长的国境线，而日本与中国相邻，同时又是亚洲的一大经济基地。

对于这个重任，中日两国必须肩负起来。维护中日友好和保持相互信任，已经不单是我们两国的利益所必需，而是亚洲乃至全球的利益所必需了。因此，中日两国人员在探讨问题时，不仅要着眼于两国，更要放眼新亚洲圈，放眼全球。因此，这次研讨会的议题特别强调“亚洲圈”这一概念也就理所当然了。

最近，人们经常谈论全球化这一话题。全球化就是以全球规模来思考问题，以全球规模来采取行动。以前人们的思想是民族主义、国家本位主义，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更加开阔的思维方式。甚至有人预言无边界、无国界的时代即将到来。也有观点认为，欧盟的形成和扩大就是全球化的一个过程，国际上的各种机构动作频繁也都与全球化有关。

然而，与这种全球化的趋向相反，碎片化的趋向也不容忽视。南联盟的情况就是如此，听说捷克斯洛伐克也面临着分成捷克和斯洛伐克这两个部分的命运。全球化和碎片化这两种相反的趋向，目前在当今世界上同时存在着。

我要讲一个遥远的古代故事。公元前651年，在河南省葵丘这个地方，举行了一次会盟。葵丘之盟是以齐桓公为盟主，宋、郑、卫、鲁等诸侯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几个中原国家为组建一个松散联盟而采取的具体行动。春秋时期，诸侯们经常聚在一起开会，发誓约。这次会盟是中国有数的几次会盟中最为著名的一次。诸侯都是各自领地的首领，他们聚在一起大概也算是一种全球化趋向。会盟与现在的欧盟会议和首脑峰会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首脑们聚在了一起。换句话说，是共通的问题推动了全球化。公元前651年所面临的问题是南方的楚国正变为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威胁着中原各国的安全。

所谓中原是指中国中部的一个模糊名称。这个中原也是逐步变大的。秦始皇统一天下时，丞相李斯说，往昔圣天子时代也不过统治方圆千里。当时的里，大约是400米，所以尧舜所统治的地方大约是16万平方千米，也就是相当于两个北海道大小，面积不到现在日本的一半，相当于现在日本的四成。当时那个中原还在扩大，它被各诸侯国分别统治着。

这次诸侯们开会所制定的誓约包括很多项目。其中，第一条是“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

“诛不孝”是道德宣言。但不要改变继承人及不要立妾为妻等却是家事，这似乎给人以多管闲事的感觉。但是，如果妻妾问题和继承人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导致家乱。在那个时代，一国之乱已经不仅限于本国，也会波及别国了。

例如，在某个诸侯国的内部发生了派系斗争，如果其中一方为了战胜对方而想得到邻国的帮助，那么邻国就会受到牵连。再例如，在内乱中失败的一方可能会逃到邻国，倘若那种情况真的出现，邻国就会面临接受逃亡者和难民的问题。因此，葵丘之盟才加进了这种伦理上的限制。

另外，盟誓上还有一个条款是“无有封而不告”。意思是说，如果诸侯任命手下大臣为某地领主或担任某个职务，要将此事告知周天子，同时也要让中原各国知道。这是对人事公开、信息公开的约定。

孔子出生在葵丘之盟的百年之后。他主张“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重视与远方朋友之间的交往。孔子的这种思想也可以说是全球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然而，同时代也出现了一个老子，主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的理想是小国寡民，可以说这种思想是碎片化趋向。和现代社会一样，在中国古代全球化趋向与碎片化趋向也是交织在一起的。

古代与现代的区别是，如果现代社会采取碎片化措施，人们将无法生活。在古代社会采取碎片化措施，因为人们周围都是相互了解的亲近之人，所以彼此之间可能不会出现纷争，武陵桃源乡式的生活也有可能实现。但是，处在复杂的现代生活条件下，那种生活不过是痴人说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一个没有边界的时代将在我们的未来出现。

当然，我们并不是置碎片化趋向而不顾。游牧社会曾经产生过一位征服世界的统治者——成吉思汗。那种社会原本是被碎片化了的集团，居住在几个帐篷里的人组成“落”，几个“落”集合在一起成为“部”。“部落”这个词就是从这里产生的，“部”与更高一级的组织相联系。成吉思汗建成了没有边界的帝国，其根本原因在于处于末端的“落”很稳固。

21世纪的“落”，我认为就是城市。听说在古代中国，农夫耕完田后就回到城里，这可能主要是防止外敌和猛兽。由于交通工具的发达，21世纪的农民也会成为城市生活者。城市里住着各种各样的人，他们要想和平地生活下去就必须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对方的脾气秉性。

“相互理解”是人们常说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是需要付出很大努力的。

孔子生活的那个时期，吴国和越国在南方兴起，这也算是中国圈的扩大。但吴越对中原的理解是肤浅的。吴王夫差曾北上威胁中原。当时，孔子的弟子子贡作为鲁国的外交官与吴国代表进行了会谈。

公元前488年，吴国的宰相向鲁国索要“百牢”。“一牢”是指牛羊猪各一头，“百牢”就是一牢的百倍。子贡对吴国解释说，在中原招待天子时，也就十二牢，公九牢，伯六牢。这是惯例。吴王回答说：“我文身，不足责礼。”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是文身的南方部族，不知中原之礼，所以不值得用礼制来要求”。于是，吴国停止了“百牢”的索要。

这就是相互理解。吴王了解了一些中原之礼，中原也明白了南方吴国的情况。也就是说，双方都做出了向对方解释的努力。

对于21世纪的相互理解，我是乐观的。无论怎么说，那时是信息社会，图像的作用很大。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拥有非常先进的工具能达到相互理解。

不仅要理解对方，而且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问题。这大概是一个超越图像和文字的哲学问题，或许最终与宗教也有一点关联吧。

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20年里，首先值得肯定的是我们取得了很多丰硕成果，可以说能够召开像今天这样的研讨会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关于世界局势的变化，我是用“亚洲变大了”这样的语句进行了概括。我感觉应对“亚洲变大了”的重任将会落到中日两国的肩上。

从整个亚洲来看，东和西相距很远，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中间人可能是东南亚和印度。比如，对于伊斯兰，日本几乎是一无所知，而在这一点上，东南亚和印度恰恰能提供宝贵的信息。

我们不必匆忙地追求亚洲的同一性。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各自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首先了解这些东西才是重要的。我们在了解历史或传统时，不仅要知道，还必须深入。21世纪没有哲学是不行的。

中日两国不仅要考虑两国的问题，还要把世界，至少是亚洲的问题纳入到视野中去。我认为今后两国的合作事业将会增加，所以维护两国友好关系和保持相互信任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一个临时选项，而是一个责无旁贷的、上天交给我们的任务。

## 香港回归

“香港回归”这个词，是从中方的角度表达香港回归中国的意思。香港回归时，中国提出的政策是一国两制。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国家并行多种制度的先例是存在的。例如，辽是契丹族政权，它就实行过一国两制，既有统治游牧民的北院，也有统治农民的南院。辽有时把自己的国号改为契丹，有时又称为辽，民族问题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幸运的是，在香港回归时所提出的一国两制中，可以说几乎不包括民族问题。如果一定要问哪个问题最为重要的话，那就是文化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反倒更困难。

英国原本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把香港归还给中国。中国在“二战”中属于同盟国一方，“二战”期间英国败给了日本，所以香港被日本占领。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实际情况是美国的罗斯福和中国的蒋介石在“香港是中国管辖下的国际自由港”上达成了一致，但英国的丘吉尔却坚决反对。当时，英国始终不想对香港放手。“二战”后，英国马上收复了香港，造成了既成事实。此后，中国因忙于国共内战，所以失去了收回香港的机会。

在英国看来，香港岛和九龙是清政府割让出去的土地，99年的新界租期具有半永久割让的性质。

对中国来说，“废除不平等条约”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要求。这种要求不仅在中国适用，在世界也是通用的。“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是至少100年来人民永志不忘的誓愿。所以，中国即便收回香港也要堂堂正正地收回，绝不采用卑躬屈膝、摇尾乞怜的方式。

在这次收复香港时，中国政府没有派遣一名政府要人访问英国。相反，作为返还方的英国，撒切尔首相和梅杰首相都到访过中国。

英国方面并没有对他们占领香港期间所犯的罪行、所制造的流血事件及实施的歧视华人政策等表示道歉。恐怕他们觉得现在道歉不妥吧。对于英国来说，也许他们还想让中方感谢他们，因为没有经过流血就把这么美丽的香港归还给了中方。这似乎是殖民统治者的想法，因为他们不理解被统治者的痛苦。

也有一部分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对英国占领香港的罪恶性质认识不清。问题在于香港的历史教育。关于鸦片战争的原因，香港殖民时期的教科书大都是这样叙述的：

——为了纠正由于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所导致的不公正，英国最终决定行使武力。

他们之所以这样写，大概是想尽量撇清鸦片贸易与占领香港之间的关系。但是，这样写却不能阻止人们把这场战争称为鸦片战争（Opium War）。英方把占领九龙仅仅称为“亚罗号事件”，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战争与鸦片之间的联系做切割。但是，中方把“亚罗号事件”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所谓第一次鸦片战争，如果以穿鼻海战（珠江口的地名）为战争开端的话，那么鸦片战争就是从1839年11月3日开始的。如果以英国议会批准战费的日期作为起点的话，那么，战争就是从1840年4月开始的。英政府的派兵决定，比英国议会的决议早两个月，但如果战费得不到议会批准，实际上是不能打仗的。英国议会对战费支付议题的投票结果为：271票赞成，262票反对。

战费支付议案以微小差距勉强获得通过。

由于住在广州、澳门等地的鸦片商人及威廉·渣甸[[14]](#_14_1)、詹姆斯·马地臣[[15]](#_15_1)等人纷纷回国进行游说，所以议会才以微弱的优势通过了派遣东洋舰队到中国远征的议案。

我们不仅在香港的教科书上，还在日本的世界史教材上看到这样的记述：为了打破清国的非正常贸易方式，英方以英国商人的鸦片被烧为借口，向清政府宣战。

提到非正常贸易方式，英方直到鸦片战争发生的6年前，还一直让东印度公司垄断对清贸易，所以英国没有资格指责所谓非正常贸易方式。总之，这场战争是由鸦片引起的战争。《南京条约》作为这场战争的“战果”是在1842年8月签订的，签字地点是在漂浮于长江上的英国战舰——“康华丽号”上。这样，香港岛就被正式割让出去了。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1856年10月8日，清朝水师（海军）对停泊在广州海珠岛海面上的“亚罗号”（Arrow）进行了临时检查。这条船是归中国人所有的鸦片走私船，但它在英国的香港殖民当局做了登记。当时，任何货船只要在香港殖民当局取得船籍证书都可以悬挂英国旗帜。但清朝水师在对“亚罗号”进行临时检查时，没有发现船上悬挂着英国旗帜。这条船虽然有个英文名字“Arrow”，但与附近的中国船只是同一型号，并且船上的14名船员也都是中国人。

这次临时检查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个人报告说船上有海盗。倘若“亚罗号”挂着英国旗帜，估计清朝水师也不会临时检查。后来，是否悬挂了旗帜成为问题的焦点。我的估计是船上有旗帜，但没有朝外悬挂。

英方说，清朝水师把“亚罗号”上所悬挂的英国旗扯了下来，要求清方公开道歉。而清方则坚称船上根本没有悬挂英国旗帜。结果双方在是否挂旗这一问题上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这就是“亚罗号事件”的经过。它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在英国公使璞鼎查向首相巴麦尊提交的报告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船当时虽然不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但清朝人并不知道这一情况。向神发誓，这件事绝对不要告诉他们。”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在北京附近进行的，留下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暴行。法国也参加了这场战争，原因是法国神父在广西被杀。当时，广西深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是清政府规定不许外国人进入的地区。但一名法国神父却无视规定，非法潜入了该地区。

《北京条约》是对此前签订的《天津条约》的批准。它明确规定前条约（《天津条约》）完全有效，更追加了《天津条约》所没有的开放天津港的条款。条约当中有一条“为修改税率表而任命委员”，就是指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违禁品没有税率，把鸦片列入税率表就是鸦片贸易的合法化。条约不明说是鸦片，而是设了“洋药”这个条目，目的是让鸦片适用于这条规定。

香港的主要贸易品种，除鸦片之外，还有被称为“猪仔”的奴隶——苦力。

清政府原则上禁止本国人出国，这回也合法化了。买卖奴隶隐藏在合法这一美名的背后，开始堂而皇之地进行了。当时香港的两大贸易商品是鸦片和奴隶，“亚罗号事件”不过是借口，英国在这次战争中成功地使两大贸易商品合法化，并扩大了交易量，这在当时是比英国获得九龙还要大的一个成果。

当时放弃香港的论调在英国很是盛行，但是英国人却没有把鸦片和奴隶这两项贸易包括在作为其论据的贸易数字中。他们所讨论的内容不过是不太舒服的气候和不太卫生的生活条件。对于没有在表面上体现出来的利益和好处，仅有一少部分英国人知道。

1898年6月，英国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将深圳以南的九龙半岛以及200多个岛屿租借给英国，租期为99年。据说这是为了对抗法国租借广州湾而采取的措施。实际上它不过是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又一个步骤。这个99年期限的条约，在1997年7月到期。同时，此前签订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也废除了，整个香港回归。

香港是在南海岸边上突然兴起的城市，它与具有3000年历史的广州相比还非常年轻。据说，还在鸦片战争进行期间，英国人就已经占领了这块土地。日本占领这块土地的时间是1941年的圣诞节，所以，当时距香港成为英属殖民地正好过去100年。

那一年（1941）的3月，英国发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香港的最后一次人口统计：香港岛的华人有697674人；九龙的华人有568955人；水上居民有约154000人。

上述统计不包括新界的人口，据推算，新界的人口为195000人；另有居无定所的流浪者约2万人。因为除华人外，还有西洋人和印度人，所以，当时香港的人口大约是150万。在那个时期，有很多人是为了躲避战乱而从内地来的难民，所以，香港的人口规模超出了它的实际容纳能力。

日本占领香港后，首先致力于减少香港的人口，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人赶出香港。在国共合作时期，有一批抗日派的重要人物汇集在香港，其中有的人上了日军黑名单。人们很担心他们的安全。但由于人口疏散政策，他们得以安全地离开了香港。

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100年间，其产业大多以海运为主。据说直到1970年左右，香港才摆脱了偏重海运的产业结构，进入了新工业化时代。因为由朝鲜战争而兴起的面向中国各地的中转贸易受到了打击，所以香港为寻求出路才实行了产业转型。

鸦片和苦力贸易都与海运相关，但从1960年至1970年，增加了与大海无关的工作。这可以称之为是新香港的开始。从那时起，香港回归中国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英国也不再说“坚持三个条约”了。因为世界大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帝国主义时代、殖民时期所遗留下来的残余是不许保留的。所谓“残余”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歧视。英国占领香港后，马上就把位于维多利亚峰（太平山）附近的外国人居住区设为禁止华人出入的区域。在其他地方也设有不许华人入内的场所。另外，英国刚占领香港不久，就专门对华人做出了限制，规定华人在晚11点后禁止外出。后来这一限制更加苛刻，即华人在晚10点后不许外出，这就是宵禁令。宵禁令直到1897年才解除，实际上持续了55年。

在日本占领香港时期，英国对抵抗日本的华人游击队“港九大队”实际上很冷淡。在日本进攻之前，英国虽然保证要向作为同盟国一员的中国游击队提供武器援助，但又以没有总督的签字为由拒绝交付，从而使游击队没有赶上对日本的进攻。英国可能是担心如果中国游击队过于活跃，等到战后香港回到英国手上时会有麻烦吧。曾经成为日军俘虏的杨慕琦总督，在英国再次占领香港之后，马上实行了优待华人的政策。据说市议会的半数议员由华人充当。因为人口中的98％是华人，所以，华人议员在议会中占半数席位，这谈不上是优待。

最近有关香港的报道，重点似乎放在香港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能不能保持以前的繁荣和自由这一点上。繁荣是毫无疑问的。关于自由，我认为这与中国如何发展密切相关。

中国现在以迅猛的速度在不断地发展着，香港还没有适应这种速度。香港特别行政区将在同一个线路上奔跑，我已感受到了它的胎动，它的发展会越来越快。香港的任务是如何解决超越海港城市、经济城市而大步前行的问题。150年的香港历史一直充满着铜臭。当然，那也是必要的，但是新的香港应该拥有自己的风格。香港在艺术等方面，比如电影方面就有很好的基础。以中国台湾、东南亚华人圈为服务对象的文艺也在质量上有很大提升。我相信，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在经济之外的领域也会展现出她的活力。

“欲界亦仙都”是诗人黄遵宪感怀香港时所吟咏的诗句。“仙都”好像带有讽刺的含义，然而，因为时光已经过去了100多年（黄遵宪1870年作《香港感怀》），我倒真心希望香港接近真正的仙都。仙都大概就是乌托邦（理想之乡）之类的意思吧。

注解：

[[1]](#_1_14)　《源氏物语》是由日本平安时代女作家紫式部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物语”是日本的文学体裁。该作品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是在1001年至1008年间。《源氏物语》以日本平安王朝全盛时期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全书共54回，近百万字。包含四代天皇，历70余年，所涉人物400多位，其中印象鲜明的也有二三十人。人物以上层贵族为主，也有中下层贵族、宫女、侍女及平民百姓。反映了平安时代的文化生活和社会背景，在贯彻写实的“真实”美学思想的同时，也创造了日本式浪漫的“物哀”（もののあわれ）思想。

[[2]](#_2_6)　源义经（1159—1189）是日本家喻户晓、最具人气的英雄人物，曾协助其兄源赖朝获得了对整个日本的统治权。他因极为坎坷的身世、极高成就的武学、过人的战略机智、场场必胜的战绩及悲凉的人生结局，令闻者无不叹息，因此成为日本戏剧、影视、电子游戏中经久不衰的热门主角。

[[3]](#_3_4)　平清盛（1118—1181）是日本平安时代著名武士，在平治之乱中击败源氏，掌握了日本政权，是日本武家政权的鼻祖。平清盛作为日本首位掌握政权的武士，不仅控制了西日本半壁江山，而且积极开展对宋贸易，积聚起了大量财富，并获得了外戚的显耀地位，使平氏政权盛极一时，开了武家政权的先河。他死后不久平氏宗家为源氏所灭。

[[4]](#_4_2)　童又称“秃、秃童”。据《平家物语》记载，平安时代末期，平清盛大权在握。他选出了300个14～16岁的少年，一律留着齐耳短发，穿一身红色的直裰，让他们在京都各处行走探查，遇见有说平氏坏话的人，马上通知同伴，闯进他的家中，没收其资财家具，并将那人抓到六波罗府。

[[5]](#_5_2)　大阪城，位于日本大阪市中央区（古属摄津国东成郡）的大阪城公园内，为大阪名胜之一，别名“金城”或“锦城”。在桃山时代是丰臣秀吉的居城。

[[6]](#_6_2)　寝屋川发源于生驹山地，流经寝屋川市，在大阪市内与淀川合流。

[[7]](#_7_2)　四天王寺是593年由圣德太子所建立的日本佛教最早的寺院，因此它也是日本最古老的官家寺院。它不仅仅作为佛界守护、镇护国家的寺院而成为政治外交的中枢，而且还是美术工艺产业等日本文化的发源地。

[[8]](#_8_2)　大阪城HALL位于大阪市中央区，建于1983年，是屋顶为圆型的多功能性竞技场。最多能容纳16000人。

[[9]](#_9_2)　太阁，旧时日本对摄政和太政大臣的敬称。现在日本民间特指丰臣秀吉。

[[10]](#_10_2)　天守阁位于日本大阪城内，是由丰臣秀吉营建的天下名城，是大阪的象征。在军事上有关楼和瞭望塔的作用。同时，它也是城主的居住之地。天守阁是城堡的中心建筑，它不仅是坚固的军事防御设施，也是所在地大名或城主政治权利和地位的象征。

[[11]](#_11)　生驹山位于大阪府和奈良县的交界处，是生驹山地的主峰，海拔为642米。

[[12]](#_12)　日本奈良的东大寺大佛殿，是世界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大佛殿于752年建立，现在的佛殿于1708年重建。佛殿宽57.01米，深50.48米，高48.74米，殿内安置有15米高的大佛像。

[[13]](#_13)　帖木儿（Tamerlane/Taimur），是中东历史上最有名的征服者之一。他于1336年生于撒马尔罕以南的谒石（今沙赫里夏勃兹），其父塔拉盖为突厥化的蒙古巴鲁拉思部首领，祖先做过察合台的大臣。帖木儿是帖木尔汗国的奠基人，也是帖木儿帝国的开国君主。

[[14]](#_14)　威廉·渣甸（Dr. William Jardine，1784—1843）来自苏格兰，早年曾是一名在中国从事鸦片贸易的船上的外科医生，后来创办了“怡和洋行”。林则徐在1839年实行禁烟时，威廉·渣甸亲自在伦敦游说英国政府与清政府开战，亦力主从清朝手中取得香港作为贸易据点。

[[15]](#_15)　詹姆斯·马地臣（James Matheson 1796—1887），苏格兰人。是在广州开创鸦片贸易的曼益商会的大股东。1832年联合之查甸，开办了庞大的鸦片公司。在居留广州的外国人当中，他被看作是重要的智囊人物。后创办“怡和洋行”。马地臣和威廉·渣甸一样都是鸦片战争时期英国著名的鸦片走私贩子。他们都靠鸦片走私大发横财，都竭力煽动对华侵略战争。

# 第三部分

## 三星堆文物

在三星堆精美绝伦的文物中没有类似文字那样的东西。我们常常以为提到文化就与文字有关。这也许是一种偏见。每件文物都有它自己的名称，过去人们可能用那样的名字称呼它，但现在我们只能靠推测了。

总高度达3.84米的最大青铜器也用“巨大神树”这么一个冷冰冰的名称。三星堆的文物是异质性的，很多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只有这件神树好像基本可以确定是出现在中国神话里的“扶桑”或“若木”。《山海经》上说，九个太阳在下枝，一个太阳在上枝。

展出的巨大神树，其树枝分为三段，枝头上站立着小鸟，共计九只鸟。可能神树顶上还有一只，好像它脱落了，那大概就是位于上枝上的鸟。这样看来，“巨大神树”的构图与中国神话上的记载完全一致。

我们虽然对这些文物的异质性感到困惑，但也有人说它与中原的文物类似。它是从中原来的，还是从三星堆所属的文化圈中走出传到中原去的，对此我们应该本着谦虚的态度进行认真研究。周武王在讨伐殷商时，曾向蜀地民众请求过援军。蜀地民众当时已经与中原人有了交流，并且，他们的文化程度也绝不比中原逊色。

长江沿岸也有很多曾被水淹没的地方，通过新的发现，我希望将它们发掘整理出来，使之形成一条文化链。

## 作为艺术的文字

甲骨文字被人们发现是在1899年，对其真正研究是进入20世纪之后。雕刻在龟甲和牛骨上的文字成为我们现在所用“汉字”的祖型，因为甲骨文字之前的文字还没被发现，所以我们可以把甲骨文字看作汉字的诞生。

这种甲骨文字是从原始性的绘画文字阶段起步，已经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它不仅是为了记录事件、传达信息而被创造出来的，我觉得创造者一开始就有展示文字本身之美的强烈愿望，也就是说，创造者的“求美意向”从文字诞生之初就有了。研究者把长达200多年的甲骨文字分为五期。董作宾[[1]](#_1_17)把第一期定为“雄伟”期，特点是字大、雄劲、有力；第二期为“谨饬”期，特点是严谨、正确、高雅；第三期为“颓靡”期，也就是凋敝，字体纤弱，且错误较多；第四期为“劲峭”期，书法恢复了刚劲有力的风格，充满活力；第五期为“严正”期，字体变小，关注配置，照顾细微，风格趋于纤细。

文字样式的这种变迁一定反映着时代的精神。用字母序列（alphabet）组合成的语言，其语意与文字彻底脱离。汉字与词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汉字包含着词义。

汉字能够成为“书法”这种有形艺术，是与生俱来的宿命。在甲骨上刻字的人，是带着要刻得更美的意愿来工作的。在所刻的字上涂抹红色，除了追求字迹清楚之外，还受到“求美意向”的驱动。

书法作为艺术能够大放异彩得益于汉末草书的发展，而草书的发展又能使书家自由地表现自我。然而，我们不要仅盯着花的部分不放，不要忘记为花的盛开而深植于地下的根部。

将文字连写变为“草书”，需要有工整的隶书做基础。隶书之前又有小篆、大篆，再往前追溯就是甲骨文了。那些文字是用刀刻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记住用润滑的毛笔写出来的字是刀刻字的继续。

唯一不变的是，不论在刀刻时代还是笔写时代，人们都想用更美的方式来记录事物。最美好的东西充实着人们的内心。那是生命的力量，后世之人给它起名叫“气韵”，西方的美学家称它为“心灵的共鸣”。

6世纪的谢赫[[2]](#_2_9)对绘画的评判提出了六条标准。其中第一条就是“气韵生动”。这个标准是对绘画而言的，但对书法也同样适用。因为中国绘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近似书法，所以价值判断当然也应是同一标准。

几年前我访问伊朗时，在首都德黑兰看过那里的书法展览。写字成为艺术除汉字圈之外，恐怕就剩下波斯语了。波斯文字比阿拉伯文字更圆韵，它的确很优雅，书法展览也很热闹。甚至有人在专心看着展品的同时，用手做着在空中描的动作。

的确，展品上的文字是漂亮的弧线交响曲。无须赘言，波斯文字是表音文字，它作为书法作品摆放在那里很美。然而，我却在那里感受到一种莫名的空虚，那是对脱离了意义的文字而产生的一种空虚。在展出的书法作品中，有人写的是萨迪[[3]](#_3_7)和哈菲兹[[4]](#_4_5)的诗句。我年轻的时候学过波斯语，懂得诗的意思。尽管如此，对于追求那种由漂亮的弧线而构成的美，我仍然感到略有缺陷。同时，我在那个会场上再次对内含意义的汉字发出了感慨——你太伟大了！

## 汉诗和书法

在成都的武侯祠现在保留着被称为“三绝碑”的唐碑。撰写碑文的是宰相裴度（763—838），书写碑文的是柳公绰，将其刻上石碑的是名匠鲁建。因是三个绝世名人的合成之作，所以世人称它为“三绝碑”。除此之外，还有魏的受禅碑，由王朗作文，梁鹄书写，钟繇刻字，因此受禅碑也被称为“三绝”。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个人能力的综合性。一般认为一个诸艺皆通的人物要比一个一艺独秀的人物更优秀。《史记》上说，历数孔子弟子中的优秀人物，“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因此，即使同样是三绝，人们最希望一人兼而有之。但是，正如日本谚语所说“天不予二物”一样，那种情况是寥寥无几的。

被称为初唐三大书法家的欧阳询、褚遂良和虞世南，前两者被收录在《全唐诗》中的诗都仅仅是一首，虽然虞世南的诗收录不少，但与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相比，还是稍感逊色。颜真卿被收录在《全唐诗》的诗，长短总共也不过10首。

张旭是一位被称为“草圣”的草书名家。有人说他传授过颜真卿的书法，但所留下的诗作并不多。因为张旭行为奇特，所以在友人杜甫和李白的诗中留有其名。《唐诗选》所录的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有这样一段：

张旭三杯草圣传，

脱帽露顶王公前，

挥毫落纸如云烟。

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中做了如下描述：

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

民间有王羲之见鹅首摆动而悟得书法的传说。元初钱舜举所画著名的《王右军观鹅图》，就是以这个传说为主题的作品。听说张旭在看完剑舞名家公孙大娘所舞的“西河剑器”之后，他悟到了草书的奥秘。

提到草书，还有一位大家是怀素，他和张旭并称为草书双璧。怀素是唐玄奘的弟子，与张旭大约是同时期的人。据说，二人都曾与颜真卿见面讨论过书法。另外二人都是奇行之士，在世间有“素（怀素）狂张（张旭）颠”的评论。据说，张旭以头发蘸墨写字。虽然怀素是僧人，没有头发，但他不管是墙壁还是衣裳，都往上面写草书。

李白的《草书歌行》是一首很长的诗，开头是这样写的：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

这首诗以下面的句子结尾：

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

所谓“浑脱”是指从西域传过来的舞蹈名称。这句诗的意思是说，张旭是看了公孙大娘的舞蹈后受到启发，悟得书法的奥秘，但怀素不需要那样的暗示，因为怀素具有天生的才能。由此看来，李白对怀素的评价比对张旭的更高。另外，关于这首诗，多数人认为不是李白的诗作。宋代的苏东坡也断定这首诗不是李白的作品。

张旭的诗现存有六首，怀素的诗仅有两首。二人虽然都是被人们称为“草圣”的书法大家，但作为诗人却不太知名。

到了宋代，出现了像黄庭坚、苏东坡等在书法诗词方面都出类拔萃的人物。到了明代，又产生了沈周、文征明、唐寅、徐渭、董其昌等多面手的文人，即在书、诗、文之上又加上了绘画。徐渭对自己的才艺排序是“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这说明书法好是文人的骄傲。但是，虽然文人自己那么认为，世间的评价却并非如此。徐渭把自己的画放在第四位，而世人却认为他的画为第一。也就是说，世人的排序不是徐渭本人的意愿。

另外，篆刻成为文人嗜好是在石章篆刻普及之后。石章篆刻是以柔软易刻的寿山石为材料。16世纪的文彭及其弟子何震是文人篆刻的开山鼻祖。到了清末，出现了赵之谦、吴昌硕。他们二人在书、画、篆刻方面分别达到了顶点，但是在诗上却均未达到“绝”的境地。

## 来自时间和距离上的浪漫主义 ——参观正仓院展品

正仓院[[5]](#_5_5)宝物的精髓在于其久远。与宝物的艺术价值不同，久远创造着另外一种价值。1970年的正仓院展也陈列了桂心、苏芳、竹节人参、雄黄等药材。通过看这些展品，我们也会对其悠久历史有所认识吧。展品中只有雄黄被加工过，它过去有可能被用于鉴赏。但其他的东西，不论我们怎么看走眼，都不能说那是美术品或民间艺术品。

尽管如此，这些展品之所以在国立图书馆的陈列柜中占有很大空间，完全是因为它们过于久远了。人们窥视陈列柜里的展品与观看中药铺橱窗里的中药，其表情是迥然不同的。窥视展品的人可能会感慨：“噢，这就是1000年前的人参呀。”

晒干的植物药材，无论是今年的还是千年之前的，在形状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参观者的感慨是针对这千年的时光而发的，而不是针对摆在那里的人参本身。

如果我们在脑海里把明治到现代的这段时间重复十次，就会对时间的漫长感到眩晕。如再往前追溯，当我们面对秀吉和义经等历史明星所发出的耀眼光芒时，会再次感到头昏目眩。干瘪的人参不过是作为某些联想的媒介恰巧出现在那里而已。——可以说这就是时间上的浪漫主义吧。

正仓院的藏品中，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宝物，可谓具有距离上的浪漫主义色彩。之所以那些宝物会出现在这里是因为正仓院是丝绸之路的终点。在1970年的陈列品当中，既有明显是日本制作的右转辘轳，也有不少是由外国制造的物品，如“玉长杯”，因日本不出产那种材料，所以它肯定是唐朝的舶来品。

日本在东大寺[[6]](#_6_5)建正仓院的时候，大海对面的中国正处在唐朝。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唐朝的国际色彩最为浓厚。特别是唐朝与西域的交往非常频繁，在首都长安居住着许多来自西方的外国人，这一点从当时的诗文中就可以了解到。

唐玄奘的印度之行最为有名，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僧侣和商人往来于丝绸之路。所以，在正仓院的藏品中有从西域经唐传到日本的物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人们从宝物中，从葡萄唐草纹的搭配中，既可想到天山对面的绿洲，也会浮现被称为沙河的荒凉大漠，甚至会感受到出现在孙悟空故事里的火焰山之严酷。在西域的每条街上，都有楚楚动人的碧眼胡姬，她面带微笑，往玻璃杯里斟酒，那酒呈现出浓浓的琥珀色。她脚踏的地毯上勾勒着美丽的图案，屋顶上挂着厚厚的毛毡。从淡青色的瓷壶里飘出羊奶的香味。——面对着宝物，或许人们会突然沉浸在上述的遐想中吧。

不愧是圣武天皇[[7]](#_7_5)所拥有的宝物及大佛开眼会（752年4月9日）所使用的各种器物，每一件都是精挑细选的一级品。毫无疑问，这些宝物值得人们不带任何成见地对器物本身进行鉴赏，也许这是理想的鉴赏态度。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好不容易才出现的时间或距离上的浪漫主义情趣，也不必强行地驱散它。

因为采用了“校仓造”[[8]](#_8_5)这样的建筑样式，实行了“敕封”[[9]](#_9_5)这种特殊措施，所以宝物获得较为理想的保护。但尽管如此，千年的岁月还是让宝物变得陈旧。那千年的铁锈绝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时间上的浪漫主义，当然要求在大脑里进行复原操作。例如，天平时代[[10]](#_10_5)（710—794）人们并不尊崇苔藓情趣及阴翳之美，而是更喜欢落落大方、绚丽多彩的东西。

表现这一特点的宝物是“平螺钿背八角镜”。在这个八角镜上，镶嵌着波斯产的土耳其石和阿富汗产的青金石。这种色彩丰富的构图正是天平时代的灵魂。整个构图似乎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即先把时间和距离上的浪漫主义情调吸收进去，再把它毫不吝啬地向四周发散出来。

这一作品的彩色照片被选为正仓院的广告画，其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 芭蕉[[11]](#_11_3)和杜甫

一个创始者必须是个专心致志的勤奋人，同时也必须是个不知满足的有心人。

将从各个方面获取的营养成分吸收到自己要创造的艺术中去，这正是芭蕉在俳句上的立场。除了以往的文学形式，他要把外国的诗文当作营养成分，尽管当时只有中国的诗文。例如，杜甫在诗中所运用的倒装法，芭蕉就把它引入到自己的俳句中。杜甫《秋兴诗》八首中有这样的诗句：

香稻啄余鹦鹉粒，

碧梧栖老凤凰枝。

本来应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为了强调“香稻”“碧梧”，杜甫将它们放到了句首。

己が火を木木の蛍や花の宿

（流萤不知身带火，错把树丛当花都）

鐘消えて花の香は撞く夕哉

（晚钟撞过音消去，又有花香扑鼻来）

芥川龙之介[[12]](#_12_3)指出，在上面芭蕉所作的两首俳句中，芭蕉运用了特殊的表现手法，这便是受上述杜甫句式的影响。为打破常规而借鉴外国文学的技巧并不是坏事。只是难点在于中日两国的语言体系根本不同。一个是屈折语（日语），另一个是孤立语（中国语），并且二者的语序也不一样。因此，虽然中国诗人为了使自己的诗不落俗套，在改变语序时煞费苦心，但在日语里，改变语序却是轻而易举的事。

杜甫在《白帝城最高楼》中有一句“杖藜叹世者谁子”。这句诗杜甫使用了破格的表达方式。在汉语中，“谁”通常是放在句首。芭蕉模仿这一诗句，创作了这样一首俳句：

髭風を吹いて暮秋嘆ずるは誰が子ぞ

（一阵凉风吹须过，又是谁人叹暮秋）

但是，作为日语语序，总之还是换为“誰が子，髭風……”为好。如果借用这种形式上的技巧，表达往往会变得生硬。在运用杜甫的倒装法时，芭蕉应该是注意到了这点。

芭蕉作为审美意识方面的圣人，大概感觉到了应该学习杜甫的诗魂而不是他的形式。也许芭蕉从一开始就崇拜杜甫的诗魂，所以他才想连形式技巧都引入到自己的俳句中吧。

芭蕉从杜甫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为表现自己的内心所思而捕捉自然”的这种方法。关于这一点，吉川幸次郎[[13]](#_13_3)先生早就指了出来。

“山はみな蜜柑の色の黄になりて”（晚秋景色一片黄，群山皆披蜜橘装）是从杜甫五言律诗《放船》的“黄知橘柚来”中得到的启示。这类例子有很多，将其一一列出意义不大。漆山又四郎[[14]](#_14_3)先生在他的《译注杜诗》中指出，“逃水や椿流るる竹の奥”（蜃景出现如魔幻，茶花流经竹林边）是来自杜甫的《夜宴左氏庄》中“暗水流花径”的启示，“春雨やふた葉にもゆる茄子種”（新芽初露茄子种，又逢春雨朦朦来）是从《春夜喜雨》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中获取的灵感。

如果仔细品读芭蕉的俳句，我有一种不得不那样联想的感觉。在芭蕉的俳句中，如果我们用心查找漆山又四郎先生所指出的那类例子，就会发现还有很多。我想偶然一致的地方也应该不少。

我在这里必须指出，如果要探讨“明ぼのやしら魚しろきこと一寸”（天色微明来岸边，一寸白鱼入眼帘）和杜甫的《白小》里的“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之间的关系，恐怕其相似度要比前文所举的《春夜喜雨》与“春雨やふた葉……”的相似度更高。

延宝八年（1680），37岁的芭蕉迁居到深川，因离大海很近，所以他从杜甫的诗句“门泊东吴万里船”中取了一个庵号，叫“泊船堂”。在芭蕉的真迹中，我们真的发现了他写的“门泊东海万里船”。至于芭蕉是错把吴写成海的，还是故意改写的，我们还不清楚。但无论是哪种情况，这都是在说明芭蕉对杜甫倾慕至极。

而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芭蕉果真对异国他乡的诗圣杜甫抱有正确的理解吗？

芭蕉将自己的俳句看作与天下国家无关的，甚至是与现实生活脱离的另一个世界的东西。自然观照法是一种将自己心灵投射到自然中去的观察方法。芭蕉甚至把这种方法也当成与下流的俗界相隔绝的“三昧境界”中的方法。

也就是说芭蕉追求的是“纯文学”。这是他培养纯粹诗思的一种尝试。

即使同样的心灵投射，杜甫忧虑的是天下国家，他希望得到较好的地位，实现自己的社会抱负。杜甫是非常现实的，就拿作诗来说，因为当时的高等文官考试最看重诗文，所以他一定是为此苦练了作诗的技巧。

尽管如此，杜甫却不被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并且他处在安禄山叛乱那样一个混乱时代。被杜甫投射到自然中去的内心起伏来源于那种活生生的现实。

芭蕉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些，而是把杜甫的漂泊看成隐居者的旅行。芭蕉认为杜甫和喜欢漂泊的自己很相似，所以他对杜甫感到亲切，而实际上，杜甫却不想到处游走。

明朝邵傅所著的《杜律集解》几乎是唯一通俗的杜诗指南书，但同时又是一部敷衍之作。这部《杜律集解》印刷后不久，就无人问津了。然而，芭蕉外出旅行时小心翼翼地装进行囊的大概就是这本书吧。

必须指出，只读这本书是芭蕉的不幸。

但是，仔细想想，误解也是一种理解。至少芭蕉为理解杜甫按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努力。

在这一过程中，俳句汲取了营养，越来越富有内涵了。

极端一点说，正因为芭蕉误解了杜甫，对杜甫怀有亲近感，所以杜甫的某些部分才会成为俳句的血和肉。

## 广大的空间

目前城市建筑的高层化还在发展，建设热潮仍在持续。近日，我因事去了一个十年都未踏足的地方。记得那里附近有个叫P大厦的大楼，凌驾于周围的建筑物之上，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当然我是把它作为前行的目标了。结果，上路一看我才大吃一惊，十年之间摩天大楼已是鳞次栉比、到处都是了。其中，有个小楼正顽强地抵抗着周边高层建筑的压迫，而那个小楼正是我的前行目标——P大厦。

这个P大厦也定会在不远的将来被拆掉，以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形态重获新生。面对这样的建设热潮，人们的感想也会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吧。听说我的一个熟人——某高级地毯进口商一看到高层楼，他就想“噢，地毯又畅销了”。因为大楼是西式建筑，楼里地面的大部分会铺设地毯，而社长室和贵宾室的地毯必须是高级的。

超高层大厦里的地面总面积会达到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拥有庞大数字的不仅是楼里的地面面积，壁面面积也蔚为可观。另外，在功能上无论怎么设计，现代大厦定会留出休闲的空间。

今后对壁画及装饰墙面或“休闲空间”用的绘画、雕刻等作品的需求定会越来越多。如果社长室或贵宾室里的地毯必须是高档品，那么悬挂在墙壁上的绘画也必须是一流的艺术品，而摆放在角落里的雕刻和工艺品也只能是一流艺术家的作品。

有人偶然发现了远古之人把牛画在洞穴之上，这一时成为大众议论的话题。所谓绘画，其实就是指画在那种场所并保留至今的东西。

尽管人们离开洞穴，在地上建房并开始定居生活，但仍然在墙壁上绘画。古代王朝建造了宫殿、陵庙等巨型建筑物，当然，那个时代的第一流艺术家也被动员到装饰墙壁的工作当中。

不要以为古代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建筑。正因为古代统治者可以肆无忌惮地把人当成奴隶来驱使，所以才能建成使现代人感到震惊的宏伟建筑。万里长城、阿房宫等无不是如此。

例如，屈原的《楚辞》中有一首长诗，题目叫《天问》。它是作为陵庙壁画上的说明，即所谓的画赞被人写上去的，这已成为定论。

屈原作为大臣而服侍的楚国被秦国消灭，楚国的陵庙或因遭受破坏或因无人照看而自然荒废，画在陵庙上的壁画早已不知去向，而只有画赞被记录、被抄写、被流传至今。

如果从屈原的画赞进行推测，绘制在巨型建筑物墙壁上的图画好像主要是叙事性的，描绘一些天地造物、圣明天子的事迹等。汉代的宫殿上曾经绘有功臣的肖像。虽然也画风景，但那只是单纯的背景。在古代，大自然保持着原貌，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也没有将其画在画上，或写在诗里。

地面建筑物因天灾和战乱而消失，唐代以前的壁画几乎都未被保存下来。开凿于鸣沙山山腰上的敦煌莫高窟之所以能奇迹般地保留下来，是因为它不是地面建筑物。

除天灾和战乱之外，唐朝会昌年间（841—846）的“灭佛运动”也使有些地面建筑遭到破坏而消失。晚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制作了壁画目录。那些壁画画在长安、洛阳等地的寺院道观中。其中，虽然有些作品画的是山水和松树，但大部分作品是神佛像、人物画及佛教绘画。在会昌的“灭佛运动”中也仅仅是浙西的甘露寺免遭破坏。据说附近各寺把珍贵的壁画全部寄放到了甘露寺。人们保存美好事物的愿望确实很强烈。

第一次在诗中歌颂自然美的是六朝的谢灵运，他也是个画家。避难于甘露寺的名画中也有他的六件作品，据《历代名画记》记载，那六件作品全是菩萨像。那个甘露寺里的名画现在也全部遗失了。

地面建筑物是不能长久保留的。每当我仰望高层大厦时，都忍不住祈祷，希望那些画在广大空间上的名画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

## 油滴天目茶碗 ——由安宅收藏东洋陶瓷展所看到的

虽说同样是名品，有些东西人们只要注目观赏就会兴趣盎然，绝不生厌；有些东西人们却不满足于观赏，忍不住想去触摸。

这个油滴天目茶碗就属于想要触摸的名器。这倒不是说要把它紧紧地捧在手掌上，而是要用指尖轻轻地触摸它，轻轻地把它拿起来掂一掂重量。

镰仓时代[[15]](#_15_3)有很多日本的留学僧渡海到宋，在禅宗道场——浙江省天目山修行，他们在那里研习饮茶，并把茶碗带回日本。从那以后，在日本人们就把在天目山僧房所使用的，带有厚厚铁质釉的陶瓷器称为“天目”。

碗口稍窄，整体紧凑，就像看一幅轮廓分明的画，给人以舒适安稳之感，也许这就是“一目了然之美”吧。而金色的油滴竟被周围的漆黑吸走，悄然隐去自身的奢华，这更让人感受到茶碗的高雅。

## 景德镇和宜兴

访问景德镇恰好是十年前的事。那时我想写一本有关景德镇的书。经人介绍认识了丰增晏正，他对景德镇可谓无所不知。

丰增在中国东北被善良的养父抚养长大，后在杭州的艺术学院学习，毕业后到景德镇工作。他在艺大是专攻雕刻的，在景德镇曾做过陶瓷学校的教员，与出生于上海的他的学生结为夫妇。在我们相识的几年之前，丰增得遂心愿回到了日本。他还记得战争中为升学而回到日本的亲哥哥的名字。

回日本后，丰增好像吃了很多苦。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刚拥有一个由车库改成的瓷窑。他的夫人专攻绘画，所做的工作就是在丰增的作品上作画，作品是他们夫妇合作的产物。

相识十年，我随时关注丰增的作品，渐渐地熟悉起来。他是用中国景德镇的技术在有田开窑制作的，也难怪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中式风格。但丰增好像要按自己的方式追求“日式”之美。在京都法然院[[16]](#_16_1)的关照下，他举办了第一次作品展示会。从那时起，我就感觉他有那种倾向了。恐怕那是丰增必然要艰难跋涉的道路。

四年前我迎来了六十岁寿诞。当时为了纪念，我请丰增为我制作了酒壶，也把它们赠送给了为我祝寿的人。丰增为我制作的酒壶没有装饰，也正因如此而百看不厌。我晚饭小酌时一直爱用它，清新淡雅，给人以平和安稳之感。

器皿这种东西，最为重要的还是用起来感到亲切。丰增作品里有一种陶瓷杯，拿杯时与手指接触的地方有个小凹槽，我给它起名叫酒窝，制作人的用心和关怀竟渗透到了那里。所以，这也成为我的最爱之一。

在饮中国茶时，绝对要用宜兴的茶壶。江苏省宜兴位于太湖旁，也是盛产名茶的地方，古名叫阳羡。《三国志》中的孙权，年轻时曾在那里当过县长，晋朝的周处曾在那里三度兴举义兵，所以那个地方改名为“义兴”。宋代为避讳宋太宗的名字（光义）改为“宜兴”，从此这个地名沿用至今。

宜兴的陶瓷叫紫砂陶，特别是在烧制茶器方面卓尔不群。春秋时代，吴越之战后，范蠡弃官来到这里成为大富豪。据说他是因制陶而获得的成功，人们称他为“陶朱公”，宜兴的陶瓷业者一直把范蠡当作业界的始祖来祭祀。

人们都说景德镇瓷器是“匠人”技艺精湛，宜兴瓷器是“文人”气息浓厚。宜兴瓷器，有的上面带有诗句，即便用作装饰也相得益彰，恰到好处，给人的感觉是那些诗句可以轻地松融入使用者的内心。景德镇以分工协作为原则，尽管有几个陶工的名字流传下来，但他们的作品却非常少。比如“祥瑞”等，最好理解为是店铺的名号。然而，宜兴却流传着供春、赵梁、元畅、董翰、时朋、李养心、时大斌（以上为明代）、杨彭年、杨凤、陈曼生、邵大亨等名人的名字和作品。遗憾的是，这些名人的作品根本到不了我们的手上。上海博物馆藏有时大斌的作品，那真是令人惊叹的艺术精品。

幸好住在熊本的华侨前辈叶菊华先生是一位宜兴紫砂茶壶的收藏家，我能时时光顾，大饱眼福。香港艺术馆的分馆也有茶具文物馆，那里收集了一些宜兴的茶器，但我觉得叶氏的藏品更胜一筹。

因为看了叶先生的收藏品，我在中国旅行时即便在文物店看到宜兴茶器，也没太大的兴趣购买。可能是看好东西看得太多了，眼光才如此挑剔吧。尽管如此，我也求购了几件自己中意的东西放在身边。

仅仅是放在桌子上面，空气中就弥漫着文雅的香气。当我伏案写作感到疲倦时，感觉香气包裹着自己，给人以温暖和抚慰。

紫泥新品泛春华。

这是宋代梅尧臣的诗句，在宜兴紫砂里似乎蕴藏着某种力量，可以使内心变得强大。最近丰增来访，谈话中偶尔涉及景德镇与宜兴比较的问题。算是景德镇出身的他，不无失望地说道：

——（二者的）文化差距太大了。

## 超越真伪

复印技术的发达令人感到吃惊，其中彩印的发展使原创与复制之间的区别越来越难以分辨了。

即便在没有复印机的时代，美术界也曾为这个问题困扰过。一般认为，一模一样地模仿名画对画家来说是必须要做的功课。他们完全没有制作“赝品”的意思。对原创名作进行认真仔细的观察后，用笔进行模仿，这是学习名画家手法的最好方法，恐怕也是唯一的方法。这种行为不是躲在别人背后偷偷摸摸地做，而是可在光天化日之下堂堂正正地进行，因为这是修业。当然，有一些人可能是为了显示自己如何用功。

因为模仿是画家修业阶段的必修科目，所以肯定会产生大量的模仿作品。如果有人把这些模仿品弄到手，填上原创名画家的署名，盖上印章，那就成了确切无疑的“赝品”了。在此之前，不过是单纯的模仿。

模仿的方法有“模”“临”“仿”三种。“模”是指将纸张等覆于范帖之上进行描摹。“临”是将原版放在旁边，以它为范帖进行模仿。“仿”只是理解原版画家的创作意图，将其手法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去，这与管弦乐队的指挥家按自己的理解来指挥演奏作曲家的作品相似。

因为“模”和“临”指的是一模一样地制作同样的东西，所以如果巧妙地填上署名和落款，就很容易被错认为是真品。换句话说，它有可能成为赝品。但是，“仿”仅是学习笔法，不会出现与原作一样的作品，因此将两个作品摆放在一起人们不会怀疑哪个是真，哪个是伪。尽管如此，“仿”制作品也有可能被认为是新发现的真品。偶尔还会出现有的“仿”制品比原作者的作品更好的情况。

从鉴赏者的角度来说，可以把给予自己更多感动的作品，称为“我的真品”，而不论真伪。追求名牌的心理不适用于艺术品。

元末的黄公望（1269—1354）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座高峰，之后的画坛后学可以说无不受其影响，对他崇拜万分。理所当然，他的画作被无数人模仿研究过，由于模仿者人数太多，以至于有人认为他画风俗套。

《富春山居图》被誉为是黄公望的最高杰作。它是一幅长6.37米的长卷，曾被明代的沈周（1427—1509）、董其昌（1555—1636）等一流文人所收藏，后来落入吴洪裕这个清代大收藏家之手。

吴洪裕临终时留下遗言，要把自己最喜爱的智永（隋代僧人，王羲之七世孙）的《千字文》和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烧掉。他是想死后到了阴间也能欣赏到这些艺术精品。在历史上，常有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出现。

唐太宗（598—649）也是这类人之一。他把王羲之的《兰亭序》真本弄到手，让书家摹写，并把它们分送给皇族和近臣。这本来是好事，但他也是在遗言中命令属下把真本和他一起葬入陵墓。

实际上真本《兰亭序》原是智永秘藏的。智永死后，唐太宗再三向智永的弟子辨才索要。辨才每次都回答“不知所踪”。其实真本《兰亭序》被辨才藏在永欣寺的房梁上。

于是，监察御史萧翼受唐太宗之命接近辨才。他隐瞒身份与辨才谈诗论文，抚琴下棋，二人很快成了最好的朋友。终于有一天，辨才把真本《兰亭序》拿给萧翼看，萧翼借机把它拿走献给了太宗。虽说监察御史不应该做这种龌龊之事，但萧翼临走时留下了这样的便函：

——您曾对陛下说真本《兰亭序》不知所踪，所以这幅帖恐怕是摹本，如果您需要，我随时都可奉还给您。

因为辨才向皇帝说了谎话，不可能再恬不知耻地去把它要回来，所以辨才彻底落入了对方的圈套。

智永生前30年间竟抄写了800本《千字文》，并把它们捐献给浙江的许多寺院。然而经过1000多年到了清初，800本《千字文》就所剩无几了。吴洪裕藏有一本，他酷爱至极。因此，依照他的遗言，那本《千字文》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一起被投进了大火之中。

智永的《千字文》烧了，但《富春山居图》却被吴洪裕的侄子吴静安从大火中抢救了出来。卷首虽然烧坏了一点，所幸大部分保持完好。

再过百年，到了乾隆十年（1745），《富春山居图》被征入宫。乾隆帝看了爱不释手，并在留白处屡屡题赞，上面盖满了“乾隆御览之宝”之类的印章。然而，没想到它却是个摹本。第二年，真本被收进了皇宫。

中国有个“纶言如汗”的成语，意思是说，从天子口中说出去的话是不能收回的，就像汗水从体内流出而不能再返回体内一样。

原来天子把摹本说成是真本，那么，后来收入皇宫的真本又怎样了呢？乾隆帝命令侍臣梁师正在真本上题跋。梁师正写了这样一些内容，说旧藏者是真迹，这幅虽为摹本，但画格秀润，可以并存等。

这两幅画，现在完好地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那幅《富春山居图》从大火中被抢救出来之后，当然经过精心的修复。据说，现代科学仪器能够对微细之处进行检测。晚一年收进皇宫并被打上摹本烙印的《富春山居图》，果然被确认为有被大火烤过的微弱痕迹。

太宗墓（昭陵）在唐朝灭亡后，很快被人盗挖，《兰亭序》不见了踪迹。现存的是太宗命人写的摹本，或是各个书家的临摹本。另外，智永的《千字文》真本之一现存于日本，它是奈良时代被人传到日本来的。

## 胸中逸气

这里有皮萨内洛[[17]](#_17_1)的《圣尤斯塔斯的幻像》和石涛[[18]](#_18_1)的《鬼子母神图卷》。前者是15世纪的画作，后者是17世纪的作品，时间相差约200年。两幅画作描述的都是以改变宗教信仰或皈依宗教为主题的故事。

皮萨内洛的画以图拉真帝时代的军人普拉希德（Placidus）为主角，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普拉希德外出打猎，看到一头美丽的牡鹿就从后边追赶。正在这时，从牡鹿的两只角间浮现出闪闪发光的十字架和基督形象，那头牡鹿还说自己就是基督。普拉希德深受感动。从此，他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皈依基督，接受洗礼，并被授以尤斯塔斯的名字。据说，从此他彻底戒除了以前扑杀鸟兽的习惯。画作描绘的是普拉希德回心转意的瞬间。普拉希德下意识地在马上蹬紧马镫，缰绳从他的右手脱落。人物动作在时间上的连续性被切断，画面定格在当时人物的瞬间反应上。

与此相对，石涛画作的主角是鬼子母神。据说，鬼子母神子女众多，竟有五百子（又说千子），但她常以捕食他人幼子为生。佛陀为了劝诫她，就把鬼子母最喜爱的幼子藏匿起来，鬼子母因此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这时，佛陀对她教化道：“你有五百个孩子，现在少了一个，尚且如此悲伤，被你吃掉的孩子的父母心里又会如何呢？”鬼子母闻听此言，顿悟前非。从此，她皈依佛教立下誓愿，成为一个保佑母亲安产及幼儿安全的神。这幅画描绘了她动员亲属寻找下落不明的爱子时的情景。

人们对两幅画作稍作观察，就会马上清楚二者之间的不同。皮萨内洛的画虽以幻影为主题，但最终还是追求与现实世界的相似。他在画中甚至连动植物都进行了仔细周到的描绘，使人感到他对事物的观察力非常人可及。作品表现了一种精致的装饰美，细致入微的写实营造出一种宗教氛围。

石涛在描绘鬼子母神这一幻想世界的过程中，当然也对现实世界进行了观察和写生，但是他对模拟现实似乎一直怀有恐惧。所以他只能把表现不拘于世俗的、高雅的“胸中逸气”作为理想，这也是中国绘画的特点。

为了超越写实，描绘就必须是自由的。由于远近法和阴影法会导致画面与现实过于相似，所以他不会采用。他想用调整画面构成比例的办法来打破以往的窠臼。

另外，他还在画面的前面用细腻的白描绘制群像，后面放上用完全不同的画法所绘制的山水背景。总之，他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远离现实。可以说，石涛和皮萨内洛的努力方向正好相反，但是他的画作也同样把宗教的严肃性表现了出来。

石涛提倡“一代一夫执掌”，意思是说在一个时代，在一个领域，只需要一个人。石涛正是其中的“一夫”。

## 翡翠

“翡翠”原本是“川蝉”[[19]](#_19_1)的汉语名称。“川蝉”是栖息在河边、能灵巧地跳进水中捕鱼的小鸟，脸颊周围有鲜艳的翡（绯）色，头和翅膀是靓丽的翠（绿）色，后背呈醒目的青色，腹部为略带微红的橙色，五彩斑斓，煞是好看。

由于这种鸟集多种色彩于一身，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翡翠的名称就一直用于表示玉，即宝石的颜色。其中，拥有红绿两种颜色的玉被称为“翡翠玉”。但不知是哪里出了差错，“翡翠”在不知不觉中就开始指称玉石本身了。

玉是宝石的中国名称。从硬度上分，可分为硬玉和软玉。在中国，人们喜爱玉和玉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硬玉由于太硬不能进行精雕细琢，所以通常用作玉器的是软玉。软玉分为白色和绿色，产自昆仑，即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和田。硬玉产自云南和缅甸，它的使用是在明清之后。

过去在中国宫廷，帽子顶端的顶戴镶有金石，依照官位不同而有所区别。只有那些官位高的人才会被允许佩戴红珊瑚和青翡翠。

在清朝，昆仑山脉的玉石开采是国营的，民间的玉石买卖也受到限制。清朝还设置了玉门关这一防止走私玉石的关卡。据记载，乾隆年间（1736—1795）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高朴因走私玉石被处以死刑。这说明当时人们对玉石的渴望达到了铤而走险的地步。

翡翠的魅力在于其值得玩味的色调。其中青绿和浓绿特别为中国人所喜爱，听说青瓷等也追求翡翠的那种淡淡的绿色。在钻石、蓝宝石等西方宝石中，品质的高下是由其荧光度而定的。晶莹剔透的钻石会散发出一些不规则的光，这些光的闪耀强度就是荧光度。但是，中国评判玉石好坏的标准却不是这样。

人们常用“湿润”“润泽”等词汇来表达玉石所带来的美感，可见“润”是评判玉石最重要的美学标准。

如果说西方的透明辉石表现了“由外向内射入的辉映之美”，那么可以说玉石诠释了“由内向外渗出的浸润之美”。

有人说玉与人的皮肤接触会增加皮肤的滋润度。实际上我们把玩翡翠玉器时，是通过手的触摸来感受玉所带来的那种快乐的。

另外，还有人说在鉴定翡翠的真伪时，要把翡翠放在鼻尖上，根据它的凉热来做判断。从这种说法中，我们也能感受到玉的娇媚及它所拥有的“润”的魅力。

翡翠可谓是象征“东方之美”的宝石。

注解：

[[1]](#_1_16)　董作宾（1895—1963），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之一。河南省南阳人，原名作仁，字彦堂，号平庐。

[[2]](#_2_8)　谢赫（479—502），南朝齐、梁间画家、绘画理论家。善作风俗画、人物画，著有《古画品录》。提出的中国绘画上的“六法”，成为后世画家、批评家、鉴赏家们所遵循的原则。

[[3]](#_3_6)　萨迪（Sa'di，Moshlefoddin Mosaleh，1208—1291），中世纪波斯（今伊朗）诗人。萨迪的被保存下来的抒情诗有600多首。作品通过对花鸟、山水、美女、静夜的描写，寄托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美好人生的向往。萨迪最有名的作品是《果园》《蔷薇园》。

[[4]](#_4_4)　哈菲兹（Hafiz，1320—1389），14世纪波斯著名诗人、苏菲主义学者。本名舍姆斯丁·穆罕默德。哈菲兹的诗，主要是近500首抒情诗体的“嘎扎勒”（ghazal），一般由7～12联句组成，只有一个韵脚，通常在最后一联点出主题。他也写过一些颂诗、鲁拜诗（即四行诗）和短诗。他的波斯文《哈菲兹诗集》（Diwan Hafiz）约8000余行，于1791年第一次正式出版，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清真寺经堂教育中亦有流传和讲授。后世伊斯兰学者称誉他为“诗人中的神舌”“设拉子夜莺”。

[[5]](#_5_4)　日本奈良时代的仓库，在今奈良市。始建于8世纪后半叶。位于东大寺大佛殿西北面。正仓院内分北仓、南仓和中仓。756年开始启用。这一年，圣武天皇驾崩，光明皇后在举行49天的法会之后，将天皇日常用品及珍藏物品交东大寺保管，东大寺把这批遗物收入正仓院。此后，诸如东大寺大佛落成仪式上使用过的各种物品及信徒捐献物等，也收入正仓院。这里的收藏品数量大、种类多，有许多是从中国及亚洲各地传入的，对研究当时日本的对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6]](#_6_4)　东大寺，又称大华严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等，是日本华严宗大本山。其位于平城京（今奈良）东，是南都七大寺之一，距今有1200余年的历史。佛寺是728年由信奉佛教的圣武天皇建立的。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和尚曾在这里设坛授戒。东大寺在1998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7]](#_7_4)　圣武天皇（701—756），日本第45代天皇（724—749）。圣武天皇在位期间，处理天灾地变、氏族对立、叛乱等政治危机极为得体，并极力采纳唐代文物制度，用以充实国政。信仰佛教，创建国分寺、东大寺。两次派遣唐使，出现了天平文化盛景。于749年让位出家。

[[8]](#_8_4)　校仓造，日本古代仓库建筑式样。奈良、平安时代大多采用此法。将原材锯成断面呈三角形的长材，突出一侧朝外，平面向内，以井字形重叠构成四壁。三角形木材适应晴雨的伸缩，具有通风、防湿作用。地板较高，用柱子支撑。现存东大寺正仓院是最大、最古的校仓造，仍良好地保存着平安时代的遗物。

[[9]](#_9_4)　日文里的“敕封”与中文的意思不同。日文里的“敕封”是指根据天皇的命令给仓库的门上锁、系麻绳、贴封条。没有天皇的命令不许随便出入。

[[10]](#_10_4)　文化史上的时代划分，以圣武天皇在位的天平年间（724—748）为中心，广义上指整个奈良时代（710—794）。

[[11]](#_11_2)　松尾芭蕉（1644—1694），江户时代前期的一位俳谐师的署名。松尾是这位日本诗圣的本姓，但一般均以芭蕉直接称呼他而不用姓氏。他公认的功绩是把俳句形式推向顶峰，但是在他生活的时代，芭蕉以作为俳谐连歌（由一组诗人创作的半喜剧链接诗）诗人而著称。重要作品有《野曝纪行》《笈之小文》《更科纪行》《奥之细道》《嵯峨日记》等。

[[12]](#_12_2)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小说家。代表作有《罗生门》《竹林中》《鼻子》《偷盗》《舞会》《橘子》等。芥川龙之介是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创作上既有浪漫主义特点，又具有现实主义倾向。他的文笔典雅俏丽，技巧纯熟，精深洗练，意趣盎然，别具一格，在日本大正时期的作家中占有重要地位。

[[13]](#_13_2)　吉川幸次郎（1904—1980）是文学博士，国立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东方学会会长、日本艺术院会员、日本中国学会评议员兼专门委员、日本外务省中国问题顾问、京都中日学术交流座谈会顾问、中日文化交流协会顾问、中国文学和历史研究家。吉川幸次郎著作等身，《吉川幸次郎全集》26册，皆为有关中国学术之论著，是他毕其一生研究中国的丰硕成果。

[[14]](#_14_2)　漆山又四郎（1873—1948）明治—昭和时期的汉学家、文学家。发表小说《雀踊》，编辑出版《陶渊明集译注》《唐诗选译注》等。

[[15]](#_15_2)　镰仓时代（1185—1333），是日本历史中以镰仓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武家政权时代。镰仓幕府成立于1185年，于1333年灭亡，历经149年。

[[16]](#_16)　法然院，位于京都市左京区，建于1680年。据说是为纪念日本佛教净土宗开山祖师——法然上人而建。

[[17]](#_17)　安东尼奥·皮萨内洛（1395—1455）出生于维罗纳，活跃于帕多瓦和威尼斯。他把“威尼斯—哥特样式”绘画所具有的那种鲜明、甜美的风格发展到了顶点。

[[18]](#_18)　石涛（1642—约1707），清代画家，中国画一代宗师。法名原济，一作元济。本姓朱，名若极，字石涛，又号苦瓜和尚、大涤子、清湘陈人等。幼年遭变后出家为僧，半世云游，以卖画为业，晚年定居扬州。工书法，能诗文。存世作品有《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山水清音图》《竹石图》等；著有《苦瓜和尚画语录》。

[[19]](#_19)　川蝉（かわせみ）是日语词，这里借用它的汉字。

# 第四部分

## 食物和历史

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的首领们除了防备外敌、保护同伴外，还把确保食物的供应和分配当作他们的任务。而食物的分配绝非易事。即便分配狩猎获得的兽肉，分配者也要考虑周全。例如，对狩猎中表现突出的人，尤其是射杀猎物的人等，就要多分；对孕妇、病人等需要增加营养的人等，也要分得比别人多；而对偷懒、不服从命令的人等则要减少分量以示惩罚。这就是所谓的公平。

宰相的“宰”字，如果按《说文》上的解释，字形是家下面有个罪人，“辛”为文身时用的针，意思是罪人。但是，“宰”是掌管、处理的意思，所以“宰”不是罪人所做的工作。有一种说法认为，“宰”是管理罪人的意思。但从甲骨文上看，“宰”却像一把有大把手的刀。因此，“宰”是指祭祀时切割牲畜肉的菜刀。过去切割作为祭品的牲畜肉是重臣的工作，在举行重要的礼仪活动时，国王会亲自操刀。

在原始社会，集团的首长负责分配，如果分配不公平，人们会不服。考虑到“宰相”“宰領”[[1]](#_1_19)等词汇的来源，可知古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向人民公平地分配食物。

伊尹是辅佐商王朝的始祖——汤王时的宰相。据《史记》记载，伊尹年轻时曾想服侍汤王，但苦于和汤王没有亲戚关系，于是，他就在有莘氏的女儿嫁给汤王时，成为滕臣（随嫁的臣仆）背负鼎俎去了商。他以烹调美味来接近汤王，向其阐述为政之道，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手拿菜刀分配食物的厨师曾经是最了不起的人。也许是后世之人由于难以把伊尹和汤王联系在一起，就编造了有关伊尹的故事。例如，他背负鼎俎以美味接近汤王，并向其阐述为政之道等。君主觉得饭菜特别好吃，于是就往厨房里看，并问厨师：“你是怎么做的？”这种情况，现代也是屡见不鲜。

灭掉商王朝的周是太公望吕尚辅佐的。有一个著名的传说是，太公望垂钓时文王把他带了回去。但是，关于太公望也有这样的传说，说他在肉铺卖肉时，文王把他带了回去。在屈原《楚辞》中的《天问》里出现的情节是，师望（太公望）在肉铺，一边敲着刀环一边高声谈论自己的主张，文王听后大喜。《天问》中的一节是这样写的：

——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

据说太公望对文王说：“下屠屠牛，上屠屠国。”

不仅是商的建国元勋伊尹，而且周的建国元勋太公望吕尚也是以手拿菜刀的厨师形象出现的，这似乎在说明“食物”与政治联系之深。

孟子说过“民以食为天”，因为“食物”如此重要，所以它才在历史上也占据重要的地位吧。

例如，汉朝自建国以来就备受到北方匈奴的困扰，但在宣帝甘露三年（前51），匈奴王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向汉称臣。这是划时代的大事，说明汉朝终于解决了匈奴问题。虽说是匈奴内部发生了内讧，出现了很大混乱，一时竟出现了五个单于，但匈奴降汉的主要原因，大概还是在于食物问题。汉朝把来朝称臣的单于送走后，同时向边境地区提供了三万四千斗粮食。在元帝的初元元年（前48），单于又上书诉说民众困苦，汉朝再次向匈奴输送了两万斗粮食。

当时一遇丰年谷价就下跌，农民陷入困境。五凤四年（前54），因谷价每石才卖五钱，所以在耿寿昌的建议下，汉朝建立了“常平仓”制度。谷价低时，国家以较高的价格购买储存下来，谷价高时再低价售出。这种措施对易于储存的农作物是适用的，但是，遇到游牧民的牛羊因异常气候或严重瘟疫死亡时，却毫无办法了。一旦出现羊群大量死亡，就会引起游牧民的抢掠，最后在历史上留下动荡不安的一页。

虽然汉朝向匈奴提供了谷物援助，但是，匈奴人的饮食习惯是吃肉和喝奶，所以对谷物还是不太习惯。因为没有别的食物可吃，所以他们逐渐习惯吃谷物，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吧。

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在北方有个敌人叫郅支单于，于是汉朝就让呼韩邪单于的部众移居到五原塞。后来，郅支单于的势力减弱，呼韩邪单于及其部众在永光元年（前43）又回到了北方。史书上的记载是因为“塞上禽兽尽”。也就是说，他们在那里狩猎没有收获，所以才决定回到了北方故地。或许是他们没能耐住以谷物为主的饮食生活吧，他们留在五原塞的那年是公元前51年，算起来他们仅仅忍受了八年左右。

食物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所以在古代从事烹饪工作的人，其社会地位非常高。周代设有“膳夫”这一职位，掌管周王的饮食，属于大臣级别。在古代日本也有“大膳”[[2]](#_2_11)和“典膳”[[3]](#_3_9)等职位，地位很高。然而，随着人们生活的复杂化，加之文化水平的提高，谈论饮食的话题就被人们认为是品位不高了。我认为这与儒家和佛教的思想也有关系。从事饮食工作的人，其社会地位也下降了。对于伊尹，后世之人也想尽量抹去他的厨师形象。伊尹本来就是一个厨师，但在伊尹的故事中，厨师不过是他阐述为政之道的道具而已。

也许是由于生活有了闲暇，最近人们对饮食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可以看出饮食在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渐加大。我认为，研究并提高饮食文化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义务。

## 甘薯

我写琉球的历史小说时，对有关史料进行了多方查找。琉球直到17世纪初都是接受明朝册封的，它从明朝那里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赏赐品，却没有受到过明朝的剥削。但是，自1609年萨摩藩[[4]](#_4_7)侵略琉球后，琉球就开始处于萨摩藩领主岛津氏[[5]](#_5_7)的支配之下了。岛津氏为获取对中贸易的利益，承认中国对琉球的册封，因此，琉球成为中国和萨摩藩双方的属国。与中国不同，岛津氏从琉球榨取了相当多的利益。

人口8万左右的琉球应该是因为岛津氏的剥削而衰落。但是，当查看历史时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反而是琉球的文化在那一时期出现了繁荣，如著名的组踊（琉球舞蹈）就是那个时期完成的。

这里的原因可以举出很多，但其中之一就是饮食生活的安定。琉球是个台风多发地区，因此，农作物经常受到损害，饥荒频繁发生，有时人们甚至以铁树的果和茎来充饥。铁树的果和茎含有大量的淀粉，被称作“救荒食品”。但是因为它含有苏铁苷这种毒素，所以必须用水仔细清洗后才能吃。虽然铁树能够果腹充饥，但不是好吃的东西。就在岛津氏进攻之前，甘薯被人从福建传了进来。因甘薯生长在土里，所以很少遭受台风的侵袭，是最适合于琉球的农作物。

19世纪末，哥伦布将原产于巴西的野生甘薯带到了西班牙，后来甘薯被传到了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旧称）、马来、马尼拉等地。在吕宋国（今菲律宾吕宋岛）携带甘薯苗出国是被禁止的。对特殊产品实行垄断，这与中国对丝绸和造纸的做法如出一辙，但无论怎么禁止，甘薯还是被传了出去。福建长乐县（一说晋安县）有个叫陈振龙的人，因做生意曾在吕宋住过一段时间，后来他回国时偷偷带走了甘薯的藤蔓。

碰巧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福州发生大饥荒，时任福建巡抚的金学曾鼓励当地人种植甘薯。福建人取巡抚的姓，开始把甘薯叫“金薯”。人们都说甘薯“不与五谷争地”，在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种植，所以在凶年饥岁，它成为人们的救命食品。清代以后，人们为了纪念对甘薯传播做出过贡献的金学曾、陈振龙及其子陈经纶（向金学曾进言的人）等，建造了“先薯祠”。

将甘薯从福建传到琉球的是一个叫野国的总官（在进贡船向天妃进香，管理船夫的官），当时琉球正面临岛津进攻。野国总官也被冲绳人尊为番薯大王，人们每年都在他的墓前举行祭祀。1751年，野国总官的六世孙为他立了石碑。总官身份较低，不是士的身份，但是琉球国王为纪念野国总官的功绩，授予其直系子孙以士的身份。

我去琉球的宫古岛时，有人对我说甘薯传到宫古岛的时间比琉球本岛要早，据说是在1597年。也就是说，那不过是陈振龙把甘薯从吕宋带出来的三年之后。只是甘薯好像再未从宫古向外传播。因为岛津氏统治了琉球，所以甘薯自然传到了萨摩。因此，甘薯在萨摩被称为琉球芋，从萨摩传到日本全国后，甘薯就被称为萨摩芋了。

关于甘薯传到日本一事，听说还有另外一条线路。1615年，为德川幕府工作的英国人威廉·亚当斯[[6]](#_6_7)在那霸港附近发现了甘薯。他认为这是日本所没有的植物，于是就买了一草袋送给了设在平户的英国商馆。

琉球尽管处在岛津氏的严酷统治之下，人口却从8万人突破10万人，后来又继续增加。这是因为粮食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解决。粮食问题的解决不仅使人口数量得到了增加，而且还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由吕宋—福建—琉球—日本传过来的甘薯作为救荒食品在日本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将军德川吉宗[[7]](#_7_7)在享保大饥荒[[8]](#_8_7)（1732）发生的时候也奖励甘薯的种植。此后，每次饥荒（明和、天明、文化、天保）中，甘薯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如果没有甘薯的传入，不仅琉球，甚至日本的近代历史肯定会更加黑暗。

## 琉球的食物

在琉球人的食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昆布”（海带）。虽说如此，琉球却根本不出产海带。日本的海带几乎都产自北海道。然而，平均每户海带消费量最多的县却是冲绳县。可以说，在日本是琉球人吃海带最多。

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我们只能说这是因为琉球人喜欢海带。但是，人要消费本地完全不出产的东西，则必有某种动机。至少我们应该关注琉球人是怎样知道海带的。

琉球人知道海带，是因为在江户时代海带是出口中国的商品。锁国时期的日本对中贸易，限定在长崎和琉球。琉球对中国来说是受册封的琉球王国，但实际上它处在萨摩藩的统治之下。也就是说，琉球以“进贡”方式进行的对中贸易由岛津氏掌控。

日本的海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向中国出口的？对此，我们还不了解准确的情况，因在道光年间（1821—1850）有这方面的记载，所以海带出口到中国可能比那个时期更早。一般推测是在18世纪末开始的。

中国通过琉球向日本出口的商品主要是药材，但日本却没有相应的商品向中国出口，因此海带才一跃受到关注。

从18世纪到19世纪，岛津氏几乎处于破产状态，其岁入（年收入）不过才30万两，而负债却高达500万两。那是仅靠年收入连利息都付不起的困境。挽救这种困境的是一位由茶坊主[[9]](#_9_7)（茶童）升任家老[[10]](#_10_7)的人物——调所广乡[[11]](#_11_5)。他采取断然措施，通过琉球积极地开展对中走私贸易。表面上，人们以为岛津氏是由于垄断黑砂糖的专卖权获取暴利，实际上，岛津氏却是暗中通过对中走私，攫取巨大利益。为了不让别人了解内情，岛津氏禁止日本其他地区的人进入萨摩。这是在锁国[[12]](#_12_5)中的日本内部采取的锁国措施，可认为是双重锁国体制。然而，现在的富山县，当时被称为越中国[[13]](#_13_5)的商人却被允许进入萨摩。当时富山是日本的制药中心，日本医药的大部分都在此地制作。由于他们是以中国药材为原料，所以岛津氏就大量购买经由琉球进口的中国药材——人参、麝香、甘草等。富山商人是购买自己商品的顾客，因此允许他们进入。富山商人在进入萨摩时好像携带了海带。因为是走私贸易，不能明目张胆地进行买卖，而富山商人则充当了中介人的角色。

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统计。前面已经说过，按县别平均每户的海带消费量来统计，冲绳县是日本第一。按市（县厅所在地）别统计的海带消费量，仍然是冲绳的那霸第一。然而，如果包括加工品，即“佃煮”[[14]](#_14_5)（甜烹海带）等来进行统计，据说富山市超过那霸市，成为日本第一。

海带是作为富山商人在萨摩购买中国药材时的抵押商品，它可能是由富山商人从北海道购进，在富山打包，再经由萨摩运到琉球的。他们应该是在琉球把海带改装成用于对中出口的样式，同时还要筛选和分类等。当时，海带在富山和琉球肯定是堆积如山。琉球不产海带，所以琉球人也没有吃海带的习惯。不仅如此，他们可能以前连见都没有见过。但是，当海带堆积如山之后，琉球人就有了吃海带的机会。碰巧，它又符合琉球人的口味，于是琉球人开始大量消费海带了。

19世纪中叶，日本的大借债国萨摩藩摇身一变成为日本最富裕的地区。它不仅建造了日本第一艘西洋式帆船及汽船等，还兴办了各式各样的西洋式产业。另外，岛津氏也致力于人才的培养。众所周知，萨摩藩出身的西乡隆盛[[15]](#_15_5)、大久保利通[[16]](#_16_3)等明治维新时期的著名人物均与岛津氏的发现、提携有较大关系。萨摩藩的成功也是调所广乡财政重建政策的胜利。但是，由于萨摩藩的走私贸易被幕府发现，调所广乡引咎服毒自杀了。

据说岛津氏的财政重建基础是砂糖的专卖。人们一般都对砂糖的专卖交口称赞，说“成就明治维新的是砂糖”。但是，砂糖只是财政重建的表面，背后却是海带的走私。如果真是如此，我们不得不说是“海带创造了近代日本”。

另外，还有一个统计。日本按县别统计的最长寿县是冲绳。琉球人长寿的秘密可能在于它的饮食生活。这方面的研究正在开展。人们都说多食海带和猪肉可能对健康有好处。在猪肉的平均消费量方面，冲绳县也是全日本第一。

海带贸易在1972年的中日贸易中发生了逆转。在中国，海带的养殖很普遍。这一年日本从中国进口大约1000吨海带，开始是从大连、青岛进口；1979年，福建海带出现在日本市场。

即便是海带这样一种食品，它也有各种各样的浪漫故事。

## 美丽的梅

傲立雪中也依然绽放的梅花是雄姿威武的花朵。它比任何花开得都早，所以也有花魁（花的先锋）的别名。在中国歌咏梅花的诗词长盛不衰。在以中国为师的年代，日本也有不少与梅花有关的和歌。在《万叶集》[[17]](#_17_3)中有118首是梅花和歌，远远超出40多首的樱花和歌。二者在数量上发生逆转是从《古今和歌集》[[18]](#_18_3)之后。有人说，这是日本人独有的而不是外来的审美意识趋于成熟的结果。

然而，即使是在中国，梅花也不是作为美的化身来歌颂的。梅虽然出现在作为最古老的民歌总集《诗经》当中，但其中咏赞的不是梅花而是梅子。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这是一首年轻女子向年轻男子求爱的诗，虽然略带挑逗，但情真意切，令人回味无穷。在诗中女子不说梅的花美，而是说梅的果子好吃。

在古代，梅的果实是珍贵的可储存食品、调味品。因为人们用盐和梅调味，所以产生了“盐梅”一词。这个词在孔子编辑的《书经》和《礼记》上就已经出现。

在《三国志》中有这样一段故事。曹操带兵出征途中找不到有水的地方，士兵们都很口渴。于是曹操对士兵们说：“前面有一大片梅林。”士兵们听后，都不由自主地流出了口水，口渴得到了缓解。所谓梅原本就是这样一种植物。樱花也是如此，人们最初关心的主要是樱桃。

人们开始想在诗歌中颂扬一下花的美丽，是在生活宽裕之后。

古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荣辱是指荣耀和耻辱，最终是个审美观的问题。现在已经是个衣食非常充足的时代，所以，将来定会出现知荣辱、唱美好、净化身边风气的社会。这绝对不是开玩笑，而是我对时代潮流的真实预言。

## 端午

今年的端午（阴历五月初五）是6月8日。

从“端午”这个词就可以知道，它是“最初的午日”之意。在古代，五月最初的午日要举行祭祀活动，后来，祭祀活动逐渐与午日无关，固定在五月初五。

“五”这个数代表势力强盛，正如“午”也表示太阳在头的正上方一样，如果它们组合在一起，恐有太过强盛不能抑制之嫌。因此，自古以来，五月的第一个午日都被视为恶日。听说以前在这一天出生的婴儿，一直都有将其先丢弃再捡回的习俗。

因为五月初五是个令人恐怖的恶日，所以这一天要举行盛大的驱鬼避邪活动，请金时[[19]](#_19_3)先生、钟馗先生驱除恶魔。因为端午是天气转向炎热时的季节变化节点，所以必须注意健康。除了驱邪，也服草药袪毒，喝菖蒲酒、洗菖蒲浴就是受其影响而保留下来的习俗。

还有一种说法是，五月初五是楚国爱国诗人屈原自杀的日子。公元前3世纪，屈原受到奸臣们的陷害，被流放到江南。他徘徊于山野之间，对楚国的前途感到绝望，于是纵身跳入江中而死。

人们为了安抚屈原那含恨而死的灵魂，在他去世的那一天往江水中投放供品。

有人在梦里见到屈原，屈原告诉他：“好不容易给我的供品，在半道被恶龙夺走了。恶龙害怕竹子和五色线。”

于是，人们就把米装在竹筒和竹叶里，并将它用五色线系好投入江中。这就是棕子的起源。它与日本的“鲤鱼旗”也有关系，因为“鲤鱼旗”就是五色飘带的一种变形。

## 野生

听说野生骆驼濒临灭绝。虽然偶尔有些骆驼看上去像是野生的，但仔细一查，实际上却是从饲养的骆驼群中逃出去的“性情怪僻”者。

1000多年之前，中国唐代茶圣陆羽[[20]](#_20_1)写了一部《茶经》[[21]](#_21_1)，是在茶叶领域第一流的古典专著，上面写道茶叶还是野生的好。但是现在野生的茶叶几乎难觅踪迹。

“岩茶”作为福建武夷山中出产的一种乌龙茶，顾名思义，其茶树生长在山岩中间，所以给人的感觉好像是野生的。但是，岩茶竟是确切无疑的栽培茶。

1987年，我听说云南省少数民族聚居区西双版纳有野生的古茶树，就飞到那里。确实那里有棵被人称为“茶树王”的茶树，树龄达800年之久。据说，比这棵茶树王更古老的野生茶树还有一棵，只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以现在的道路条件，旅行者不易到达。

都说“茶树王”的树龄是800年，所以我想当然地以为它是野生的。然而，当我看了中国茶叶协会主办的机关刊物后才知道，这“茶树王”实际上也是栽培树。据该刊物介绍，由于某种原因茶园被置弃，虽然周围的茶树消失了，但只有这棵茶树存活下来。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这一事例就又与刚才所说的假野生骆驼一样了。

谈到人们在生活中所利用的生物，其野生品种越来越稀少，有些生物竟需要敲锣打鼓来寻找了。将来饲养或养殖的东西大量增加，野生的变为少数，不久仍会有某种生物销声匿迹吧。

这种情况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在宇宙的某个星球上，观察着地球一切的宇宙人也许在说：

——最近野生物种变少，地球上的人类也会觉得无聊吧。

## 医食同源

人们经常说“医食同源”，因为“食”维持人的生命，所以基本上与“医”是同样重要的。神话传说中远古神农氏尝遍百草，才得以产生了医药。我想他在尝百草时，未必是把能否治病作为标准，可能还是先考虑是否好吃。

中国人围着饭桌吃饭时，经常把“这对什么有效”之类的话题挂在嘴边，如将干鲍鱼切成薄片做成汤对眼睛有好处等。我在香港的中药店还真亲眼看到过这种情景。有人把日本五岛列岛出产的干鲍鱼当成药材，在秤上称完重后，以很高的价钱卖了出去。我还经常听人说，干贝对治疗高血压有效，百合根对治疗神经衰弱管用等。中国人认为缺啥补啥，例如，人的心脏不好就吃牛或猪等动物的心脏，肝脏不好就吃动物的肝脏等，给人的感觉是这种方法直截了当。

《三国志》中的英雄们都吃什么呢？详细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在《三国志》中有个“置酒高会”的说法。在那个年代，地上铺着毯子之类的东西，人坐在上面，所需食物好像就放在人的近前。这种情形好像有点煞风景。“食床”“餐床”相当于日本人所说的“御膳”（饭桌），这些词汇是在唐朝末期出现的。座椅和餐桌的普及是在宋代以后。所以，如果按我们的常识来想象当时三国时期的一些情景，那么恐怕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差距。

在现在的中国，吃猪肉比吃牛肉更普遍，但我感觉在三国时期，牛肉处在更优先的位置。

曹操是个现实主义者，有关他流传着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荆州之主刘表有一头重千斤的公牛，它吃的草料和豆子是普通牛的十倍。但是，由于块头过大，动作迟钝，它搬运东西不及一头普通的牛。刘表一直以拥有这头牛为自豪。曹操进攻荆州时，俘获了这头牛。然后他马上让人把牛杀掉，用以招待士兵。这头牛块头大但不能干活，把它杀掉吃了是最好的处置办法。这个故事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曹操的现实主义。到了东晋，听说被人们誉为书圣的王羲之，在年轻时并不特别引人注目。有一次，他在宴会上坐了末席，宴会的主人亲自为他切了一块牛心炙，从而引起了众人关注。因为当时牛心炙被认为是只有主人才有资格享用的食物，而坐在末席的年轻人却毫不畏惧地把它吃了。这小子肯定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从此以后，人们看王羲之的眼神就与过去不同了。这是《世说新语》记载的故事。

《水浒传》中常有英雄豪杰们吃饭用餐的场面。这时，牛肉就频繁出现了。打虎英雄武松也是一进酒店，就先要酒，然后说：“切二三斤熟牛肉来。”

牛肉跟猪肉相比，似乎前者更与英雄豪杰的气质相匹配。据说，牛的筋腱有健脾养胃的功效，筋腱熬煮后其汤是胶质的，然后将其凝固，这样制成的东西叫“霞天胶”。这种“霞天胶”作为药品从明代起就非常有名。还有说法称牛肚促进消化，牛肝利于治疗贫血等。

东汉时期的最大名医叫华佗。他不仅在那个时代，在历代都是中国名医的代表。在中国他的名声非常大，以至于所有著名的处方都被认为是华佗发明的。在《三国演义》中，华佗为负伤的关羽做手术救了关羽一命。但当华佗想通过手术的办法来治疗曹操的头痛病时，曹操却认为华佗想趁机杀害他，便将华佗关押致死。

关于华佗给关羽做手术一事，人们没有找到任何根据，但他被曹操投入监狱致死一事却是事实。华佗是沛国谯县人，是曹操的同乡。他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自由职业者，不愿意做官。因为他是天下名医，所以曹操把他召来，留在身边。但他随意回家，说是妻子有病，并且一去不归。当曹操根据当地官员的报告，得知华佗妻子有病是假时，勃然大怒，根本不听荀彧（《三国演义》中是贾诩）的劝阻，就把华佗逮捕判刑了。据说华佗虽年近百岁，却容貌如壮年。

华佗用来调制的药材虽然仅有几种，但听说具有神奇的功效。据说日本人过正月（新年）时必喝的屠苏酒就是使用华佗的配方做成的。这种说法虽然没有确切的根据，但人们还是觉得那是华佗调制的配方。

中国古代的不少风俗在现代中国已经消失，但有些风俗传到日本后却仍然保留至今。正月喝屠苏酒的习俗就是其中之一。屠苏酒是将肉桂、花椒、白术、桔梗等十几种药材按比例调和在一起而制成的药酒。据说喝屠苏酒，是从日本嵯峨天皇[[22]](#_22_1)的弘仁二年（811）在宫中开始的。因为这是空海[[23]](#_23_1)回到日本不久后出现的事，所以大概是空海传过来的。在中国，喝屠苏酒的风俗几乎看不到了。但是，以相同的药材为原料而熬制的鸡肉汤或猪肉汤，被当作“健康食品”传播开来。也就是说，医食同源的传统还是被人们绵延不断地继承了下来。

## 八珍主人

《论语》对中国人来说是就像《圣经》，是生活在春秋时期的孔子的语录，其中还包含一部分孔子弟子的言论。《论语》中也有涉及食物方面的内容。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粮食越精越好，切的肉条越细越好。对日本来说，米饭当然是做得越白越好，刺身当然是切得越细越好。

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

食物变质馊臭，鱼肉腐烂，就不要吃了。这是理所当然的。

色恶不食；恶臭不食；失饪不食。

“饪”的意思是把食物煮到松软为止。色泽难看，不吃；气味难闻，不吃，火候不当，不吃。

《论语》虽然讲的都是一些通俗易懂的道理，但在春秋时代，可能就得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些东西。

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

非季节性的东西不吃，这也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但是，在“切得不合刀法便不吃”这一点上，多少也体现了孔子的个性。

不得其酱不食。

其实，我想引用的正是这句话，只是在前文做了不少铺垫。

所谓“酱”指的是调料。据说当时的酱，其制作方法是先把干肉块剁碎，再把它跟麹和盐混合搅拌，最后用酒浸泡并密封在瓮中。另外一种做法是，先让豆和麦发酵，然后加盐，最后把它攥干。不论哪一种制作方法，酱都是一种进餐时的调味品。孔子说，没有合适的调味酱，不吃。由此可见，孔子对味道是相当挑剔的。

酱是调料汁，醢是肉酱。在过去，边吃饭边吃肉酱被人们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吃西餐时虽然饭桌上放着盐和胡椒瓶，但西方人一般认为，最好还是不要随便往菜里加盐或胡椒，尤其是当你被邀请到别人家吃饭的时候。因为如果你随便往菜里加盐或胡椒，可能会让主人觉得你对人家精心准备的菜肴不满，是嫌菜的味道淡。春秋时代，吃饭时不能随便吃肉酱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礼记》是记载春秋时代礼制方面的著作，上面写有这样一段话：

客啜醢，主人辞以窭。

意思是说如果客人吃了肉酱，主人必以“窭”（贫穷）为理由进行道歉。主人会向客人致歉说，因为家里穷，连盐也买不起，请您原谅等。实际上，丢丑的当然是吃了肉酱的客人。

酱的别称叫八珍主人。八珍是指八种珍贵食品。因为酱是这些珍贵食品的主人，所以它具有左右味道的强大力量。

中华料理的餐桌上必放酱油和醋。在日本，醋是接近透明的黄色，一眼就能认出。但中国的醋和酱油基本是相同的颜色，所以要特别注意。西方餐桌上的盐和胡椒，在容器上都写着“S”“P”等首字字母。与此相同，通常在中国餐桌上的容器上也写着“酱”“醋”这样的文字，请不要弄混。

虽然酱和醋摆放在一起，但实际上酱的重要性远远大于醋。有一本叫《清异录》[[24]](#_24_1)的书上说，如果厌弃酱，对厨师来说是“大耗”（大损失），如果厌弃醋是“小耗”（小损失）。因此人们才说酱是八珍主人。

八珍在《礼记》上列的是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捣珍、渍、熬、肝膋。其烹调方法也有记载，这里仅举炮豚一例，让我们了解一下它的烹饪方法。

刲之刳之，实枣于其腹中，编萑以苴之，涂之以谨涂。炮之。

读到这里，通过原文大体能够理解是什么意思。接下来的内容，因有很多难认的汉字，所以我把大致内容意译一下：等到泥巴烤干，将泥巴剥掉，然后把手洗净，把皮肉表面上的一层薄膜搓掉。再取来稻米粉，加水拌成稀粥，敷在猪肉身上，放在小鼎中用油来煎，小鼎中的油一定要淹过猪肉。然后在大锅中烧开水，将盛有肉的小鼎置于锅内，注意不要让水面超过小鼎的高度，以免进水。

三日三夜毋绝火。

《礼记》是这样记载的，炮豚的烹制得花费三天时间，这是一项需要耐力的工作。

八珍之一的“炮牂”，其烹调法与上述方法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在于材料，是羊不是猪。

另外，有时八珍这个词语也指牛、羊、麋、鹿、豕（猪）、狗、狼、熊这八种食用动物。

让我们回到《论语》中的下一句话：

肉虽多，不使胜食气。

这句话是说，吃肉的量不要超过米饭的量。必须注意不要把主食和副食的主次地位颠倒。这句话的后面是“唯酒无量，不及乱。”因为个人的酒量有差别，所以在量上没有特别限制，以不捣乱为原则。说的还是理所当然的道理。

## 树的果实及腊八粥

最近，由于冷冻食品和荔枝罐头的进口，在日本也能品尝到这些南方水果了。过去那些受区域限制、受季节限制、容易腐烂的水果，在离物产地稍远的地方人们是无法吃到的。通常，虽然听说某个东西好吃，但最终也只能望洋兴叹，在幻想中品味。杨贵妃能从那么远的地方吃到荔枝？人们是把她的故事作为表现奢侈的典型代表而津津乐道的。

——我想尝尝荔枝，并且要新鲜的、好吃的。

听到杨贵妃的央求，唐玄宗马上命人用快马从南方把荔枝运了过来。荔枝是产于福建、广东、广西等南方地区的水果，好像在四川的一部分地区也有出产。总之，荔枝的产地离首都长安非常遥远。

玄宗为了讨杨贵妃的欢心，命令使用超级快马运输。听说从广东仅用七天就到了长安，荔枝的新鲜度还属上乘。在唐代从广东到长安只用七天，那是难以想象的快速。当时快马要跑到筋疲力尽，被替换下来后要由沿途的民众负责照顾，但仍有大量的马匹跑死，民众生活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这是仅为获取一个美人的欢心所付出的代价。因此，国家发生动乱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久，安禄山之乱爆发了。安禄山深知人民对唐王朝怀有巨大不满，所以他起兵叛乱。

荔枝在长安是珍贵的食品，但在原产地，有时它却多得无法处理。宋朝的苏东坡被贬到福建、广东、海南。被贬应该是件令人感到悲伤的事，但他却高兴地说自己也因此饱餐了荔枝。我们不知他是真高兴，还是不服输，大概是他要尽量保持一个乐观的人生观吧。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以上是苏东坡以“食荔枝”为题的诗句。诗句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一天能吃三百颗荔枝，所以保持这种状态一直做个岭南人也挺好。

诗的题目是“食”，而诗里用的是“啖”字。“啖”是口字旁加个“炎”字，与“食”相比，语义差别表现在“贪婪”上。根据文字学者的说法，“dan”这个音是鼓舌的拟声词，日语中的“健啖家”（健啖者‘饭量大，能吃’）、“啖呵を切る”（说话干脆，说话严厉）等说法给人一种豪迈勇敢的感觉。

苏东坡在这首诗中叙述了广东地区是“四时春”，是各种水果接连不断亮相登场的区域。作为例子，他提到一个水果是“芦橘”。“芦橘”就是枇杷，日语中也是用汉字音读音“rokitu”，英语把枇杷叫“loquat”，就是出自芦橘的粤语音译。

据说，枇杷在中国是止咳药，以“枇杷膏”为名的药在药店中出售，其主要成分是枇杷叶而不是枇杷籽。

提到药，在果实当中，银杏的果实白果，在中国非常有名。杏的果实称为杏仁，有镇静的作用，对支气管炎有疗效。传闻三国时期的吴国名医董奉给人治病，不取钱财，只是让重病得愈者种杏五株，轻病得愈者种杏一株。这样一来，董家的周围，不久就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杏林。从此之后，人们开始把名医称为杏林。在日本也有给医科大学冠以杏林的名称。

也有人经常把杏仁和大枣一起煎煮，制成祛痰止咳的药品。在中国，大枣自古就受到喜爱，尤其是砂糖浸泡过的大枣作为高级点心，在水果稀少的北方更是受到人们的青睐。在我家，每当过年做年糕时，都要在上面撒上一些大枣。因为过年是喜庆的日子，所以人们尽量选择红枣。有时也往粥里放大枣，大枣的作用是增加甜味。

腊八粥别名又叫“八宝粥”，可以解释为是由八种添加材料制成的，但其实与八种材料无关。它是指阴历十二月初八这一天，而不是指八种添加材料。

各家都做腊八粥，并把它分赠给亲戚朋友。也就是说，人们通过互相赠粥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腊八粥。想不到腊月初八那一天成了粥的品评会。每一家都在品评哪家做得好吃，哪家做得味儿浓，那家做得味儿淡等。因为大家都抱着不要丢丑的心理，所以制作时都精益求精，非常认真。以前，朝廷的腊八粥是在雍和宫制作的，听说那时要派大臣来监制，那阵势真够夸张的。

## 熊掌、驼峰

世上人们常把“熊掌、驼峰”作为珍品的代名词来使用。

熊掌——熊的手掌，前几年从中国进口时在报刊上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熊掌是价格不菲的珍品，到底是什么人在吃呢？这个问题虽然与自己无关，但我却莫名其妙地关心起来。这也是在报纸或杂志上读到的消息，据吃过熊掌的人说，熊掌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食物。用一句来说就是物以稀为贵。

驼峰，顾名思义就是骆驼背部隆起的山峰，也就是骆驼后背的肉瘤。这种东西我也没有吃过，但对于游牧民族及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骆驼并不是什么稀奇之物，而对于其他农耕民族来说，骆驼却是稀有之物。更何况，只吃驼峰，把其余部分全部扔掉简直是奢侈至极。这种奢侈的例子是被人记录在案的，事主是清末一位负责监督淮河（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大河）治水工程的官员。

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吃驼峰的，对此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驼峰曾出现在唐朝杜甫的诗里，因此，它在8世纪就应作为高级菜肴出现在餐桌上了。我没有吃过驼峰，据有关书籍上说，其味“干脆”似熊白。熊白是指熊胸部上面的白脂。熊白并不是任何时候在熊身上都有，而是在寒冷季节才有，在夏季它就消失了。像熊之类的冬眠动物，它们身上的细微结构也会根据季节的不同出现变化。

骆驼虽然不冬眠，但是它必须长时间不吃不喝地在沙漠中行走，所以体内需要储藏大量营养。这与冬眠动物是一样的。骆驼的营养储藏库就是驼峰。其证据是如果进行长期的艰苦旅行，驼峰就会逐渐消瘦，甚至有时会耷拉下来。

在秦始皇时代的初期，吕不韦编写了一部百科事典之类的书——《吕氏春秋》。其中列举了很多美味，并对美味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比如肉之美者、鱼之美者、菜之美者等。但是，驼峰、熊掌及熊白都未在该书上出现。吕不韦所列举的是猩猩之唇、獾獾之炙，甚至还有“旄象之约”之类的东西。

熊掌在比吕不韦早好几百年的孟子（前372—前298）时代就出现了。不，肯定在孟子之前就有了。

因为熊在冬眠时是通过舔手掌来获取营养的，所以熊掌大概也与驼峰一样是一个营养库。烹调熊掌需要高超的厨艺，清初的《养小录》[[25]](#_25_1)对此有过记载，已故的青木正儿[[26]](#_26_1)先生做了如下的翻译。

在地上挖个坑，填进半坑石灰，把熊掌放进去，上面再盖石灰，用凉水浇，等候石灰烧开，冷却再取出熊掌，上面的毛就连根去掉，洗净。在洗米水里浸一两天，用猪脂包起来煮，煮好后再去掉猪油撕成条，与猪肉一起炖。熊掌最难熟透，不熟透的吃了发涨，加椒盐末，和面裹着在饭锅上蒸十多次，才可以吃。

的确是非常复杂的烹饪方法，如果认真仔细地制作，据说得需要十天左右。

《孟子·告子篇》有下面一些内容：鱼是我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想要的，如果这两种东西不能同时都得到的话，那么我就只好放弃鱼而选取熊掌了。生命是我想要的，正义也是我想要的，如果这两样东西不能同时都具有的话，那么我就只好牺牲生命而选取正义了。

为了说明舍生取义的道理，孟子用鱼和熊掌做比喻。孟子有很多学生追随其左右，他的生活大概处于中等之上吧。我们不能设想他过着王侯贵族一样的生活，但尽管如此，他有时也能吃上熊掌。

春秋时代的楚成王（？—前626）立儿子商臣为太子。但后来，他想废掉商臣，立商臣异母弟子职为太子。因此，商臣发动政变包围了他父亲成王的宫殿。成王得知自己要被儿子杀掉，提出想吃熊掌。但是，商臣没有答应他。于是，楚成王感到万念俱灰就自杀了。

因为二人是父子关系，所以商臣至少应该让成王实现他的最后愿望。但是，成王也自有打算。虽然商臣通过奇袭包围了成王的宫殿，但过几天，成王一方的军队就会赶来，有望击败商臣的政变军队。因此，成王才提出吃熊掌的要求。如前所述，烹调熊掌需要几天时间。成王不是想吃熊掌，而是企图争取时间。商臣之所以拒绝自己父亲的要求，是因为他识破了父亲的诡计。

即使在春秋战国那充满血腥的历史中，商臣（楚穆王）弑父也是特别残忍的一幕。在那种场面里，熊掌竟然亮相了。

秦始皇是比那个时代晚400年出现的帝王。驼峰暂且不论，他肯定吃过熊掌。

注解：

[[1]](#_1_18)　“宰領”是日语词汇，意思是主管、监督。此处借用其汉字。

[[2]](#_2_10)　大膳是“大膳職”的简称，是古代日本按律令制所设立的官方机构，归宫内省管辖，负责宫中的饮食及宴会的安排等。

[[3]](#_3_8)　典膳是“内膳司”的次官，古代日本按律令制分别设立“大膳職”和“内膳司”两种官方机构，“内膳司”负责天皇的食膳安排。典膳为6人，负责给天皇做饭菜。

[[4]](#_4_6)　萨摩藩，又名鹿儿岛藩、岛津藩，日本江户时代的藩属地，位于九州西南部，领地包含今日的鹿儿岛县全域（含强取自琉球国的奄美群岛）与宫崎县的西南部。

[[5]](#_5_6)　岛津氏是日本的氏族之一。在镰仓时代到江户时代期间是大名，也是江户时代的萨摩藩藩主。家族全盛期时以萨摩国为中心统治南九州。初代当主岛津忠久是萨摩国、大隅国及日向国三国守护，亦出任越前国守护。

[[6]](#_6_6)　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日本名为三浦按针，1564—1620），英国航海家，1600年移居日本，并成为日本第一位外籍武士。他是第一位来到日本的英国人，曾做过德川家康的外交顾问。

[[7]](#_7_6)　德川吉宗（1684—1751），日本江户幕府第八代将军，1716—1745年在任。德川吉宗因为进行享保改革成功稳定了米价，百姓赠给他“米将军”的雅号，堪称幕府中兴的一代英主。

[[8]](#_8_6)　享保大饥荒为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发生的饥荒，是江户四大饥荒之一。享保十七年（1732）夏天，因为冷夏与害虫而导致西日本中国地方、四国地方、九州地方各地，尤其是瀬户内海沿岸一带严重歉收，饿死者超过12000人，250万人以上苦于饥饿。为汲取本次饥荒的教训，将军德川吉宗奖励栽培稻米以外的谷物，如番薯等。

[[9]](#_9_6)　茶坊主译称“茶童”，是江户时代武家的职名，在幕府及诸大名府邸中掌管茶具，侍奉茶道，兼司迎宾待客等杂役。

[[10]](#_10_6)　家老是日本江户时代幕府或藩中的职位。家老一般有数人，采取合议制管理幕府和领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在幕府或藩中地位仅次于幕府将军和藩主，作为大名的重臣，统帅家中的所有武士，总管家中一切事物。

[[11]](#_11_4)　调所广乡（1776—1849）是把萨摩藩从财政困难中拯救出来的逸才。其主导的财政改革虽然成效显著，但其中毕竟有不少违反幕府制度的问题。1849年，广乡在江户樱田的藩邸突然死去。一般被认为他是为了保护主君而自揽责任，服毒自杀的。

[[12]](#_12_4)　锁国是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实行的外交政策。于1633年颁布第一次锁国令开始，直到1854年美国海军军官培里率舰叩关为止。当初称为海禁，“锁国”这提法是由兰学者志筑忠雄在1801年提出。当然日本与外国的贸易关系并非完全中止，仅允许与特定对象进行，包括与荷兰人在长崎出岛进行贸易，而与明朝和清朝在长崎亦有贸易来往。此外对马藩与朝鲜、萨摩藩与琉球国及松前藩与虾夷有贸易关系。

[[13]](#_13_4)　越中国，属北陆道，即现在的富山县，古代越国一部分。天武天皇时代将其分为三国（越前、越中、越后）。大宝二年（702），以越国颈城、古志、鱼沼、蒲原四郡独立为国。明治四年废藩置县后，与新川县合并为石川县，明治十六年再独立为富山县。

[[14]](#_14_4)　“佃煮”，译为甜烹海带，是将海藻类或鱼介类用酱油、甜料酒、砂糖等红烧而成的一种可保存食品。

[[15]](#_15_4)　西乡隆盛（1827—1877），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幕末）的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明治维新的领导人。他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三人并称为“维新三杰”，是近代日本主要缔造者。1877年，被旧萨摩藩士族推为首领，发动反政府的武装叛乱，史称西南战争。9月兵败，死于鹿儿岛城山。

[[16]](#_16_2)　大久保利通（1830—1878），生于日本萨摩藩（今鹿儿岛），原为武士，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政治家，号称“东洋的俾斯麦”。为了改革翻云覆雨，铁血无情，不论敌友，挡在他前进道路上的只能是灰飞烟灭。他最后被民权志士刺杀身亡，但也成就了明治维新的成功。

[[17]](#_17_2)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相当于中国的《诗经》。所收诗歌为自4世纪至8世纪中叶的长短和歌，成书年代和编者，历来众说纷纭，但多数为奈良年间（710—794）的作品。一般认为《万叶集》经多年、多人编选传承，约在8世纪后半叶由大伴家持（717—785）完成。

[[18]](#_18_2)　《古今和歌集》是日本平安朝初期（10世纪初）由纪贯之、纪友则、凡河内躬恒、壬生忠岑共同编选而成。歌集共20卷，收录1100首和歌。

[[19]](#_19_2)　金时，又叫坂田金时，即金太郎。源赖光麾下四天王之一。他的由来主要记录在《今昔物语集》中。在《古今著闻集》中金时在源赖光的带领下，同其他三天王一起消灭鬼患。

[[20]](#_20)　陆羽（733—804），字鸿渐，唐朝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一名疾，字季疵，号竞陵子、桑苎翁、东冈子，又号“茶山御史”。一生嗜茶，精于茶道，以著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闻名于世，对中国茶业和世界茶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

[[21]](#_21)　《茶经》是唐代和唐以前有关茶叶的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是陆羽躬身实践，笃行不倦，取得茶叶生产和制作的第一手资料，又遍稽群书，广采博收茶家采制经验的结晶。

[[22]](#_22)　嵯峨天皇（786—842），日本的第52代天皇，809—823年在位。他热衷汉学，诗赋、书法、音律都有相当的造诣。他的书法还有“天下三笔”的美称。嵯峨天皇还在国内大力推行“唐化”，从礼仪、服饰、殿堂建筑一直到生活方式都模仿得惟妙惟肖。

[[23]](#_23)　空海（774—835），俗名佐伯真鱼，灌顶名号遍照金刚，谥号弘法大师，日本佛教真言宗创始人。于804年到达中国，并在长安学习密宗；806年回国，创立佛教真言宗（又称“东密”）。著有《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等书，保存了不少中国文学和语言学资料。

[[24]](#_24)　《清异录》二卷，北宋陶谷著，是古代汉族文言琐事小说。作为重要笔记，保存了汉族文化史和社会史方面的很多重要史料。书中一半以上的条目分别被《辞源》和《汉语大词典》采录，其价值可见一斑。

[[25]](#_25)　《养小录》是清代顾仲编著的饮食著作，共三卷，成书年代约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全书分“饮之属”“酱之属”“饵之属”“蔬之属”“餐芳谱”“果之属”“嘉肴篇”七部分。书中记载了饮料、调料、蔬菜、糕点菜肴190多种，以浙江风味为主，兼收中原及北方风味。该书曾经是一本颇有影响的饮食著作。

[[26]](#_26)　青木正儿（1887—1964）是日本著名汉学家、文学博士，国立山口大学教授、日本学士院会员、日本中国学会会员、中国文学戏剧研究家。著有《青木正儿全集》（10卷）、《中华名物考》等。

# 第五部分

## 与殷墟相匹敌的夏墟

人们都说中国的神话难以理清头绪，大量关于王朝兴衰更替的传说掺杂其中，矛盾之处很多。这个“矛盾”也是韩非在谴责儒家所奉信的圣人传说时创造出来的一个词汇。司马迁也在《史记》中把“伏羲”“女娲”“神农”（三皇）排除，从三皇之后的黄帝写起。黄帝是传说中的汉民族祖先，到了异族政权的清王朝也受到崇拜。黄帝及其子孙颛顼、帝喾，再加上尧和舜，被称为五帝。其中，舜是接受尧的禅让而登上帝位的。

闻一多，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在昆明被暗杀的文学家认为，三皇并不比五帝早，关于三皇的传说是添加了其他民族的神话。我赞同这个观点。在五帝中，舜的真实性最为可靠。我认为，可能是为了把这位建立功勋的舜塑造成圣明天子而编造出另外四人的故事。舜让位于作为臣下的禹，禹开辟了最初的王朝——夏。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夏确实存在的证据。

直到20世纪初，夏之后的殷商也被认为是虚构的王朝。白鸟库古[[1]](#_1_21)博士曾经断定《史记》上的殷王名字是根据阴阳五行说创作出来的。但是，从河南省安阳县出土了大量的甲骨片，上面所刻的文字与《史记》上的记载相一致。因此确认了殷商的存在。

商为了取得作为当时货币的贝壳，对沿岸各国发动了战争。文王和姜子牙所率领的周，趁机扩张势力，不久在武王的率领下把商消灭了。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商的最后一个国王——纣王对祭祀天地和祖先怠慢，施行了“酒池肉林”等恶政。但是从甲骨文上我们了解到，纣王祭祀祖先的规模很大，并废止了把活人作为祭品的行为。纣王那些所谓的“恶行”也许是周为了编造消灭主君的借口而捏造出来的。

周把前朝人分散到各处，还把小国——宋（河南省商丘县）封给他们，以便让他们祭祀祖先。他们发挥通晓各国情况的特长，开始从事商业活动。日本根据商朝最后国都的地名称呼此时代为殷，但在中国一般称为“商”。商人这个词就是从这里来的。

正如“守株待兔”的蠢人及死守“宋襄之仁”的宋襄公都被说成是宋国人一样，宋国人作为亡国之民常常遭到蔑视和嘲笑。但是，他们的活动却是形成统一国家的潜在力量，他们在思想方面也产生了领导者。

孔子和墨子都出身于宋国，前者是儒家的始祖，后者是墨家的创始人。孔子作为殡葬和祭祀方面的专家，墨子作为技术工作者，都不停地在各地行走，扩展视野，增长见识，发展思想。

可以说没有商人的到处流浪，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文明。正如柳田国男[[2]](#_2_13)在《海上之路》[[3]](#_3_11)所论述的那样，如果商人经由冲绳带给日本农耕技术的证据被发现，那么可以说现在的日本经济繁荣就来自于他们。

冲绳人经常问我，为什么不在《琉球之风》[[4]](#_4_9)上写一些辉煌时期的事。但是，琉球舞蹈和红型染[[5]](#_5_9)是在萨摩入侵之后定型的。作为现代政治基础的希腊城邦制度及作为宗教基础的摩西十诫，都是在当地民众被驱逐到异国他乡的条件下形成的。因此，我们是在享受着失败者的恩惠。

可以说，夏商周时期是多种文化和个性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最后归结于统一的时期。商持续了五六百年，即便夏在商之前确实存在过，也许只能出土一些原始性的遗迹。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夏直到商建立之初，都与商并立于世。如果事实真是那样，我们或许会发现一个辉煌的“夏墟”，而它可以与被人们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发现的殷墟相匹敌。

## 未被写进历史的海边风景

说到“未被写进历史的海边风景”，可能有人会心生疑问，未被写进历史去的东西怎么会知道呢？

例如，如果我们发现了公元前2000年的遗址，那么，我们会大致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其次，如果我们已经发现了公元前1200年的遗址，那么我们也会对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有所了解。可能有人会说，二者之间有800年的空档，对那一段的事情我们无法了解。但是，虽然有些情况我们的确不清楚，还是有线索的。在那800年间人们也一直生存生活着，所以，在对2000年前与1200年前进行比较时，只要对各种情况进行合理推理，中国那段历史就会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公元前1050年左右，商王朝灭亡了。它是一个延续了五六百年的王朝，因为最初它是在“商”地建立的政权，所以叫“商王朝”。后来，由于商王朝不断迁都，最后的200多年，它的首都是在“殷”地，所以司马迁称它为“殷王朝”。在日本，大多仍然将它称为殷。

商的遗址是在20世纪初被发现的，从王墓中出土了许多装饰品，其装饰品的绝大部分是由宝贝做成的。今天我们还在使用的汉字，其原型就是商人发明创造的。在汉字中表示财产关系的词汇都带“贝”字，例如，财产的“财”、赠品的“赠”、货物的“货”。“宝”字，如用繁体字“寳”来书写也有“貝”字。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在商朝“贝”是通行的货币。

从遗址中出土的宝贝是一种贝壳。这种贝壳几乎在朝鲜半岛、中国以至马来半岛的大陆沿岸都无法获取。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宝。那么，当时所使用的大量贝壳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种宝贝在琉球的宫古岛附近可以大量获取。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商虽然位于遥远的内陆，却以宫古岛所产的贝壳为流通货币。二者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一情况，尚未找到相关记载。

但是，当然我们能够推测得到有人来取过贝壳。我的推测是，某个人漂流到宫古岛，或许他在打鱼时捡到了美丽的贝壳，于是就带了回去。从此那种贝壳就成为了不起的宝物。在几百年间，那种贝壳变成了货币。当宝物成为货币后，宫古岛就有驻外工作人员开始居住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设想，如果大陆方面说“送一吨贝壳过来”，岛上肯定有人会准备好货物给对方送去。柳田国男先生说，那些驻岛人可能就是日本人的先祖。柳田先生是一位学者，他拼命思考日本人到底是谁的问题。最后，他把目光投向大海，写成了《海上之路》一书。

在柳田国男的《海上之路》中有下面一段内容：

中国的至宝是宝贝。其中，带有黄色光泽的两种子安贝是人们渴望得到的宝中之宝。现在这种贝壳的产地也极其有限。在远东方向有一片群岛，在群岛周边的珊瑚礁上出产这种贝壳。除此之外，在中国大陆附近的海岸上根本找不到这种贝壳。

跳过几段，又有这样的叙述：

支撑商王朝进入中原的背后势力在东方。现在基本上已经弄清楚的是在所谓东夷的海上经营中，有一大部分是供应宝贝。

商建立王朝是因为它有强大的经济力，其经济力的根本在于宝贝。这个“东夷”的“夷”字，是指有“蹲”这种习惯的族群。

有一位叫傅斯年的中国著名学者，提出了“夷夏东西说”[[6]](#_6_9)。他说东夷有可能就是商。他认为，因为商靠近海岸地区，所以能获得宫古岛上的贝壳，不久它有了实力就逐渐西进，最终在中原建立了王朝。柳田先生这样写道：

东夷表现活跃，将其影响逐渐波及中原。在那个时期，人们重视宝贝、渴望得到宝贝的欲望几乎达到了顶点。而那样一个时期也正是一小群日本人的始祖们，在远东群岛中的某个小岛上留下足迹的时期。

也就是说，如果商王朝在中国的建立是由于宫古岛的宝贝为其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撑，那么当时我们日本人的祖先就是从中国大陆来到这里定居的。这就是柳田先生的所谓天才想象。要问有什么证据呢？历史上没有写，什么也没有。他只是根据发掘出来的商的遗迹和文字而进行分析。例如，贝壳原来是宝，那种贝壳原来在中国大陆没有，而在宫古岛木有等。柳田先生的主张不过是从这些关系出发类推出来的结论而已。

接下来，我要谈的是日本人从何而来，尽管这个问题多少有点奇怪。但我认为，如果贝壳一直作为货币保持不变，日本也就不会出现。正因为贝壳与中国断绝了关系，日本才会形成。要问为什么断绝了关系，那是因为贝壳被铜所替代，失去了作为货币的地位。

现在我们仍然在使用铜币，这好像是东方的技术。殷商时期，青铜器已经被制作出来。它逐渐变成了货币，以前还是十个宝贝换一头猪，但现在是十把青铜菜刀可买一头猪。但是，菜刀太重不易携带，为了携带方便，人们就把菜刀变小，使之作为货币使用了。尽管如此，据说刀币仍不方便，因此就产生了铜币。

铜币开始普及之后，不再需要贝壳了，所以商与采贝者之间的联系就中断了。那些采贝人仍旧留在原地，成为日本人的祖先，于是日本诞生了。类似这样的解释并不是不可能的。

再引用一段柳田国男先生的话：

商对宝贝的需求没有那么强烈了，商人赌上身家性命，甚至勇闯波涛巨浪去追寻宝贝的那种热情也就没有了。这是比徐福的浪漫故事更久远的往事。商人把那个出产宝贝的岛屿叫作“我之岛”，如果留在岛上的人们安心居住下来，那么，不久他们就会感到生产用地不够。于是，他们就物色容易去的邻近岛屿。这种行为与地平线之外的冒险根本不同。

这些居留者原本是商朝人，虽然在大陆时他们或许是渔民，但在家乡附近看过别人怎样种植水稻，他们自然也掌握了种植水稻的技术。在他们定居宫古岛之后，开始种水稻。这样一来，生产用地就不够用了，于是他们就在附近物色容易去的岛屿。这些行为是在琉球周围的岛屿中进行的，所以当然不是什么地平线之外的冒险。他们是带着“那边有岛去看看吧”的心理去的，结果到了那个岛之后又看见了另外的岛，于是他们就又到另外的岛去。所以，这绝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冒险。

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生活要求是找到适合种植水稻的土地。那些岛屿上适合种植水稻的土地太少了，在珊瑚礁上的陆地种植水稻更是不适合。就这样，在到处物色岛屿的过程中，他们来到了九州。这里有可以种植水稻的平地，所以他们就安顿了下来。柳田先生说，这些人可能就是日本人的始祖。虽然这些内容在历史上没有写，但是如果我们把日本与商王朝、宫古岛、贝壳等事实串联起来进行思考的话，会自然而然地得出上述结论。可以说，这就是3000年前消亡的商王朝与日本之间的关系。

商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是纣王，他在历史上被写成一个非常残暴的人。历史书上所写的全是纣王所做的坏事，比如纣王侮辱了鬼神，没有比纣王更可恶的国王等。推翻商王朝的是周。因为周原来是商下面的诸侯，所以，那是所谓诸侯消灭主君的犯上作乱。为了避免被人们认为是犯上作乱就必须寻找充足的理由，必须编造有利于自己的借口，比如纣王残暴、人民痛苦，所以才要推翻他等理由。商王朝的历史是周写的。

仅写在历史书上的东西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正如文章的开头所说，商的遗址被人们发掘出来，出土了大量的甲骨骨片。原来商人无论做什么都要向天或始祖占卜。他们在占卜时，主要是用牛的肩胛骨，先在肩胛骨的上边开个洞，然后用火烤。这时，肩胛骨上会出现裂纹。于是，占卜师会参考那个裂纹，将要占卜的事情刻在那个甲骨片上。这就是文字的起源。文字，人们常说是写出来的，其实它是最早刻出来的。

读那些甲骨文，我们了解到上面记录着各种各样的事情。给人的感觉是，纣王不仅没有侮辱鬼神，反而比他父亲在位时更频繁地祭祀鬼神，因此在国力、财力衰弱的时候，他被周打败了。由于这些甲骨片的出土，在3000年之后，纣王的无辜才终于得以证明。历史这种东西是胜利者写的，对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商王朝灭亡后，历史进入了周王朝的统治时期。因为周王朝担心商人会团结起来对周报仇，所以就把他们分散到各地，主要转移到宋这个国家。商人的文化程度非常高，他们毕竟是发明了文字的民族，他们利用被分散到各地的机会，通过做法事等把亲戚们召集在一起，互相交换各地的信息。例如，此处粮食便宜，彼处粮食贵，那么，就将此处的粮食拿到彼处去卖，他们就这样做起了买卖。这种活动就是商业。

殷是从商地兴起的，商自迁都之后200年间一直以殷作为首都，所以大家又称商为殷。

孔子的祖籍是宋国，指责儒家的墨子也是宋国人，如果溯本求源，他们应该都是商人。所以，我认为虽然商人作为亡国之民被周驱赶到宋国，受人歧视，但他们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承载者。正是因为这些人奋发有为，春秋战国时代才迎来了思想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黄金时期。这场文化运动，撬动了停滞不前的中国，使人们在思想上、经济上都活跃起来。

柳田先生所说的“比徐福的浪漫故事更早的故事”发生之时，即春秋时代的末期，吴越之战爆发了。吴在今天的上海附近，苏州是吴的首都。越在浙江省会稽、绍兴附近。所谓吴和越以前在历史上并未出现过。有一个叫吴寿梦的吴王突然出现在《史记》上，有关他与越打仗的事迹倒是记载许多。越国也是如此。虽然我们知道越王勾践之前的王是允常，但允常之前的王，连名字都未留下。吴越双方都是突然在历史上出现。在记录者的角度看来，他们是突然冒出来的。

我不知道那时的吴和越到底是什么民族，但他们文身，梳短发。我认为是因为他们在大海中潜水长发不方便的缘故。他们的风俗是与《魏史·倭人传》里出现的日本风俗一样的。潜入水中捞鲍鱼是当时吴越人常做的事。在《倭人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倭，即日本人说自己是吴太伯的子孙。江户时代的儒家学者新井白石[[7]](#_7_9)曾经写到：“听说那些后来者说‘我们是吴太伯的子孙’。”当时，吴越人的风俗和日本人的非常相似，简直毫无二致。

冈正雄[[8]](#_8_9)先生一直主张“日本人是吴越人”，原因是种稻和捕捞。也就是说，日本人和吴越人都是种稻之民与渔民的结合。另外，双方在潜水捕鱼时，都有类似的潜水法，且都是在河里划着木筏，用鱼鹰捕鱼。可以说，这些作业方法，在日本人和吴越人中几乎完全一样。

宫本常一[[9]](#_9_9)先生对冈先生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他在《日本文化的形成》一书中写道：“还是吴越是日本人的始祖。”

吴和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如果过着同样的生活，又相邻而居的话，就像兄弟吵架有时会比跟别人吵架更激烈一样，吴越之间也常有战争发生。因此，我们还是对吴和越不做太多的区分为好。

例如，吴聚集在靠近长江的一侧，所以比较而言，它更趋向内陆；越面向大海，所以它趋向海外。这样说来，日本反倒更接近越。越在现在的浙江省附近。在中国的广东和浙江地区吃生鱼片，这一点也与日本相似。另外，人们都说当时的吴越语可能就是南岛语。也就是说，所谓越并不仅指浙江省，相邻的福建、广东都称越，越南也是越的南边的一个部分。

所以，当有人问越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还真不好回答。因为在吴越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北方才逐渐地把目光投向南方，终于将吴越的一些情况写在了历史书上。所以，在历史书上，吴越看起来好像是突然出现的，但实际上他们一直都生活在那里。虽然我们对吴越人的记录、文字等还一无所知，但知道他们拥有锻造刀剑、造船等方面的高超技艺。

北方人盛行做记录。因此看起来好像北方人很伟大，但是越王勾践的剑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中国文物展在日本举办的时候，展示了越王勾践的剑。虽然那把剑2000多年一直被深埋于地下，但出土后仍然锋利。它有非常锋利的剑刃，刃上带有格子花纹。听说用现在的技术还不能造出这样的剑，而当时越国就具备了那样的先进技术。

也许历史学家听了我的推测会不高兴，但我还是认为这个叫越的民族可能就是商。刚才说过，商灭亡的时候，它的人民被迫分散到各地。我认为其中的一支可能来到了山东半岛附近。然后，他们又从山东半岛一直南下到南方，住在海岸线边，最后形成了越。

商的灭亡是在公元前1050年左右，而越的灭亡是在公元前473年。这期间，大约有600年没有任何记载。商原来就在南方，且人们住在“高床式”[[10]](#_10_9)里。越（夷）也是如此。另外，商人和越人都习惯蹲着、不使屁股紧贴地面等。这些习俗都说明商和越出自同一族系。来宫古岛采集宝贝，也是从越地出发较为便利。因此，我认为，所谓吴越可能就是拥有高度发达文化的商人一支。

越王勾践的臣下有一个著名参谋叫范蠡。他在越灭掉吴之后去了山东半岛。他对勾践的评价是：“越王勾践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乐。”范蠡认为，勾践在被吴国打败准备报仇时，是一个可以共事的人；但吴灭亡后，他却是一个独享其乐的人。于是，范蠡逃跑了。我认为范蠡之所以逃到山东半岛，是因为在那一带的沿海上有与越民相同的人。据说，范蠡后来成为一个大富翁。刚才提到了徐福这个人，他就是从山东半岛来到日本的。

我认为，徐福是在公元前219年由秦始皇出资来到日本的。他先欺骗秦始皇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只要出钱我就能给你取来。”接着他又说，如果不把三千童男童女和百工，也就是技术人员及五谷的种子带过去，对方就不会交出那长生不老药。就这样，他同三千童男童女和百工一起集体移民到了日本。

虽然日本的多数人以为徐福来日本这件事是传说，但这根本不是什么传说，而是事实。有一位在徐福来日本20年之后出生的人，写了一本叫《淮南子》的书，上面记载了徐福来日本的这件事。在中国有人认为，这个徐福可能就是日本人的始祖。但是，我认为从商王朝时留居宫古岛的人才是日本人的始祖。

## 南之路

众所周知，纸的发明是在公元100年左右。中国有个叫蔡伦的人，他将树皮和碎布在水中过滤后造出了纸张。对此，虽然存在着很多异议，但目前为止，这一说法大体上已成为定论。

但是，这纸却无法传到西方。到了唐代，唐与西亚的伊斯兰国家——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发生了战争。当时，由于唐所雇的佣兵叛变投降，唐军大败。这就是塔拉斯大战。据说当时被俘的佣兵中有抄纸匠人，因此，他们将造纸术传入西方，时间大约是在751年左右。

也有人认为，唐还没有衰落到雇用造纸匠人当兵的地步。我做了很多调查，结果发现当时有很多中国人居住在塔拉斯附近。据说李白的先祖也是。可以认为，是其中懂得造纸技术的人员在那里造出了纸。

我到蒙古访问时看到了那个著名的“突厥碑文”。“突厥碑文”的原稿一定是写在纸上的。因此，我估计纸可能早就传到了西方。

我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在伊斯兰寺院看到了世界最古老的《古兰经》。那本《古兰经》放在保险柜里，被玻璃罩罩着，不能用手触摸。乌兹别克斯坦的专家对我说，衬在鹿皮上的纸是中国纸。那本《古兰经》大约是7世纪所制，所以，比塔拉斯大战早100年左右，他们就已经从中国进口纸张了。只是当时纸还没有在西方制作出来。

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塔拉斯大战的那一年造纸术传到了西方。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塔拉斯大战6年之后的757年，在撒马尔罕（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建起了造纸厂。然后过了大约40年，即795年在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建立了造纸厂。这是在西方建立的第二个造纸厂。

对于这第二个造纸厂的建立有两种说法：一是阿拔斯王朝从撒马尔罕挖走了技术人员；二是因撒马尔罕对造纸技术秘不外传，所以阿拔斯王朝就从中国的广东招聘了抄纸匠人。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认为，当时在连接巴格达与广东之间的“南之路”上，频繁地进行着商品交易。

大约在巴格达出现造纸厂的半个世纪之前，鉴真和尚漂流到广东的海岸上。鉴真和尚是在天宝七年（748）离开故乡扬州前往日本的途中，遇到大风而漂流到中国的南端——海南岛的。在海南岛他得到了冯若芳的帮助。

冯若芳以劫掠为业，一年要袭击抢掠两三艘波斯船。冯若芳把抓到的波斯人当作奴隶，驱使他们劳动。

据鉴真和尚的弟子所留下的《唐大和尚东征传》[[11]](#_11_7)记载，这些波斯奴隶是在“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的范围内劳动的。天宝八年（749）鉴真和尚向广州出发。广州港有大量的商贸交易船来往，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南之路”上的商品交易频繁地进行着。但是更多的详情，书中没有披露。

在鉴真和尚的漂流300多年前，中国的法显64岁时（399），离开长安向印度进发，他在那里停留了十余年学习佛教经典，后从斯里兰卡经海路回到青州（现在山东省）。这件事记录在《法显传》（《佛国记》）[[12]](#_12_7)里。

《法显传》还详细记载了这样一些情况，如法显在411年离开了斯里兰卡，所乘坐的船是能载200人的大船。为以防万一，大船后面还拴着另外一条船等。

据《法显传》记载，他们离开斯里兰卡后，在现在的爪哇岛附近换乘另外一条船。那条船仍是一条能乘坐200人左右、驶往中国的大型商船，船上装有够吃50天的粮食。据说乘客大多是婆罗门教的商人，即是印度人。412年，这条船在从爪哇岛前往广东港的途中，不巧遇上暴风，漂流到北方的青州。

我读了《法显传》之后，觉得它很好地将事实记录了下来。它是用于了解作为5世纪初期海上交通要道的“南之路”处于怎样状况的宝贵记录。

我在写《琉球之风》这部NHK电视台大河电视剧的剧本时，对琉球的历史等做了很多调查。但是，对南方的商贸交易情况却几乎没有找到记录。我甚至觉得，海洋之民和草原之民是不是对记录都不感兴趣。

草原之国蒙古出了一个征服世界的成吉思汗。但是，在成吉思汗之前，蒙古却没有文字。我想，与其说他们讨厌记录，还不如说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巨大价值。

据日本的民族学学者说，农民那里有很多诸如土地界线之类的文书等记录，但在渔民那里却几乎看不到记录。所以，调查与大海相关的历史的确很难。

1993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了主题为“旅行与文学”的国际研讨会，我在会上做了主旨演讲。在演讲中我讲了这样一段话：“那些来自中国和日本的旅行家都留有游记，相反，从西方到东方去传布佛法的人不知为什么却很少写游记。”

如前面所说，法显留有《法显传》；200年之后，唐玄奘也留下了《大唐西域记》这部大游记；同时期的义净[[13]](#_13_7)留下了《南海寄归内法传》[[14]](#_14_7)；日本平安时代的圆仁也留下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15]](#_15_7)等详细的记录。

然而，从印度进入中国的鸠摩罗什、达摩等却什么都没有写下。对于印度的佛教者来说，难道是他们觉得传播宇宙的真理最重要，对游记之类东西从未想过吗？在这个研讨会上，有个韩国人讲述了慧超[[16]](#_16_5)《往五天竺传》[[17]](#_17_5)的故事，他的报告内容大体上与我的一致。

所谓记录，是记录者认为有价值所以才记录下来的事情。大海之民、草原之民不做记录，也许是他们认为没有价值。对于这一点，有必要进行更专业的研究。

有一种大的贝壳叫护宝螺贝，听说这种贝只能在冲绳本岛周边到伊江岛附近的海域才能采到。把这种护宝螺贝掏空，经过雕刻可以制成手镯。人们经常能发掘到这种手镯，一直往北到北海道的内浦湾，即洞爷湖的所在地。那里有有珠遗迹，出土了弥生时代[[18]](#_18_5)的人骨及贝壳手镯。

护宝螺贝，起初人们以为是在附近就能采到的天狗角螺，但很快发现那种贝壳不是天狗角螺，而是护宝螺贝，而其只有在冲绳周边才能采集到。

在伊江岛一个叫ながら原[[19]](#_19_5)的地方有个贝塚（贝丘），里面出土了大量的护宝螺贝和芋贝的贝壳，贝壳上面有加工的痕迹。一般说到贝塚（贝丘），人们往往会认为那是吃完贝肉后的贝壳遗弃场。实际上，这个贝塚（贝丘）不单纯是个遗弃场，还是贝壳加工厂。

护宝螺贝手镯要穿越大海，经过长时间的旅行才能到达那里。但是，我们不知道人们是用什么船把它运过来的。但没想到的是，从天理市庵志町的弥生遗址中出土了绘有船画的土器残片，尽管船画画得较为稚拙。船上附有36根棹，左右各17根，剩下的两根是为掌舵而准备的。

虽是简单的船画，但它却是弥生中期，即公元前后的东西。在那个时期，已经有36人划的船了。提起弥生时代，我们常会不由自主地以为那个时期没有大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原来曾经有36人划的大船在海上航行。也就是说，是这种船把冲绳和北海道连接起来。

所谓弥生时代，大体上是从公元前300年左右开始的，这已是定论。一般说来，从那时起日本开始有了水稻种植。虽说是一句简单的“种水稻”，但仅凭一两个人是无法完成的，它是有组织的复杂劳动。并不是说有一个人从中国漂流过来，向日本传授了种稻技术，所以当地人就会种水稻了，这绝不像说的那么简单。

日本即将进入弥生时代的时候，恰好相当于越（春秋时代）在中国灭亡的时期。

在吴越之战中，越取得了胜利，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然而，有关越的记载却从此消失了。作为越的邻国楚建立了强大的国家，越好像是被楚吞并了。但是，我们却无法确认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有人说是公元前330年，有人说是公元前334年，大概就在那个时期吧。

越是个海洋民族。最近龙谷大学的学者和中国学者共同对浙江省会稽、绍兴等地进行了重点的调查，并将上述地区作为共同研究的大本营。这一带跟日本的关系非常密切。江户时代长崎的贸易船就曾来往于长崎与宁波（明州）之间，而宁波也在浙江省。

越王勾践是越最强盛时期的国王。他曾经说，人之所以能活是因为有船。也就是说，越是大海之民。越被消灭的时候，应该有很多难民乘船出逃，包括所谓的战争罪犯。那么，那些难民渡海去了哪里？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去日本的可能性较大。

恰好那个时期与水稻种植在日本落地生根的时期相一致。

越灭亡后过了100多年，秦始皇时代出了个徐福。在日本他被称为传说中的人物。据说，徐福渡海来到日本的地点，以熊野为首竟有11处之多。

徐福对秦始皇说，海中有长生不老之药，要取来献给这位皇帝。于是，他骗走了秦始皇的钱财就再也没有回去。秦始皇对寻药不归的徐福下达了处罚令，但徐福好像是成功地逃走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说：“得平原江泽止王不来。”徐福去了一个拥有宽阔平原和河流纵横的地方，在那里他当了王。徐福是山东省琅琊人，是一个在海岸边上生活的人，熟悉大海。

然而，有一位香港的研究人员说，徐福去的地方不是日本而是美洲，因为日本没有平原江泽，土地太狭小了。关于徐福去了美洲的说法以前也曾有过。最近发生这样一件事。关于徐福的去处，有个英国人认为争论没用，应该实际考察一下，于是他制作了木筏，乘上它从香港出发去了熊野。据说那是徐福登陆的地方。后来，他又划着木筏以美国为目标出发了。在前往美国的航行途中，他发出了SOS求救信号被人救起。这件事刊登在报纸上。

总之，我认为徐福到美洲去的说法太牵强。所谓“平原江泽”是相对而言。司马迁也没有实际看过，他只是说徐福去了一个宽阔的地方当了王。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认为秦始皇统治的国家是个不易生活的地方。民众或是因一点小事而被捕，或是被抓去修万里长城和阿房宫。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想逃到另外的某个国家去。那就走吧！于是，聪明的办法是从暴君那里骗了钱出走；不聪明的办法是成为乘船出逃的难民在海上漂泊。

当暴君出现的时候，还有像刚才所说的在越国战败的时候等，都会有很多乘船出逃的难民离开大陆。

时间向后来到三国时代的230年。

这是与龙谷大学《佛教初传中国南方路径》的调查重点相对应的那个时代，即吴国时代。吴的弱点是人口稀少。虽然当时的江南地区土地广阔，但战乱不断，疫病流行，人口锐减。

东汉时期（25—220）每换一次皇帝都进行人口调查，目的是收取税金。东汉大概有六七千万人。但是到了三国时代，据说人口全部加起来，是否有一千万还值得怀疑。因此，尽管吴这个国家面积很大，兵员却很少。所以，吴总是千方百计地从别处招募兵员。当时，有人向吴王建议，据说400多年前出了徐福这么个人物，他到了“平原江泽”，并且当了王，可以从他那里招兵。据说，吴王孙权点头同意了。他命令两个将军带领一万名士兵前去招募。吴王孙权其实就是让他们抢人回来。但是，没想到两个将军不仅没有招人回来，而且派出去的一万人，只有2000人回来了。两个将军报告说士兵都是病死的。孙权勃然大怒，便将二人斩首了。

这是我的想象。我认为这8000人不是病死，而是逃跑了。我总觉得吴是个极权主义国家，孙权也是个反复无常的人，所以他才把部下杀了。孙权是个独裁者，人们在这样的国家难以生活。

弥生时代之后日本进入了古坟时代[[20]](#_20_3)。5世纪，法显乘坐的载客200人的大船，中途遇到了大风，漂流到了山东半岛。我想，如果风向稍作改变，或许他们已经到达日本。人走在陆地上会留下一些足迹，但遗憾的是，大海会吞没一切，所以，我们无法追寻足迹。最近出现了“水中考古学”，因此，我希望今后在水不太深的地方，研究能取得较大的进展。

我曾注意到大海之民和草原之民的相似点。首先是不做记录。关于这一点前面已有论述。其次是好客。草原之民住在被称为“包”的帐篷里，即使你没提前打招呼就进去，你也会受到热烈欢迎。大海之民也是如此。再者是以小的单位聚合在一起，团结力很强。大海之民也是如此。在大海上，如果船沉了大家都得死，所以同船人是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另外，大海之民和草原之民都以小单位为基础，这种小单位的团结力，由于成吉思汗、帖木儿等杰出领导者的出现，突然形成巨大的团结力，建起了强大的国家。迫使秦始皇修万里长城的匈奴也是如此。

大家可能都知道匈奴，但对他们具有什么样的体貌特征等却不太了解。因为历史书上没有对其描述。

一位熟读希罗多德[[21]](#_21_3)等人所写的史书的人曾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国的史书上会出现各种民族的名字，但对于那是个什么样的民族，他们长着一副什么样的面孔，具有什么样的特征等，却极少提及。

就我所知，在《魏志》中的《倭人传》里有提及民族身体特征。我觉得，类似“有身材矮小的民族”的这种记述在中国史书上可能是第一次。

所谓匈奴，并不是民族名，而是指偶然聚集在那里的一群人的群名，是一个集团的名称。那里既有鼻梁高的也有鼻梁低的，眼睛的颜色和头发的颜色也是各式各样。大家超越人种和民族，聚焦在具有领导才能的人周围生活。在草原上，因为人们要带着几万头羊移动，所以，领导者必须具备擅长观察天象的能力。因为随着天象的变化，有时羊会死，人也会死。具有多种才能的领导者是通过观察天象和观察人心来引导族众的。如果人们聚集在具有非凡才能的领导者周围，打仗就会取胜，就会得到战利品。

成吉思汗正是这样的领导者。一次战役中，敌方士兵虽然失败了，但那些士兵却不逃走而是加入到成吉思汗的阵营中。所以，一个领导者，如果能够指导士兵打胜仗，无论他鼻梁低还是高，都没有关系。草原上实行的是彻底的实力主义、能力主义。蒙古之所以取得天下靠的就是这一点。因为他们对有才能的人，不分人种和民族，会迅速地提拔重用。

在冲绳，有个“闽人三十六姓”。“闽”指的是福建省，由于商贸关系，冲绳请求明太祖朱元璋派有关专家前来帮助。从此以后，冲绳人就把船务和贸易全部委派给了这“闽人三十六姓”。也就是说，他们是中国裔的冲绳人。

18世纪，出现了一位被称为琉球历史上最高明的政治家——蔡温。有一次，一位冲绳县议会的议员由于长年辛勤工作受到了表彰。有人在讲演中赞扬这位议员的功劳，说他是“蔡温再来”。结果听众大为不满，愤愤不平地说：“像蔡温那样的人物，岂能那么经常地出现？”

只要是有能力的人，即便是中国裔，也要把事情交给他办。当时的琉球王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蔡温的儿子。这种事情只有在大海之民和草原之民中间才能出现。他们不搞种族歧视。

另外，无论是大海之民，还是草原之民，都对人亲切友好。

例如，在幕府末期的琉球，尽管当时有幕府的锁国令，但中国船来了，琉球王府也不驱赶，还告诉人们要好好接待。万一被萨摩船发现，琉球王府的官员还会到萨摩船的船长那里去，让其不要声张。大概他们是给萨摩船的那些人送了钱吧。

1830年左右有个叫阿美士德的英国使者带领两艘军舰到了中国，逼迫中国开放上海港和广州港。当时，这两艘军舰也来到了冲绳，冲绳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船长和船医都写了航海日记。在日记中他们都对冲绳极力称赞。最终，英国的阿美士德放弃了与中国的贸易交涉，带领这两艘军舰回国。途中，他们在经过圣赫勒拿岛时，拜访了拿破仑。他们在航海日记里甚至还提到这样一件事：他们向拿破仑报告说，日本人身上都佩着刀，但冲绳人不配刀，对人态度友好。拿破仑听了不信，问道：“难道还有不带武器的国家吗？”

虽然与对方不能交易，又不能从对方那里得到任何利益，但还是欢迎对方。这就是大海之民的特性。几乎所有的旅行者都以赞美的笔触来描述在冲绳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从中我们能充分感受到冲绳人所具有的大海之民的特性。

无论是什么样的肤色，什么样的头发，也无论鼻梁高或低，只要你具备别人所没有的才能，就不分种族地提拔你，重用你，这样的社会在我们的历史中曾经出现过。可以说，不问对方的出身和经历是对21世纪人类的启示，而这种启示就隐含在大海之民和草原之民的历史当中。

我认为，所谓佛教通行的南之海，指的是那样一种氛围。围绕那样的南之海、南之路，日本和中国的许多学者一直进行着共同考查，这促成了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我认为，所谓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超越国家和民族，一起做一项事业。我殷切地希望这样的交流能更深入地开展下去。

## 古代的中日交往

世界上有许多族群对外部情况抱有好奇心，但达到日本人那种强烈程度的则为数不多。这些话我多次说过，也写过。虽然人们都说日本锁国长达200多年，但实际上，在锁国期间，日本一直规定与长崎保持通航的荷兰人提供《阿蘭陀風説書》[[22]](#_22_3)（荷兰版世界局势报告书，以下简称《荷兰风说书》）。日本虽处在锁国的状况下，但想要了解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并没有减弱丝毫。《荷兰风说书》是关于世界形势的报告书。在同一时期，清政府拒绝了与外国的交往，致使国家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清政府不像日本那样想要了解外部情况。

NHK电视台播放的《丝绸之路》[[23]](#_23_3)是中日合拍的，我也参与了此项工作。在与相关人员的接触过程中，我感觉日方的工作人员热情特别高，而中方人员则似乎不是那样。对于其中的原因，我也按自己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思考。我觉得似乎可以在两国的神话传说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日本的神话传说，无论天孙降临[[24]](#_24_3)，还是神武东征[[25]](#_25_3)，内容全都是主人公从外边来到这个国家的故事。与此相反，中国神话却是在中原获罪的某人被送到外边之类的内容。《史记》中的《五帝本记》也是采用这种记述方式。例如，将在建设事业中失败的共工流放到北方的幽陵，使之成为北狄；为追究推荐共工的责任，将騹兜流放到南方的崇山使之变为南蛮；将治水失败的鲧封闭在东方的羽山上，使之变为东夷；将扰乱治安的三苗移到西方的三危使之变为西戎。

日本人所看到的“外”，是指自己的祖先历经艰苦跋涉而走过来的路，有着令人仰慕的起源，他们对此怀有强烈的憧憬。

中国人所看到的“外”，是指做了坏事的恶人被放逐的场所。中国人对那样的地方绝不会憧憬，对外多取冷眼观察的态度。

人们说，神话传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事实。虽然在日本有骑马民族说、海上之路说等多种传说，但是一般认为日本的基本民族来自于外部。这一点毋庸置疑。

对于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我们只能通过遗物和推理把握其大致轮廓。遗物越多，轮廓越清晰。“古代中日交往”这一题目，恐怕也是今后的考古发现越多就会越更清晰。

中日交往的文字记录，现在以《史记》的徐福一项最为古老。那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徐福上书要出海求仙，及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始皇帝到琅琊再会徐福的记载。

虽然记录从徐福开始，但不能说徐福以前中日就没有交往。我为NHK电视台的《海上丝绸之路》第6集点评如下：

中国古代史是以中原为中心写的，所以大海很少出现。当然，史书上没有记载的东西，并不意味着都不存在。

作为沿海势力的代表——春秋最后的霸主越王勾践是突然出现的。那只是突然出现在史书上，《史记》显示勾践是越王家族二十多代的主人。我们只能说，浙江沿海势力进入中原人的视野始自勾践时代。

至少拥有政权的集团在浙江沿海竟然延续了二十几代，只是它没有被记录下来而已。如果一代以30年来计算，越王家族至勾践时代已有600年的历史。勾践死亡的年份加上600年，实际上接近了商朝末期，难道不是吗？我们不能不想起柳田国男在《海上之路》第16章说过的一段话：

支撑商王朝进入中原的背后势力在东方。现在基本上已经弄清楚的是在所谓东夷的海上经营中，有一大部分是供应宝贝。

其中子安贝在大陆沿海采集不到，因此非常珍贵。子安贝产自珊瑚礁上，在日本的南部，特别是琉球群岛的宫古岛上特别多。

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中认为，商是在东方海滨兴起的民族，夏是在西方内地创造了文化的民族。但是，内藤湖南[[26]](#_26_3)却认为夏是东方，商是西方内地，其主张恰与傅斯年的相反。无论是哪种情况，古代王朝都曾以宝贝为其势力的源泉。采集宝贝最得地利的地方是浙江、福建沿海。我们在那里能够朦胧地看到越王勾践的祖先形象。

由冒险家们所开展的中日交往肯定相当频繁，但是这些内容却未被记录下来。如果交往持续下去，或许被记录下来，或许会留下更清晰的痕迹。但是，随着铜的出现，宝贝的货币地位被夺走，交往也就中断了。柳田国男在《海上之路》第21章写有这样一段话：

商对宝贝的需求没有那么强烈了，商人赌上身家性命，甚至勇闯波涛巨浪去追寻宝贝的那种热情也就没有了。这是比徐福的罗曼史更加久远的往事。商人把那个出产宝贝的岛屿叫作“我之岛”，如果留在岛上的人开始安居下来，那么，不久他们就会感到生产用地不够。于是，他们就物色容易去的邻近岛屿。这种行为与地平线之外的冒险根本不同。我认为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种植稻米的合适地方。

他是说，古代中日交往的黄金期是为采集宝贝而合作的那段时期，但不久就转到了种水稻上。我认为，宝贝和水稻之间有相当长的间隔期。而第二个黄金期是徐福时代。

从秦始皇时代与徐福这个人物的组合来看，我觉得在这一时期的中日交往中，摆脱受压迫政治的“亡命”因素更多一些。长生不老的仙药不过是操纵剧情的幕后角色。

据说，徐福给日本带来了五谷的种子。当然，技术也一同漂洋过海地带来了。因为随行人员中有百工，其中不仅有农业技术能手，还有渔业专家，也许是他们来到日本后向原住居民传授了捕鲸技术。

从绳文时代[[27]](#_27_1)转到弥生时代是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弥生时代一直持续到进入古坟时代的3世纪，在中国，相当于从徐福开始一直到三国时代，这一时期或可称为“亡命交往”的时代。

因为徐福与秦始皇接触过，所以他才被记录在历史上。不能说没被记录的第二个徐福、第三个徐福就不存在。我们必须承认，在记录下来的历史背后拥有数倍于这个数字的类似史实。

另外，在日本，好像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徐福不过是个神话人物。但是，我想最后再重复一遍，并将这种少数派的声音传达出去：徐福出海是司马迁记录下来的事情，司马迁正是那位连1000年前的商王统谱都能准确记录下来的史学大家，而徐福出海距司马迁出生才不过70年而已。

## 丝绸之路，海上之路

由于“丝绸之路”这个浪漫名称的缘故，好像这条只有东西方交流的陆路被放大了。为了弥补这一缺陷，NHK电视又制作了题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特别节目。

提到海路，船只经常会成为问题。陆路靠两条腿也能走，但是，海路必须要借助船只的帮助。自从在八丈岛发现绳文遗址以来，有一部分人强烈要求高度评价绳文时代的造船技术。

但是，对古代人的造船技术无论怎样重新评价，在没造出构造船之前，船只的宽度都未超过树木的直径。也就是说，在独木舟时代，船只不能装载大量的货物。大海本身是危险的，船只的容积也有限制，只能装载比较贵重的东西。据说，魏向倭[[28]](#_28_1)的使节赠送了100枚铜镜，但是，倭是用什么样的船将其运走的呢？因为中国已经有了构造船，或许是倭借用了中国船吧。

最宝贵的是人的大脑。到先进地区去的人将先进技术装满大脑后坐船回来。一个掌握了铸铜技术的人从海外归来，应该超过100枚铜镜的价值。

“三角缘神兽镜”[[29]](#_29_1)以前一直被认为是魏镜，也有说法认为，那或许就是魏赐给卑弥呼[[30]](#_30_1)的百枚铜镜之一。

但奇怪的是，三角缘形状的铜镜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出土，甚至有说法认为，它是只用于赐予下属的特制品。中国的王仲殊[[31]](#_31_1)先生看了这枚铜镜，提出了新的观点：“虽有吴的风格，但并不是吴镜，是不是吴的工人在日本制作的呢？”如果是吴的工人，即使他到了日本也一定会制作同样的吴镜。倒不如说，是日本人渡海去吴，在那里学习了铸铜技术，回国后制作了独特的铜镜。我认为这种说法更有说服力。假如那是真的，可以说这是古代“海上之路”的典型例证。因为“海上之路”的一个特点正是“将大脑里装满技术再运回来”。

中国僧人法显由陆路赶赴印度，十多年之后他又经海路回国。他在狮子国（斯里兰卡）搭乘了商船。据法显的《佛国记》记载，那是一条能承载200人的大船，航行90天到达耶婆提国（爪哇岛），在那里滞留五个月后，法显乘上开往广州的船。那条船也能乘坐200人，船上装载了够50天消费的粮食。这条船在海上竟漂泊三个月，最后漂到青州长广郡（山东省胶州湾）。在读法显的这本《佛国记》时，我就设想，如果这条船漂到了日本将会如何。那种可能性不是绝对没有。据说，漂到青州的那一天是义熙十二年（412）七月十四日，相当于日本的古坟时代。在这200人当中除了商人，一定既有像法显一样的僧侣，也有身怀绝技的匠人。若他们的船漂到日本而船坏了的话，大概只能在日本住下来吧。这也许实际发生过，只是没被记录下来而已。

倭五王[[32]](#_32_1)经常向南朝派遣使者，其开始年份是421年，那一年倭王赞向南朝奉献贡品。就拿五王献贡来说，此事在中国文献上有记载，在日本却没有记载。大船漂流至日本可能也成为五王奉献贡品的动机吧。

在有历史记录之前的海上之路，绝不逊色于丝绸之路，因为它充满着气吞宇宙的浪漫情调。

## 中国的历史和信息

摇木铎弭金铎。

在周王朝时期，官府若有事，便会通知民众。因为当时民众也不识字，所以官员就到村里，摇铎召集民众。通知文事时用木铎；通知武事时用金（铜）铎。金铎就是像小钟一样的东西。金铎一响，村里人就知道又来征兵了，所以很紧张。因此，“摇木铎弭金铎”的意思是“请多敲木铎，但不希望总敲金铎”。

在读唐宋时期的诗文时，经常会遇到“邸报”一词，如苏东坡的诗里有一句是“坐观邸报谈迂叟”。苏东坡是宋代人。所谓“邸报”，就是朝廷处理政务的简报，大体以人事变动的消息为主。看“邸报”可以了解一些信息，例如，某官员是自己久未谋面的同年，上次去了云南，这次又回到某地等。文人也常以这样的内容作诗。

邸报的“邸”字左边是“氏”字下面加一点。“氐”加人字旁就成为“低”字，如果“氐”变为“底”，还是低的意思。“邸”也解释为“平房”。但是，所谓低，似乎并不是指房子低，而是指等级低。跟什么比低呢？是跟宫殿，跟天子居住的场所比，比宫殿矮的居所就是邸。

古代天子要巡视四方，要到泰山举行封禅。“封”是在山上筑土祭天神，“禅”是在山下除地祭地神。所以，封禅就是祭天地。封禅并不是任何天子都能举行，只有在天子圣明、天下太平及天降祥瑞的条件下才能封禅。中国有几位天子在听到有人建议封禅后，竟然婉言谢绝了。

天子离开宫殿到地方出巡，常常要在地方上住宿，其住所就是邸。

另外，邸还指诸侯在京师的住所，相当于日本江户时代的藩邸。“畿内五百里”是指从首都五百里之内的意思。虽说同样是“里”，但中国的“里”随时代的变化而含义不同。如果1里算作500米左右，那么“畿内五百里”就是250千米到200千米。这是天子的直辖地。除此以外的地方是各个诸侯的管辖区。诸侯在京城的住所就是邸。当然从规格上来说，邸要比宫殿低。

那么，邸的功能是什么呢？它主要是接待从封国来京的办事人员，保卫他们的安全，为他们提供饮食。也就是说，邸起到一个旅店的作用。

邸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功能，那就是把京城的情况通报给封国里的人，尽管这可能不是正式的功能。我想大概会通报一些情报，如现在在京城谁最有势力，最好跟哪个人结交，虽然我们现在跟某个人关系很好，但他也没有办法之类的信息。来自邸的消息就是邸报。

邸出现在汉代，在此之前是“馆”。二者的意思差不多。

孔子到郢这个国家去的时候，因听说以前认识的一个馆人（在馆里做事的）死了，他就到那人家去大哭。哭完，也就是表达完哀悼之意后，孔子就回来了。为此，孔子的弟子子贡感到很不满。他想，同门弟子死的时候，孔子也不常做这样的事，于是就向孔子抱怨。而孔子称他和那个人过去很亲近等。当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总会感觉馆人的身份地位不太高，因为子贡对孔子参加那个馆人的葬礼很是不理解。

我不太清楚，馆人是因为做服务业而被人瞧不起呢，还是因通风报信这种带有间谍性质的工作，在儒家，特别是子贡看来令人讨厌呢？

汉代，馆已经变成了邸。刘邦去世后，吕后几乎夺取了天下。但是吕后一死，周勃就剿灭了吕氏一族。汉室还剩下刘邦长子的儿子和刘邦的一个儿子，到了决定挑选谁当汉朝皇帝的时候。代在现在的大同市一带，有云冈石窟，是当时汉朝的北方边境。居住在那里的代王是刘邦剩下的唯一儿子。

虽然当时还有刘邦长子的儿子，但有人说他的母亲性情不好。经过讨论，大臣们确定的人选是代王。

代王进长安时，那些推翻吕后一党的大臣们来到渭水河畔迎接。当大臣们献上皇帝的玉玺时，后来成为文帝的代王说：“等一下，到代邸后再谈。”因为代邸里的人全是代王的心腹。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邸”的性质。我认为，消息可能早就从代邸传到了代王那里。正因为从代邸传来的消息是“局势已定，没有问题”，所以代王才来京城的，并且他在接受皇帝大印时，才说“等一下，到代邸后再谈”。

邸的性质如上所述。据《汉书》记载，在西汉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第一次出现了“邸报”这个词。中国的新闻史学者说，最早的罗马帝国报纸是在公元前6年出现的，邸报要比它早68年。这个学者说到此事时显得很高兴。我觉得，这位学者的兴奋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唐代，诸侯王的力量逐渐衰落。虽然皇族可以成王，但没有军队，只是名义上的王。这时，出现了拥有巨大权力的节度使。节度使最初有九人，安禄山是其中之一。节度使身在边境地区，可以调动军队，当然也拥有行政权力。

唐代节度使有“邸”，名称叫“上都邸务留后”。在唐代，长安是首都，称上都；洛阳是副都，称东都。长安“务留后”就是留在后方处理事务的意思。例如，安禄山住在遥远的北京附近，所以他可以把部下留在首都长安，让他们办理各种事务。那些部下会把各种情况通报给安禄山。例如，“现在来了一位叫杨贵妃的人，有点难办”；“有个家伙自称是杨贵妃的叔伯兄弟，此人很怪，专横跋扈，我们可不可以跟他交往”等。

但是，邸本来的任务是向驻扎在外地的节度使传达朝廷的诏敕、命令的，也就是上情下达，如这次制定了什么法令，用什么方针来处理军政事务等。但是，在节度使看来，邸不仅有这些功能，还是获取首都的其他信息的工具。安史之乱后，“上都邸务留后”改名为“上都进奏院”，也就是说，按朝廷的意图，改变了名称。朝廷的意图是将天子的指示转达节度使。称谓虽然改变了，但传达信息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地方上的有权者仍然是在首都设邸，获取信息。

到了宋代，节度使的人数大量增加。宋朝虽是由节度使的兵变（由当时的节度使赵匡胤发动的陈桥兵变）而建立的国家，但历经五代的战乱而当上皇帝的赵匡胤（太祖）深知节度使的危害。因此，他通过将节度使变更为名义职务及在各州均设立节度使等办法，使节度使的人数增加到297人。因此，首都开封就有297处邸。这样一来，皇上又说朝廷无法进行管理，便又把大部分的节度使废除，像唐代一样只在镇（军队所在地）设立节度使。宋朝最后剩下30多名节度使。

在唐代发生过一件有趣的故事。一天，诗人超壹在家中闲坐，大家都跑来向他道贺，说是邸报上登载了他升任郎中之职的消息。超壹听后很高兴。可没想到那是误报。自古以来误报好像就比较多。

那么，邸报到底是怎么被送出去的呢？敦煌出土的咸通九年（868）的邸报被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它是现存最古老的木板印刷品。当然，在此之前就有邸报。邸报可能是在京城完成木板印刷后被送往各封国去的。30多名进奏员都是自己动手印刷。我认为，大概是这些进奏员制作同一内容的邸报，再将它分别送往各自的封国。

宋代的邸报大体上是每五天出一篇。虽然每天都有法令和政府的方针出来，但是，要将这些法令等分成五天的分量积攒起来印刷，然后再向大家分配。具体承办事务的小吏经常暗中把有关内容提前发布出去。还剩四天，他们把不及时发布就传不出去的消息一下子发布出去。那种消息就是小报。这在当时好像还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但是，毕竟当时有那么多迫切希望获得信息的人们存在。我想编辑小报的人可能也赚了不少钱。读宋史我们就会知道，所谓“小报问题”是经常出现的。可能有人会说，那每天出邸报不就行了吗？但是，当时的印刷技术好像还远未达到那种程度。

从清代开始，每天都出邸报。这时邸报已改叫京报了。到了这时，中国的人口已从2亿增加到了4亿，政府的政务量非常大，每天发布的法令也非常多。京报每天都出，但出京报的场所不同。有十几家店铺都出京报，最著名的是荣禄堂，它是一家最古老的店铺。其余店铺有十多家，大都加上报房的称谓。要问这些报房是否都一样，那倒也不是。

那时的办报人，都到内务部（宦官聚集的场所）去抄写当天发布的法令。因为法令都公开了，所以并不是秘密。因法令太多，所以就从其中找出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来进行抄写。尽管有十几家报房，但所写的内容并不一样，当然重要的内容是一样的。

如三年一度的科考中举者名单，无论哪家京报都要登载。这与日本的《周刊朝日》《周刊读卖》《每日圣代冰激凌》等杂志的做法是相同的。上述日本杂志均登载东京大学录取者的名字并在括号内添加该生所毕业的高中。

看林则徐的日记，会发现上面写着如他是福建人，所以发榜那天福建考上了六人等。由此看来，考中者的出生地也会在报上写上。我想当时中国之所以有十几家报房，是由于有巨大的需求量。

1901年（辛亥革命是1912年），中国出现了官报。各种各样的法令和政府通告被送往各地，虽然当时已有电报，但如果没有政府的正式文件，电报还是不发挥效力。

北京公布的法律，在广东是在公布后的20天后生效，在西藏是在165天之后。新疆的乌鲁木齐是90天之后，云南是60天之后，伊犁是120天之后。也就是说，在法律生效之前，用以前的法律处理政务也没有关系。

以上所说的是中国报纸的发展过程。下面谈一下近代日本和中国在对待信息上有什么不同。面对外国信息，以前中国的应对方式是消极的，也就是说，对外国不关心。这是因为一直到清朝，中国都认为自己处在世界的中心，它对自己之外的世界不感兴趣。

日本和中国一样都实行过锁国政策，但两国的锁国背景却稍有不同。日本的情况是，因为天主教传教士能够制造大炮，所以九州地方的大名如果与他们结盟进攻政府，幕府就会危险。总之，幕府要做的就是割断天主教与大名之间的联系。日本实行的是关乎政权存亡的禁止天主教措施。

中国禁止天主教，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是个礼仪问题。在中国一个人一旦成为官吏，要到孔庙参拜完孔子后就职，这已成为义务。另外，中国人要给祖先进香。这些行为耶稣会都是允许的，而在天主教的教规里是不允许的。无论哪座孔庙都放着孔子的牌位和木像，人们要对它鞠躬行礼。天主教认为这是偶像崇拜，所以不允许。

但是，如果这些行为不被允许，在中国的传教就不可能进行。在日本，天主教也是攀附上大友宗麟[[33]](#_33_1)等大名的势力之后才被允许传教的。传教还必须得抓住知识阶层。而属于知识阶层的那些人都是官员，既然他们是官员就必须向孔子的牌位行礼。如果教会不允许这些行为，传教是不可能的。如果教会不让中国教徒拜祖先，那会引起他们的反感。所以耶稣会就对上述两种行为都允许了。这就是礼仪问题。

当中国说那样做（拜孔和拜祖先）并不妨碍信仰天主教时，耶稣会的竞争对手多明我会等就向罗马教皇告状，如耶稣会在中国搞异端、耶稣会让教徒拜孔子牌位、耶稣会允许教徒对祖先礼拜等。

最终经过讨论后，教廷认为耶稣会的做法不对，不能允许中国教徒的做法（拜孔和拜祖先）。教廷也向中国施压，加之在中国各地发生了一些教会事件，所以中国朝廷的首脑们已经对此感到厌倦，最终决定“停止教会活动，不许神职人员再来”。这就是中国对天主教的禁止。

天主教虽然是被禁止的，但在中国却一直有神父传教。周围的人大多对此不发一言，官员也怕处置不当会产生麻烦，所以也就坐视不管了。因此，在中国经常出现一个神父死了又来一个神父的现象。中国与动辄将外国神父处以绞刑或烧死的日本相比，情况完全不同。

总之，日本和中国都实行了锁国政策，日本和中国也都同样只开放一个港口。日本是长崎，中国是广州。在贸易对象国的选择上，日本只有荷兰一个国家，而中国则不论哪国都允许，但场所仅限一处。

中日最大的不同体现在下面一点。荷兰船进入长崎时必须把记述世界形势的书籍——《荷兰风说书》提交给幕府。

幕府阁僚级别的人都要读《荷兰风说书》。风说书是用荷兰语写的，由翻译人员翻译。老中（幕府职级中职位最高的执政官，直属于将军）等都阅读这些报告书。当时日本正处在锁国之中，一般的日本人是不了解外国情况的，但上层的当政者却了解得很详细。

然而，中国却不要求外国人提供了解世界的书籍。在日本，荷兰人甚至到江户给幕府敬献礼物。而在中国却只允许外国人在广州进行商贸活动。中国官方原则上不跟外国人进行正式接触。外国人仅跟被称为“行商”的中国最有实力的贸易商接触。

这些贸易商均在户部（财政部）的监督之下。因此，外国人在广东有什么要求，需要经过繁琐的手续，即先要去跟作为客户的行商进行交涉，然后行商再报告给户部。因为行商有十三家，所以称十三行。当然，十三行绝对不会索求《荷兰风说书》之类的读物。因此，中国清朝的当政者根本不了解外国情况。

而幕府的当政者是了解外国情况的。《荷兰风说书》所讲的内容相当准确。只是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信息有些可笑。另外，关于荷英战争，对荷兰战败一事则没有记载。因此，日本政府在260年的锁国期间，对世界局势有大致准确的把握。

最初，幕府最为关心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动向，一开始以为西班牙和葡萄牙会给反幕府军做后援，就特别想获取那方面的情报，但是后来逐渐了解到西葡两国并没有那样的实力。

但是，幕府并没有说“那好，今后不要再送情报了”。这正是日本的优点。然后，日本就把重点传向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如现在欧洲是什么状态，是不是在和俄国交战等。这些内容与当时的日本没有太大关系，但是那种起哄看热闹的好奇心却特别旺盛。

中国人不太想了解外面的情况，我想是因为他们内部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所以确实也无暇顾及俄国之类的世界大事，也根本不想了解世界大事。这一点正是当时中日之间存在的最大不同。

另外一点就是，在日本曾经学习过荷兰学问即外国学问的人是医生。所谓医生是比较俗气的。这么说可能有点出人意料，但他们确实是想通过与有实力的患者进行交谈，或者与世俗之人打交道来了解各种情况。

在中国，外国人担任钦天监和天文台台长的时期曾经很长，所以，研究外国学问的是那些搞天文历算的人。因为他们学习的内容是“星星到底怎样了”之类的知识，所以对社会上的事情不太关心。他们与医生不同，对世俗几乎不关心，社会怎么变化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

1837年，日本发生了大盐平八郎之乱[[34]](#_34_1)，政局相当不稳。就在这时，幕府收到了《荷兰风说书》。上面登载着这样的信息：一艘名叫“罗伯特·莫里森号”的美国商船将把滞留在澳门的七八名日本漂流民运送过来，希望日本政府接受美国商船的访问。

《荷兰风说书》既提供一些外国情报，有时也会提出一些建议。当然，我觉得“罗伯特·莫里森号”也想通过运送漂流民的机会打开通商的窗口。幕府收到的就是带有这种信息的风说书。

尽管《荷兰风说书》上建议幕府接受“罗伯特·莫里森号”商船的访问，幕府还是根据1825年的外国船只驱逐令开炮驱逐了它。

贺芳市三郎认为，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于是，他到研究兰学[[35]](#_35_1)的小团体尚齿会[[36]](#_36_1)找渡边华山、高野长英、江川太郎左卫门、川路圣谟等人进行商议。这些人都是兰学家，他们对世界局势颇为了解。他们认为会出大事，担心杀了罗伯特·莫里森（中文名译作罗伯特·马礼逊[[37]](#_37_1)）会遇到大麻烦。

这里有一个信息是错误的。幕府击退的明明是“罗伯特·莫里森号”商船，兰学家们却错误地认为是马礼逊这个人，而马礼逊已于1834年死了。

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郭实腊[[38]](#_38_1)及英国的汉学家等都出生于此。第一部《英华字典》就是马礼逊编纂的。他与传教士米怜[[39]](#_39_1)共同翻译完成《旧约全书》，取名为《神天圣书》。因此，对于这样一个著名人物，尚齿会的人无不知晓。

然而，尚齿会的人却不知道这个人已经去世。贺芳市三郎带给尚齿会的信息是1838年，而4年前，马礼逊已经死去。

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杀了马礼逊这样的大人物可能会出大事，所以，高野长英就写了《戊戌梦物语》，渡边华山写了《慎机论》。而这些议论成为幕府镇压兰学者的借口，引发了“蛮社之狱”[[40]](#_40_1)。悲剧的结果是渡边华山剖腹自杀，高野长英被投入监狱。后来高野长英虽然被放了出来，但最终还是自杀了。

如果他们知道那不是马礼逊这个人，而是“罗伯特·莫里森号”商船，恐怕就不会有那么强的危机意识而议论此事了。如果是那样，我感觉两个人都会得救，尽管我对后来发生的事不清楚。

我在接受NHK电视台颁发的放送文化奖时，做了一个致辞。我是因为《丝绸之路》而获的奖，所以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读斯坦因[[41]](#_41_1)和斯文·赫定[[42]](#_42_1)的书，对丝绸之路很是憧憬。能到丝绸之路去是我本来的愿望，但因此而得奖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我记得我是那样说的。过后，主办方给我送来了录像带。我的小孩在看那个录像时，画面里的声音传到了我的耳边。我听到录像中的我是这样说的：“我读斯坦因和海明威[[43]](#_43_1)的书，对丝绸之路很是憧憬。”原来是自己把斯文·赫定与海明威弄错了。如果不看录像的话，我还一直以为自己说的是斯文·赫定。而实际上，我说的却是海明威。虽然别人不会对我说“错了”，但是，我认为把弄错的地方为对方指出来，是一种关怀。

下面是我特别难于启齿的一件事。我在某报系的周刊杂志上连载了一部小说。书中有一段描写一个人物被袭击的情景。他身上的衣物被扒光，手表也被抢走，吓得几乎失去了意识。写到这里，我外出旅行，大约去了一个月左右，回来后又接着写。我写道：“那个人物缓过神来。啊，肚子饿了。现在是几点？于是他看了一下手表。”

手表被偷了呀！但是，没有人告诉我这个错误。虽然小说印成了书，但仍然没有人对我说。这部小说出了文库本[[44]](#_44_1)，过了好长时间还是没人跟我说。就这样，文库本发行三年之后，终于最近，一个非常热心的读者心平气和地给我指了出来：“那个人有备用表吗？”

我重新看了一下这部小说，这才第一次看到了那个错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错误。我估计可能有很多人发现了，却就是不跟我说。如果跟我说了，再版时可以改过来的。现在这部小说已经再版，我还得继续丢丑。我认为如果对方有错误，还是尽早为对方指出来为好。

当时，如果荷兰人强调一下这是船名就好了。因为马礼逊是著名人物，有些人肯定会知道他死了。如果有人把这些情况跟尚齿会的人说一下该多好。因为无论是高野长英还是渡边华山，他们都是出于保护马礼逊的角度来议论此事的。他们都认为如果把马礼逊杀了，那会成为国际问题。

刚才所说的马礼逊事件是1839年发生的事，而1840年鸦片战争就爆发了。直到鸦片战争开始时，中国还不了解国际形势。在鸦片战争中，中方甚至不知道举着白旗过来的英军士兵是英军使者，就开枪射击，搞得英国人特别气愤。而中方的态度却是，英方生气没道理，因为我方不知道。

我认为林则徐这个人非常伟大。他作为钦差大臣被派到广州时，最先做的就是让懂英语的中国商人翻译英文书籍。也就说，他自己也借助翻译来学习。

当时，外国人虽然在广东，但贸易季结束后，他们就必须离开。外国人离开广东回到欧洲后再回来很麻烦，所以，他们就停留在葡萄牙人的居住区澳门，等待下一个贸易季到来后，再回广州。他们在澳门办了一个《中国丛报》[[45]](#_45_1)（The Chinese Repository）。

这是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是东印度公司的工作人员。《中国丛报》就是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上面登载一些关于茶叶知识之类的文章。除《中国丛报》之外，也有地理方面的书籍。林则徐让人把这些全部翻译成中文，自己也学习。林则徐还从那些外国人手里弄到了一部《国际法》，让伯驾[[46]](#_46_1)这个既懂汉语又是医生的美国传教士来翻译。在伯驾那里留有林则徐到访的记录。林则徐是来问小肠疝气的治疗方法的。伯驾没有进行治疗，而是给他提了一些建议。所以在患者名单上留有林则徐的名字。名单上面写着“林则徐，职业总督”。后来，林则徐拿去一部《国际法》，请伯驾翻译其中的一些重要章节。

林则徐因鸦片战争的缘故被革职流放到伊犁。途中，他在经过长江沿岸时对居住在那里的魏源说：“现在世道已变成这样，你也必须加以学习和研究。”他把自己的全部资料存放到魏源处。魏源以这些资料为基础撰写了《圣武记》[[47]](#_47_1)。该书记述了清朝自建立以来发生战争的历史，论述了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关系，所涉内容庞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兴亚院政务部翻译了这部书。我认为这是兴亚院最出色的工作。

另外，魏源还写了一部《海国图志》[[48]](#_48_1)。在这部书中，魏源以极其犀利的语言批判守旧势力。例如他说，世界已经变成这个样子，而旧式的儒学家们还把外国看成是夷狄，简直是胡说八道；对外国情况一无所知，却仍然说那种话，真是令人可笑等。

《海国图志》于1843年问世，但第二年这部书就已经到了长崎。幕府的“老中”订购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个人也有订购的，如平户的“家老”叶山左内。当时这件事是尽人皆知。因为人们都说平户的“家老”叶山左内购买了《海国图志》，所以吉田松阴[[49]](#_49_1)才跑到平户去阅读。

林则徐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在被降职时，他把以前收集的资料交给了自己最信赖的朋友魏源保管。因为有林则徐这种可遇不可求的伟人出现，《海国图志》才得以出现在世人面前。

魏源夜以继日写出的这部书，不仅是来到了日本，而且在日本复刻再版了，并且是由好几家书店复刻。因此，很多日本人读过《海国图志》。虽然在日本的复刻本中有相当多错误，但在那时的日本，人们对获取信息的热情非常高。

我认为这是好奇心的问题，如果没有对什么都想了解的好奇心，无论信息怎么丰富都会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只有“我想知道、我要了解”的人才需要信息。在此之前，中国获取信息的机会也很多，但就是缺少研究那些信息的有心人。

广东十三行都曾与外国人打过交道。通过与外国人的接触，商行方面得到过无数信息，却没有人对这些信息进行研究。

对于近200多年来中日两国在起点上的差异，我们必须加以认真思考。也就是说，并非是因为日本靠明治维新突然取得成功，中国也同样做就可以了，而是因为两国的起点不一样。所以，我认为中国必须下大力气来进行学习。

项羽之所以败给刘邦是因为刘邦所掌握的信息多，这就是我的观点。刘邦是沛县农村里的一个小吏，在秦始皇时期，他多次带领那些被征用而来的民工去修建阿房宫、骊山陵等。因此，他对沛县至咸阳一带的地理环境及风土人情了如指掌。而作为将军后代的项羽是个公子哥，他住在会稽附近，很少离开那里，所以他对世事孤陋寡闻、所知甚少。当然，二人之间也有年龄上的差异。

刘邦在故乡沛县与首都咸阳之间的往返途中，在很多地方住过。我认为他拥有丰富的信息量，例如，那里的人情淡薄，这里的百姓忠厚；要是打仗，到那里去可能吃亏；应往这里逃跑等。

充分把握信息不仅指阅读文字，还包括了解事物。有的人虽然不会读书识字，却拥有大量信息。

从事搬运工作的人就是如此。往来于中国运河的船夫南来北往，各地信息应接不暇。这些人又都拥有各自的信息网。例如，我方的船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因为那里可能会有危险，所以我方会与那里的帮会头目联系，请他们予以保护。同样，如果对方的船到我方这边来，我方也要保护对方。这就是青帮。

青帮、红帮这类组织最初根本不是什么秘密结社。清朝是少数民族政权，对结社实行全面禁止的政策。所以，结社只能是秘密结社。青红帮的人互相交换信息，尽管他们不识字，但对“某地发生饥荒”“某地不能去”之类的具体情况却是非常熟悉。

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像“卡蒂萨克号”[[50]](#_50_1)那样的帆船能一下子从广东开到上海。因此，青帮的搬运方式变得落后，这些人都失业了。最后，他们给太平天国的起义军当向导，极大地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基础。不久，清朝就灭亡了。

所以，一旦社会使那些拥有信息的人及形成信息网的人们下岗失业，政府的统治力就不行了。明朝的灭亡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明朝末期的1644年，北京陷落。在北京陷落的50年前丰臣秀吉进攻朝鲜。当时朝鲜请求宗主国大明派兵支援。明朝及清朝都是朝鲜的宗主国，朝鲜请求帮助仅有两次，一次是在丰臣秀吉进攻朝鲜之时，另一次是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

丰臣进攻朝鲜时，明朝派兵支援朝鲜是在万历年间。万历这个皇帝非常吝啬，但他必须筹措军费，因此明朝的财政状况非常紧张。所以，明朝必须压缩经费和进行行政改革。哪里才是不必花钱的地方呢？明朝有驿站这种制度，朝廷为了运输和邮政在全国各地都建有驿站。为了方便民间的邮政和运输，朝廷承担驿站运营的经费，而朝廷本身则另有一套运输渠道。这时候朝廷说不需要驿站了，朝廷不能把钱花在为民所办的事业上。于是，驿站停办了。

驿站工作人员一下子都失业了。刚才说过，这些运输业者与各个地方都有联系，对各地的情况非常熟悉。李自成（1606—1645）曾是西安的一名运输从业者，在驿夫中间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于是，他聚众造反，攻占了北京，明朝的崇祯皇帝被迫上吊自杀。大明不是被清朝灭掉的，而是被李自成消灭的，而李自成最终也被清朝剿杀了。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信息是多么重要。倘若一个政权把那些掌握大量信息的人逼成敌人，那么那个政权就危险了。

丰臣秀吉进攻朝鲜50多年后，明朝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灭亡。太平天国结束近50年后，清朝灭亡。时间大体上都是半个世纪后。也就是说，那些拥有信息的人大量失业之后，经过半个世纪左右，当时的政权就灭亡了。

注解：

[[1]](#_1_20)　白鸟库吉（1865—1942），日本东洋史学界泰斗，日本东洋史学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北方民族、西域史、朝鲜史、中国神话研究的开拓者。一生在人种、言语、宗教、历史、民俗、神话、传说、考古等领域贡献颇多。主要著述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1898）、《蒙古民族的起源》（1907）、《西域史新研究》（1911）、《东胡民族考》（1911-1912）、《室韦考》（1919）、《可汗及可敦名号考》（1921）、《粟特国考》（1924）等。

[[2]](#_2_12)　柳田国男（1875—1962）是一名日本的妖怪民俗学者。他是日本从事民俗学田野调查的第一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民俗学从“在野的”学问，变成大学正式的研究科目，被尊称为日本民俗学之父。著有《柳田国男全集》32卷。

[[3]](#_3_10)　《海上之路》是柳田国男晚年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在该书中，柳田提出了一个假说：日本人的祖先最早生活于中国的江南地区，开始是偶然的漂流，之后发展成为计划性的人口移动，为了寻找更佳的生活空间，携带着稻种，沿着一条由“海岛”构成的“海上之路”一路北上，最终来到日本列岛，成为了最初的日本人。该书赋予了冲绳地区以重要的文化史意义。

[[4]](#_4_8)　《琉球之风》是于1993年播放的NHK电视台大河剧，由陈舜臣的同名作品改编而成，共23回。讲述的是1609年萨摩入侵琉球时期的故事。

[[5]](#_5_8)　红型染是流传于日本冲绳的传统印染工艺。“红型”指的是一种染的手法。“红”在日文里是彩色之意，此种染色用色大胆艳丽。

[[6]](#_6_8)　“夷夏东西说”是1933年由傅斯年提出的。此说认为，商代文化由两个族群建立，商朝的西部由夏族群开发，商朝的东部由夷族群开发。后来根据当时最新发现的考古结果，夷夏东西说得到一些学者的进一步扩展，认为仰韶文化是由西部的夏人建立，而龙山文化由东部的夷人建立。直到大约1960年以前，中国和西方史学家都以这个假说来解释中国的史前史。

[[7]](#_7_8)　新井白石（1657—1725），名君美，号白石，日本江户时代政治家、诗人、儒学学者，对朱子理学、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学等方面造诣颇深。1709年，德川纲丰成为日本幕府第六代将军，白石作为近侍辅佐幕政，并于德川家继即位后续任辅佐幼君大臣。1716年，德川吉宗即位后，新井白石才告老退休，继续学术事业。后著作有《藩翰谱》《东雅读史余论》《古史通》等。

[[8]](#_8_8)　冈正雄（1898—1982），日本民族学者。历任文部省民族研究所部长，东京都立大学、明治大学教授，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研究所所长等。著有《古日本的文化层》《异国人及其他——日本民族·文化的流源及其日本国家的形成》等。

[[9]](#_9_8)　宫本常一（1907—1981），日本民俗学家。代表作有《被遗忘的村落》《栖居于山间的人们》《庶民的发现》《民俗学之旅》等。

[[10]](#_10_8)　高床式是“高床式住居”的略称。高床式住居是指竖起几根柱子，在上面放上床等而形成的房屋样式。这种房屋形式在东南亚地区多见，具有雨季时防洪防湿、旱季时防暑通风的功能。

[[11]](#_11_6)　《唐大和尚东征传》是淡海三船（真人元开）据鉴真弟子思托的《鉴真传》写成的。唐朝和尚鉴真（668—763）为了向日本国传法，先后六次东渡，历尽艰辛，终于在753年抵达。他带去佛教各宗经典，在日本建立律宗，还传去了佛教有关的建筑、雕刻艺术，对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和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12]](#_12_6)　《法显传》又名《历游天竺记》《昔道人法显从长安行西至天竺传》《释法显行传》《历游天竺记传》《佛国记》等，一卷。东晋法显撰，成于义熙十二年（416）。全文13980字，全部记述作者399—413年的旅行经历，是一部典型的游记，也属佛教地志类著作。这部书是研究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交通和历史的重要史料。

[[13]](#_13_6)　义净（635—713），唐代译经僧。幼年出家，天性颖慧，遍访名德，博览群籍，历游三十余国，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并称为四大译经家。

[[14]](#_14_6)　《南海寄归内法传》为佛教史传，唐义净撰，共4卷。此书系义净由印度归国途中在南海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停留时撰成。书中详细介绍了印度及其所历南亚诸国所行佛教仪轨40条，并将其与他所著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2卷及《新译经论》10卷一起托人寄归国内僧人。

[[15]](#_15_6)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日本和尚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过程当中用汉文（文言文）写的一部日记体著作。明治十六年（1883）在京都东寺观智院发现它的最早抄本，立即被尊为日本的国宝，世人将它与《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游记》并誉为“东方三大旅行记”。

[[16]](#_16_4)　慧超是唐朝时朝鲜半岛新罗国僧人，幼年入华。他从中国泛海至印度，后来取道陆路经西域返回中国，开元十五年（727）至安西（今新疆库车）。慧超是8世纪初西域政治形势剧变的见证人。

[[17]](#_17_4)　慧超于唐开元年间赴印求法，归国后写成《往五天竺传》。该书记述途经各国情况，为研究8世纪中亚、印度的重要资料。全书已佚，现仅残存敦煌遗书中。

[[18]](#_18_4)　弥生时代（约前300—300），指日本古代使用弥生式陶器的时代，其文化称弥生文化。弥生时代在绳文时代之后，古坟时代之前，可分前、中、后三期。弥生文化是在绳文文化的基础上，受到大陆（包括中国和朝鲜半岛）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首先出现于九州北部并逐渐向东发展，到了后期基本遍及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全境。弥生时代普遍有了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开始使用铜器铁器，原始社会开始逐渐向阶级社会过渡。

[[19]](#_19_4)　“ながら原”是用平假名和汉字组合在一起的地名，读音为“nagarahara”。

[[20]](#_20_2)　古坟时代（300—600），又称大和时代，是日本继弥生时代之后的时代，因当时统治者大量营建“古坟”而得名，分为前、中、后三期。

[[21]](#_21_2)　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前425），古希腊作家，西方文学奠基人，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希罗多德把旅行中的所闻所见，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历史纪录下来，成为《历史》一书。该书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

[[22]](#_22_2)　《阿蘭陀風説書》是日文名称。其中“阿蘭陀”指荷兰，“風説”本义为谣言、传言，意为荷兰版世界局势报告书。西方势力东进的前夜，幕府表面上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实际上则通过风说书制度积极主动地搜集海外情报，了解外部世界动态。德川幕府规定在长崎入港的中国、荷兰商船必须向长崎地区最高行政长官长崎奉行报告海外局势，这种报告书统称为“风说书”。

[[23]](#_23_2)　《丝绸之路》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日本NHK电视台与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纪录片。

[[24]](#_24_2)　天孙降临，是指神道中的太阳女神天照大御神的孙子琼琼杵尊，从高天原降临苇原中国（日本）。降临之时天照大御神授三神器与他约定世代统治日本，这是天壤无穷神敕，是日本人自称天孙民族的原因。

[[25]](#_25_2)　神武东征是日本神话中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自日向（今九州宫崎县）出发，向东征服大和的故事。

[[26]](#_26_2)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今日本秋田县人，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重要学者，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著有《内藤湖南全集》共14卷。

[[27]](#_27)　绳文时代（约前10000—前300），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因使用绳文式陶器而得名，其文化称绳文文化。日本的北海道到九州直至琉球群岛均有这一时代的遗迹。绳文时代的人们以村落的形式聚居在河边或沿海地区，以狩猎、捕鱼和采集为生，晚期出现稻米种植。

[[28]](#_28)　中国于汉、魏、晋、南北朝时称现在的日本为倭，唐、宋及以后称为日本。

[[29]](#_29)　“三角缘神兽镜”，日本古坟时代前期的一种铜镜。其缘部隆起甚高，断面呈三角形，镜背花纹是东王父、西王母等神像和龙虎等兽形，三角缘神兽镜即以此而得名。

[[30]](#_30)　卑弥呼是日本弥生时代邪马台国的女王。《三国志·魏书·倭人传》所载其与曹魏往来甚密，能使鬼道，以妖惑众，年长不嫁。弥生时代日本列岛有大小诸侯国30多个，卑弥呼女王为了巩固邪马台政权花费巨大代价交接曹魏，曹魏封女王为“亲魏倭王”，授其金印。

[[31]](#_31)　王仲殊（1925—）是当代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研究领域主要是在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兼及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

[[32]](#_32)　倭五王是《晋书》《宋书》等中国南朝史书中记载的倭国赞、珍、济、兴、武五王。据记载，倭五王在413—478年，至少九次遣使南朝，奉献贡品。

[[33]](#_33)　大友宗麟（1530—1587）是日本战国时代九州的战国大名，同时是位天主教大名。

[[34]](#_34)　大盐平八郎之乱，天保八年（1837）大盐平八郎（1793—1837）在大坂发起的动乱。自1830年起，大阪地区连年歉收，农村饥馑，城市物价腾贵。1836年，灾情尤其严重。大盐对于广大贫苦人民的悲惨处境深为同情，建议町奉行对饥民采取救济措施，但町奉行置之不理，且与富商勾结，贩粮江户牟取暴利。于是由大盐平八郎的门生约300人组成的武装集团举起了“救民”的旗帜，袭击商家等处并纵火。但这场动乱仅半天就被镇压下去了，大盐平八郎则在潜藏一个多月后自杀。

[[35]](#_35)　兰学，是在江户时代经荷兰人传入日本的学术、文化、技术的总称，字面意思为荷兰学术（Dutchlearning），可引申解释为西洋学术（简称洋学）。兰学是一种透过与出岛的荷兰人交流而由日本人发展而成的学问。兰学让日本人在江户幕府锁国政策时期（1641—1853）得以了解西方的科技与医学等。

[[36]](#_36)　尚齿会，是由江户时代后期的兰学者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组织的研究洋学的团体。该团体不仅交友而且研究政治、社会、海防问题等。

[[37]](#_37)　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西方派到中国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他在华25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他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字典——《华英字典》。他还是第一个把《圣经》译成中文的人。他以自己的医学知识在澳门开办了第一个中西医合作的诊所。他展开了基督新教在中国的宣教历史。

[[38]](#_38)　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又译郭实立。德国基督教路德会牧师、汉学家、传教士、鸦片贩、间谍。七次航行中国沿海口岸，会多国语言，同时散发宗教书刊，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期刊；随英军到定海、宁波、上海、镇江等地做翻译工作。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人物。

[[39]](#_39)　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英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813年，由伦敦会派遣来澳门与马礼逊一起活动。当时受天主教势力的排挤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反对，转到广州；数月后到马来西亚，定居马六甲直至死。在马六甲创立英华学院（该校后迁香港），开办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和英文刊物《印度支那拾锦》。曾将《圣经·旧约·申命记》《圣经·旧约·约伯记》译成汉文。

[[40]](#_40)　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兰学者组成尚齿会，积极从事西洋学问研究。在幕府对美国舰只“莫里森号”实行打击的次年，华山著《慎机论》，长英著《戊戌梦物语》，对幕府的攘夷政策进行批判，由此触怒幕府，于是幕府以企图渡海去国外及与大盐平八郎有勾结等罪名将他们逮捕。该事件发生于天保十年（1839），是幕府对兰学者所实行的最初的压制。

[[41]](#_41)　斯坦因，即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原籍匈牙利，是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

[[42]](#_42)　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是瑞典籍世界著名探险家。在中亚的四次探险考察中，他发现了喜马拉雅山脉，雅鲁藏布江、印度河和象泉河的发源地，罗布泊及塔里木盆地沙漠中的楼兰城市遗迹、墓穴和长城。

[[43]](#_43)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1961），美国小说家。1952年，以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获普利策奖及诺贝尔文学奖。

[[44]](#_44)　文库本，一种廉价且外型便于携带，以普及为目的的小开本出版形态。在日本被称为“文库”的出版。

[[45]](#_45)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旧译《澳门月报》，是西方传教士在清末中国创办的一份英文期刊，由美部会的传教士裨治文创办于1832年5月，主要发行地点是广州。《中国丛报》在鸦片战争期间一度搬到澳门及香港，1845年再移回广州。

[[46]](#_46)　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是美国首位来华医疗传教士、广州博济医院创始人。1834年来华，1838年在广州成立中华医药传道会，任副会长，并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院。1839年鸦片战争前夕曾为林则徐治疝气病。1844年担任美国特使助手，参与《望厦条约》谈判。1855年任美国驻华全权公使后，曾鼓动侵占中国台湾，并与英法各国联合提出“修约”要求，扩大侵华权益。

[[47]](#_47)　《圣武记》是中国历史著作，专题性史书。清魏源（1794—1857）撰，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共14卷。前10卷以纪事本末体记述清王朝建立至道光年间的军事历史；后4卷《武功余记》为作者对有关军事问题的论述。

[[48]](#_48)　《海国图志》是一部介绍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和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全书详细叙述了世界各地和各国历史政治、风土人情，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心思想。

[[49]](#_49)　吉田松阴（1830—1859），日本江户幕府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著有《讲孟余话》《幽囚录》《留魂录》。

[[50]](#_50)　“卡蒂萨克号”是世界帆船史上航行速度最快的一艘船，被称作“顺风威士忌”，代表着帆船建造技术的顶峰，1869年在苏格兰建成。

# 后记

有人告诉我说，随笔快要攒够一本书了。我听了感到很意外，还像平时一样问道：“有那么多了吗？”特别是这次我因脑内出血病倒之后，感受尤为深刻。

这里收录的作品既有我大病之前写的，也有病后写的。我现在右手不好使，只要看原稿就会清楚哪些是病前写的，哪些是病后写的。

但是，我在阅读变为铅字的作品时，却几乎看不出它们之间的差别。说实话，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在香港回归这一历史事件之前，我走路还是好好的，但那之后，我访问虎门炮台时，却已经是拖着腿，拄着拐杖走路了。

这里有一篇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随笔。我知道，从那时起时间又过去了10年。这10年是激烈动荡的岁月。为什么会是那样？今后我要慢慢思考。

历史川流不息，但思考历史的时间却可以随时为我们停下来，如果思考历史有必要的话。我希望读者能从这本书中体会到这一点。